

中国民主季刊

CHINA

2026年7月

第3期

卷4

VOL. 4

No.3

JUL. 2026

JOURNAL

OF

DEMOCRACY

中国的变与不变：繁荣的中产阶级与威权体制能否长期共存？

达隆·阿西莫格鲁 / 钟伟锋

中美竞争、台海问题与印太地区不断演变的军力平衡

扎克·库珀 / 倪健达

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钟伟锋 张伦 王超华 苏利利 胡平 王天成

中共“大外宣”历史考察（上）

裴毅然

为什么民选领导人颠覆民主

苏珊·斯托克斯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中国民主季刊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中国民主季刊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主编 Editor in Chief

顾问编辑 Advisory Editor

编辑 Associate Editors

王天成 Wang Tiancheng

钟伟锋 Zhong Weifeng

余浩风 Yu Haofeng

李聿脩 Li Yuxiu

技术、推广总监 Tech & Promotion Director

杨子立 Yang Zili

运营协调 Operational Coordinator

冯华 Feng Hua

主办、出版 Organization & Publisher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电邮 Email: cjd@chinademocrats.org

网址 Website: <https://chinademocrats.org/>

电子版刊号 ISSN (electronic): 2996-2420

印刷版刊号 ISSN (print): 2996-2412

CC BY-NC-ND 开放资源

不得修改和用于商业目的

转载须注明作者、出自本刊

国际顾问委员会 (International Board of Advisors)

白夏 Jean-Philippe Béja	盖思德 Roger Garside	苏晓康 Xiaokang Su
陈健民 Kinman Chan	郝志东 Zhidong Hao	王飞凌 Feiling Wang
陈奎德 Kuide Chen	何包钢 Baogang He	文贯中 Guanzhong James Wen
陈志柔 Chih-Jou Jay Chen	胡平 Ping Hu	吴国光 Guoguang Wu
郭丹青 Donald Clarke	许田波 Victoria Hui	吴介民 Jieh-min Wu
孔杰荣 Jerome Cohen	林培瑞 Perry Link	许成钢 Chenggang Xu
戴大为 Michael Davis	黎安友 Andrew Nathan	杨凤岗 Fenggang Yang
戴雅门 Larry Diamond	夏伟 Orville Schell	张伦 Lun Zhang

国际编辑委员会 (International Editorial Board)

阿古智子 Tomoko Ako	廖雨诗 Yushih Liao	曾建元 Chien-Yuan Tseng
蔡霞 Xia Cai	李酉潭 Yeau-tarn Lee	王兴中 Hsing-Chung Wang
陈杰 Jie Chen	李厚辰 Houchen Li	王柯 Ke Wang
陈育国 Yuguo Chen	李思磐 Sipan Li	吴玉婷 Andrea Worden
程映虹 Yinghong Cheng	罗世宏 Shih-hung Lo	吴强 Qiang Wu
冯崇义 Chongyi Feng	吕频 Pin Lü	夏明 Ming Xia
马思中 Magnus Fiskesjö	艾华 Eva Pils	许秀中 Vicky Xu
柯蕾 Chloe Froissart	任思梅 Johanna Ransmeier	叶耀元 Yao-Yuan Yeh
何晓清 Rowena He	古思亭 Kristin Shi-Kupfer	张崑 Kun Zhang
郭汤姆 Thomas Kellogg	艾美丽·庞 Amelia Pang	赵荔 Li Zhao
石小琳 Katrin Kinzelbach	贡嘎扎西 Kunga Tashi	
卓玛加 Dolma Kyab	楚克斯 Rory Truex	

目录

访谈

8 · 中国的变与不变：繁荣的中产阶级与威权体制能否长期共存？

达隆·阿西莫格鲁 / 钟伟锋

20 · 中美竞争、台海问题与印太地区不断演变的军力平衡

扎克·库珀 / 倪健达

36 · 孟加拉起义：2024 年学生抗议、军队背弃与政治转型

莫伊努尔·哈克 / 苏利利

笔谈

56 · 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钟伟锋 / 张伦 / 王超华 / 苏利利 / 胡平 / 王天成

专题探讨

74 · 中共“大外宣”历史考察（上）

裴毅然

98 · 额头上的疤痕：饥民社会的缘起与危害

坚真光

118 · 从 AI 的局限性到民主研究的新尝试

徐贲

当今民主

144 · 为什么民选领导人颠覆民主

苏珊·斯托克斯 / 言晓义 译

170 · 新式竞争性威权政体

史蒂文·莱维茨基 / 卢坎·韦文 / 徐行健 译

读书

194 · 异议人士有门必修课：《革命蓝图》中文版序

王天成

简记

204 · 全球民主人权事件

弥正平

212 · 英文摘要

224 · 《中国民主季刊》征稿启事

225 · 《中国民主季刊》订阅方式

Contents

INTERVIEWS

8. China's Change and Continuity: Can a Prosperous Middle Class and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Coexist in the Long Run?

Daron Acemoglu / Weifeng Zhong

20. U.S.–China Competition,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Evolving Military Balance in the Indo-Pacific

Zack Cooper / Jianda Ni

36. The Bangladesh Uprising: The 2024 Student Protests, the Military's Defection,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Md. Moynul Haque / Lili Su

CONVERSATION

56. The Road to Democracy: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Weifeng Zhong · Lili Su · Lun Zhang · Chaohua Wang · Ping Hu ·
Tiancheng Wang*

POLITICS AND SOCIETY

74.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Grand External Propaganda" (Part I)

Yiran Pei

98. The Scar on the Forehead: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Famine-Mentality Society

Zhenguang Jian

118. From the Limitations of AI to New Approaches in the Study of Democracy

Ben Xu

DEMOCRACY TODAY

144. Why Elected Leaders Subvert Democracy

Susan C. Stokes Translated by Xiaoyi Yan

170. The New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Translated by Xingjian Xu

BOOK REVIEW

194. An Essential Lesson for Dissidents: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 of *Blueprint for Revolution*

Tiancheng Wang

NOTES

204. Global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Zhengping Mi

212. ABSTRACTS IN ENGLISH

224. Call for Submissions

225. How to Subscribe

访谈

达隆·阿西莫格鲁
钟伟锋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3期

2026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中国的变与不变：繁荣的中产阶级与威权体制能否长期共存？



达隆·阿西莫格鲁



钟伟锋

编按：“人类历史上并没有什么规律认为一个威权政权不可能存续数百年。但你很难让一个威权政权与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产阶级长期共存。我认为，这正是中国模式根本困境之所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教授、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说。2026 年 6 月 4 日，一个特殊的日子，钟伟锋博士对阿西莫格鲁教授做了以下专访。钟伟锋是乔治·梅森大学默卡特斯中心学者、《中国民主季刊》顾问编辑。访谈探讨了中国的威权发展模式、增长与自由、创新与人工智能、中产阶级状况、1989 年以来的变与不变等重要问题。

钟伟锋（以下简称钟）：让我先从一个铺垫性的问题开始。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大屠杀距今已经 37 年了。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依然怀有强烈的热望，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中国走向民主，如果那一天真的会到来的话。但显然，过去这 37 年里，中国经历了许多变化。对于中国在过去如何演变，你有什么看法？

阿西莫格鲁（以下简称阿）：我认为，在学术界，中国研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领域，而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但显然，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威权式增长道路，这条道路至今仍极具创新性。然而，这一体制内部存在诸多矛盾，这首先意味着中国并不是其他国家的好榜样，其次也让人对当前结构的存续能力产生疑问。中国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中国实现了极为快速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的不同阶段其实大相径庭。也许我们不当把所有阶段都笼统地归结为单一的“中国增长经验”。自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业驱动的，而且并不一定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因此，它具有许多自下而上的过程特征。但第二阶段，尤其是天安门事件之后，变得更加受控、更加工业化，而且无论是在政治体制方面，还是在它对经济所施加的影响方面，都更加威权。接着，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更侧重于技术方面，尤其聚焦于人工智能，但它试图复制第二阶段，因为从中国领导层的视角，以及从中共及其精英集团延续统治的角度来看，第二阶段被视为最理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中国正在与美国竞争，而在人工智能的某些领域，中国已经占据领先地位。

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的中产阶级对各种各样的自由存在显著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受到压制。这一点正在与经济相互交织——你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尽管中产阶级收入不断上升，中国的内需却依然不足，而中国制造业的盈余几乎全部流向了出口。这一体制本身在习近平之前就已经不稳定了。有些人认为习近平的统治与此前有根本差别，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它更像是中共统治的一种延续。不过，这种统治本来就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因为面对不断壮大的中产

阶级，要么需要向中产阶级作出让步——而这是中共所不愿意的——要么就要收紧控制，比如加强监控、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强调民族主义，并以其他种种手段来转移中产阶级的注意力。我认为习近平就是这一进程的自然延续。

归根结底，人类历史上并没有什么规律认为一个威权政权不可能存续数百年。但你很难让一个威权政权与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产阶级长期共存。我认为，这正是中国模式根本困境之所在。中国的工程人才十分雄厚，制造业基础已经变得非常庞大、非常多元。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在经济上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再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中产阶级最终会提出何种诉求、会对什么感到满意——无论是在话语权方面、在更好的服务质量方面、在环境诉求方面，还是在他们对公平与良政的理念方面——以及什么符合他们的道德观、什么是他们可接受的、合法的统治，这些与中共愿意容忍的限度之间的冲突，我认为将塑造中国制度的未来。

钟：尽管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我还很小，才六岁，但后来我了解到，早在1980年代，你所描述的情形恰恰就是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趋势——人们要求更多的自由。但随后就发生了那场大屠杀。不过，难道不也有很多人把这看作是中共政权与民众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吗？也就是以放弃民主来交换经济增长。

阿：当然，这里面确实有社会契约的成分，我对这种看法持开放态度。我想反驳的那种解读——它也相当流行——是认为中国文化或中华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需要民主，它能够接受威权统治，甚至在威权统治

下更幸福、更契合。诚然，中国，尤其是自秦朝以来，有着两千多年基本上属于威权、自上而下统治的历史。但即便如此，民主的理念、自由的理念在中国依然无处不在，它们并没有从中华文化中抹去。你可以从这个事实看出来：台湾比中国大陆更具儒家色彩。各种调查中显示，台湾的儒家价值观比在中国大陆更多。而台湾已经能够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并以某种方式按照民主原则重新诠释儒家价值观。香港本来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直到大陆的强力镇压为止。此外，你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身上也能看到同样的东西——那种诉求、那种向往，他们想要以多快的速度走向更大的自由、更开放的媒体、更强的政府问责，实在令人瞩目。所以这些理念并没有死去，它们只是被压制了，变得不那么有力，但永远无法被抹去。而且我认为，这本身也是对那份社会契约的一种威胁。社会契约确实存在。这份社会契约恰恰是中共所希望的——也就是：你们让我来统治，我给你们提供稳定和繁荣。但归根结底，我不认为稳定和繁荣足以满足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而且，稳定和繁荣本身，在威权体制下也并无保障。

我们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看到，在威权政权之下，政权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缺乏问责和透明，腐败与治理失灵随之而来。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通常试图通过几种方式来避免这个问题：精英的更替——中共内部不同派系的此消彼长——以及任人唯贤、把人选拔进党的高层。如今，精英更替在中国已大体消失，我同样认为这是体制内在逻辑要求收紧所带来的后果。任人唯贤的晋升机制依然存在，但我不认为仅凭这一点就能确保良好的政策制定总能实现。不过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创新从根本上需要自由。我们在中国还没太看到这个局限性，因为中国一直处在追赶阶段，并且确实充分利用了其规模庞大、技能

娴熟的工程师队伍，在制造业、在消费品设计、在人工智能领域一个接一个地解决问题。但我认为，这个局限性终将显现，并将成为中国走向创新道路上的又一道障碍。

钟：你提到的技术创新很有意思，正如你所描述的，中国经历了大量的追赶。但我对中国式创新的印象其实有些不同。我的印象是，他们试图通过“偷师”的方式一路向上，以接近前沿。他们搞逆向工程。我们所看到的许多中国式创新，你总能追溯到某种西方的源头，对吧？中国搜索引擎（百度），显然源自谷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看起来，中国成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能够一直做模仿，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又以某种方式启动了真正的创新引擎。这个策略取得了一些突破前沿的进展。

阿：百分之百同意。但以人工智能为例，虽然中国在某些领域仍然落后——最重要的是在大语言模型方面——在那里，模仿依然适用。比如说，DeepSeek 的成功确实非常了不起，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对现有模型的蒸馏。然而，在机器人技术、在把人工智能整合进生产过程方面，以及把人工智能整合进消费品方面，我认为中国是真正具有创新性的。这同样既得益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尽管这一市场本身并没有它应有的那么大，因为中产阶级的支出不及它本应达到的水平），也得益于其极为强大的工程基础。你在 DeepSeek 身上也能看到这一点。DeepSeek 所谓的“创新”全都是工程上的修补，所依赖的理念早已存在于机器学习文献之中，其中一些已经被纳入现有模型，另一些则不尽然，比如专家混合模型（mixture of experts）。而 DeepSeek 把它们相当成功地糅合在一起。这种“配方”你在其他领

域也能看到。比亚迪在机器人技术方面领先于美国公司，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发明了某种新型机器人，而是因为它真正把“将机器人整合进生产过程”这一点做到了极致。

钟：好。那么在这个语境下，是否可以说中国体制更可持续，因为模仿策略比每次都真正去创新更可持续？因为，你只需设法追到前沿就行了。

阿：不，因为我认为，一旦你已经非常接近前沿——而中国正处在这个位置——模仿策略就无法再奏效了，所以中国需要变得真正具有创新性。而在这方面，我们会看到更多障碍。其中一个你会看到这种障碍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学术界。鉴于眼下私营部门有如此多的创新、国家如此庞大、拥有如此多的资源，中国本应拥有好得多的学术活力。但事实并非如此。部分原因在于，学术的繁荣需要学术自由。我和杨宇凡（David Yang）以及周婕（Jie Zhou）做过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职业生涯方面的顾虑所驱动的：人们惧怕学术界的学阀或党内权贵的权力，于是相应地转移自己的研究精力。这样的环境，正是学术界在创新方面后劲不足的根源。

钟：我想，这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的创新或许是坏消息，但对我们的读者来说，也许是好消息——因为这样一来，施加在中共政权身上的压力可能会越来越重，从而带来某种希望：中国或许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自由社会。

阿：是的。但我并不认为，指望中国在短期内成为自由社会是现实的。我认为我们必须现实一些。我们得在某种程度上寄望于这样一些

路径：让中产阶级和学生提出更多诉求，要求获取信息、要求拥有可靠的媒体信息来源、要求拥有更多发声的渠道——先是在地方政府层面，进而也在中央政府层面。

钟：你能看到哪些路径？

阿：这个民主进程必然会遭遇阻力。但关键在于诉求的性质和政权的性质——但愿这种阻力不会是暴力镇压。如果不走到暴力镇压的那一步，那就能打开一条路。任何通往民主的道路都很脆弱，因为一旦发生暴力镇压，我认为就很难再回到民主的轨道上。因为暴力镇压不仅仅压制当下的民主运动，它还会改变运动的性质，使民主运动——或者无论什么样的反对派运动——本身变得反民主。我们在阿拉伯之春中看到了这种状况。当时中东有大量去中心化的、自下而上的自由诉求。但一旦镇压开始，这一切便土崩瓦解，因为运动要么走向激进化（这本身就有害于进一步的民主制度建设或广泛的联盟），要么就是政权变得足够强大，足以顶住压力。所以我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关键所在——避免再发生一次天安门广场大屠杀。

钟：以及尽可能地培育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公民社会。我们刚才谈到了人工智能。我想把话题更广义地转到那个方向。我记得读过你的论文《人工智能的简单宏观经济学》（The Simple Macroeconomics of AI）。你在其中给出一个估计：在十年的窗口内，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影响大约为 0.66%。

阿：没错。没错。

钟：这个数字在我看来有点小。你如何解释这一点？

阿：是的，事后来看，这个数字确实有点偏小，因为技术进步比我预想的要快。但我仍然要说，如果你指望未来五到十年里 GDP 会翻倍，那你会失望的。要把任何新技术整合进各类组织都是非常困难的，而对人工智能来说更是加倍如此。尽管基础模型的进步非常迅猛、令人振奋，但在此基础上构建应用却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而且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多这样的应用。当然，话说回来，智能体（agentic AI）阶段或许会改变这一点。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在智能体阶段，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先格局将如何演变？但我们眼下所看到的是，现有模型无论能力多强，其实都还没有真正渗透进生产过程。

钟：但在智能体系统中，你是否会看到一种巨大的冲击——对人们未来工作方式的冲击？比如，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过去在软件领域，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会是一名程序员，就像“码农”那样敲代码。但现在就好比，你可以用自然语言与人工智能对话，人工智能就能做出你想要的全部软件。于是，那个程序员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经理或沟通者。

阿：是的。我认为，未来工作方式会有许多方面发生改变。而希望与绝望都蕴含其中。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创造更多能够在各种领域促进共享繁荣的技术——顺便说一句，这对西方的民主而言是完全必要的。西方的自由民主正处于危机之中，正是因为共享繁荣陷入了危机——那么，我们就需要那些智能体工具去与劳动者协作，也就是我所说的“亲劳动者的人工智能”（pro-worker AI）。而如果你的目标是自动化，你既可以用智能体工具来实现，也可以用非智能体工具来实现。

两者都很难。这是事实。我认为，有了智能体工具，会出现新的可能性，但这绝非定局。如果你想让人工智能深度渗透经济——比如说，彻底改变客户服务的方式，把客服人员的数量减少 80% 到 90%，这意味着大量工人会失去工作——那么你就需要更简单、更可用、更可靠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客服工具。所以你需要某种“人工智能界的微软 Office”。而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

钟：但在向上流动方面，那些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人应该怎么办？是去学人工智能，还是做点别的？

阿：嗯，去学人工智能，当然。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理解人工智能——既要懂得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存，也要懂得如何以一种对我们有益、合乎伦理、有助于职业发展的方式与人工智能协作。你看在美国，客服代表并不是高薪的经理。如果他们因人工智能而失业，他们将不得不去做薪酬更低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在以往一波波自动化浪潮中所经历的。但是有一线希望，那就是这一切不会一蹴而就，所以还有一些调整的时间。一部分调整会发生在劳动者一侧——会有再培训；一部分学生会意识到需求的变化，并据此做出投入。一部分调整在政府一侧——我们需要对人工智能的走向进行监管。但愿还有一部分调整会发生在技术一侧——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技术更“亲劳动者”，技术的设计就需要改变。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做得比美国略好，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之所以做得略好，原因在于：中国并不只是押注于大语言模型，而是试图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整合进生产过程。这种方式非常依赖工程，但它能提高生产率，又不会完全消灭工人——尽管确实会造成一些岗位流失。而且，中国有降低成本的迫切需要，因

为其如此依赖出口；但中国还有一个更为迫切的需要，那就是应对即将到来的
人口结构转变——这是任何国家所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人口结构转变。韩国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只不过韩国比中国小得多。

钟：是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亲身体验，因为我出生那年，正是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至少在我长大的地方——开始实施的第一年。所以如今，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位老人，可能还要抚养一个孩子。

阿：是的，接下来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当然，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对此只是部分的解决办法。你并不想用它们去消灭工作岗位。你想让一部分任务实现自动化，同时也用同样的技术去让剩下的、变得稀缺的工人更有生产力、边际生产力更高——也就是说，让他们对生产过程的贡献更大。

钟：所以，简而言之，是互补而非替代。那么教育体系呢？我知道你在大学任教，但如果我们更广义地去想——从小学一直到博士——教育体系应该如何适应人工智能这种快速变化的步伐？

阿：互补而非替代，没错。我认为我们需要彻底地重新思考教育。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眼下我们并没有重新思考它；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没有被人工智能所改变。它正在被改变。如今每个学生都在使用 ChatGPT 或 DeepSeek 之类的工具。而最近有一项研究，使用了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数据，结果显示后果是灾难性的：使用人工智能的学生，学到的东西要少得多。他们的通识水平显著下降，他们在标准化考试中的成

绩也大幅下滑。但其中也存在多种可能，而且这实际上与我刚才谈到的生产过程如出一辙。如果我们以一种“亲教师”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我们就能以一种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个性化教育。但相反，我们如今所做的，却是某种用 ChatGPT 去取代教师、去取代学生要付出的努力的做法——而这两者都是通向灾难的根源。

钟：你会如何改变学生的心态？比如，如今他们把作业看作一道障碍，对吧？所以他们通常想把它一甩了之。

阿：是的，我懂。这正是关键所在。因为如果我们当初对此做过规划、有一张路线图，我们本可以把技术设计得不一样，从而促使学生以正确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而且有证据也表明，如果学生正确地使用人工智能——比如，他们先自己做作业、先自己钻研材料——他们会学到更多。但覆水难收。所以如今你面对的是数以亿计的学生，他们全都能够零成本或低成本地用上 ChatGPT 或其他模型，你根本无法阻止他们。所以你需要改变规范，让学生明白他们是在伤害自己。但这非常困难，因为你面对的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

钟：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无论是身处这一体系中的学生，还是包括像你这样身处其中的教师。我知道我们的时间快到了，但在结束之前，请允许我感谢你，阿西莫格鲁教授，感谢你接受《中国民主季刊》的专访。有兴趣了解达隆的研究的读者，可以通过谷歌搜索，或者访问你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网站。再次感谢你的参与。

阿：好的。谢谢你，伟锋。这是我的荣幸。非常感谢。

访谈

扎克·库珀

倪健达

中国民主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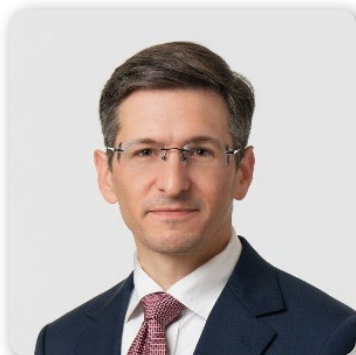
第4卷 第3期

2026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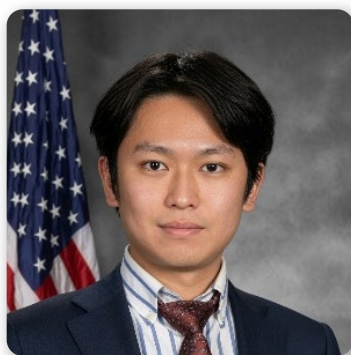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中美竞争、台海问题与印太地区不断演变的军力平衡



扎克·库珀



倪健达

编按：“台湾海峡正在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无人地带’。任何一方都无法在不暴露于严重风险的情况下，有信心地通过这一海峡”，扎克·库珀（Zack Cooper）说。库珀曾为美国国防部外交事务专家，并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他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讲师，同时在乔治敦大学、保障民主联盟等机构兼有职务。在其最近出版的《命运潮汐》（Tides of Fortune）一书中，库珀考察了二十世纪六个大国的发展轨迹，追踪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如何根据对相对实力变化的判断，调整其国防目标、军事战略和资源投入，并基于这一视角预测美国和中国军事发展走向。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研读国际事务、现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的倪健达先生，对库珀博士做了这一专访。访谈从伊朗战争开始，聚焦于北京意图、华盛顿战略、台海关系以及日本再军事化带来的亚太军力新平衡等问题。

倪健达（以下简称倪）：我们从伊朗战争开始。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通常部署在台湾附近的南海海域，但其近期被调往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加强美国在当地的军事力量。这一调动以及美国在中东更

广泛地调遣海军力量，是否实质性地削弱了美国在台湾海峡及周边地区的战备水平和力量投射能力？除了这次具体的调动之外，伊朗冲突是否暴露出美国军力在同时应对两个潜在高强度冲突战场时，在规模配置与资源分配上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库珀（以下简称库）：伊朗战争确实对美国在西太平洋投射力量的能力产生了短期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已将部分装备从太平洋调往中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伊朗冲突中消耗了大量弹药，而这些弹药本可留作应对亚洲突发事态之用。话虽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短期问题：一旦伊朗战争结束，这些装备就会返回原驻地。我并不特别担心北京今年会对台湾采取行动。军力部署方面的影响并非关键因素，而且坦白说，如果中国军队真的开始对台湾采取行动，美国很可能会迅速将装备从伊朗调回。

我认为真正具有更长远影响的还是各类导弹及拦截弹的消耗。这是美军在短期内面临的一个制约因素。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系统可用于应对潜在的美中冲突，但这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短期限制。

从中长期来看，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在国内弹药生产方面的投入力度，以及相关武器系统的制造速度。甚至可以说，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当前这场冲突如果能够促使美国发展出大规模生产这些系统的工业能力，或许反而是一件好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防部目前的作为，以及它是否真正重视弹药生产问题。

作为一个高度关注亚洲事务的人，我确实认为伊朗战争是一种分散

精力的干扰。它消耗了本应更多地留给本地区各项挑战的资源与战略关注。

倪：如果北京正密切关注美国在伊朗的这次部署——我们理应作此假设——那么，倘若中国确实在改变其对台计算，或认为出现了打破现状的机会，您预计会出现哪些具体的信号或行为？

库：我的看法是，今年中国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非常低。尽管2027年仍是一个可信的规划时间点，但习近平目前在国内面临诸多需要应对的问题——不仅是经济放缓，还有解放军内部持续进行的清洗。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多位重要成员被撤换的情况下，我不认为解放军已具备发动大规模对台入侵的条件，即便美国当下有所分心。

从某种角度看，如果美国将精力集中在伊朗局势上，2026年其实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年份。我认为，临近2028年及该年本身将会更加棘手，因为台湾和菲律宾都将举行选举——这类事件在政治上可能很难处理，并可能引发实质性的美中紧张关系。

话虽如此，我认为2026年总体上是一个稳定的年份，而这基本上也正是近期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所反映出的情况。如果我们看到中国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或围绕台湾问题出现一轮咄咄逼人的舆论攻势，我会感到担忧。但坦白说，我原本就预期今年会比去年更为平静，而事实大体上也确实如此。

倪：与此前历任政府相比——包括特朗普自己的第一任期——您如何

评价第二任特朗普政府在保卫台湾问题上的承诺？两者在言辞或政策实质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对北京的判断是否重要？

库：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乃至更广泛的对华政策上，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之间确实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源于特朗普本人——我认为他本人的立场其实相当一致。差异的根源在于他周围的顾问团队。

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身边围绕着一批对华态度强硬、支持台湾的顾问。他们推动总统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更有力地反制北京，并将美中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我认为这些立场都并非出自特朗普本人的本能倾向，而是博尔顿（John R. Bolton）、蓬佩奥（Mike Pompeo）和兰迪·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等人物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对中国持怀疑态度，并真心支持台湾。

而在第二任期内，这些顾问已不在其位，总统显然认为自己比身边大多数外交政策团队成员更有经验。因此他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判断行事，而他的本能告诉他，习近平是一位有能力的领导人，他希望与之建立私人关系。对他而言，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显然不及从前。

专家群体存在分歧的地方在于，这一变化对美国对台政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个人的看法——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态也印证了这一点——是尽管特朗普总统可能并不十分重视美台关系，但他也不愿被后人记住为“丢掉台湾的总统”。因此，他或许会谈论与中国就台湾问题“做交易”，但真到了需要做出实质性让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真

正付诸行动。我仍然担心他在军售或政策宣示方面可能采取的举动，但在他北京之行之前人们最担忧的情形，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

他可能会放弃一些与台湾相关的次要利益，但我不认为他会做出彻底放弃台湾、纯粹交易式的协议。中国若想换得这样的结果，就必须拿出极具吸引力的条件，让特朗普愿意承担相应的政治代价，而我很难想象那会是什么。

最令我担忧的情形是这样的：如果习近平在9月，也就是中期选举前不久访问华盛顿，并向特朗普提出一项大规模投资协议，那将是台湾问题上出现实质性让步风险的窗口期。我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并非不可能。这个时间点正是我会最密切关注的。

倪：即便特朗普出于个人政治利益或其他国家利益的考量，确实愿意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交易式做法，但仍存在诸多制度性约束——《台湾关系法》、国会的态度、公众舆论、五角大楼的规划。这些因素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任何一届政府所能采取的行动？是否存在一个美国不会逾越的底线？

库：我不认为存在一条可靠的底线。特朗普总统已经证明，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绕开大多数国内的制度性约束——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他不能再次参选，似乎也并不十分在意共和党作为一个政治机构的存续。因此，他所受到的约束远不及一位常规意义上的美国总统。我们在俄罗斯问题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与普京的亲近程度，远超任何其他美国总统在不付出严重政治代价的情况下所能承受的程

度，但他却并未因此遭受这些后果。

中国问题在政治上会更为棘手。被视为“亲中”会比俄罗斯问题招致更多共和党内部的反对。但当前的共和党，尤其是众议院内的共和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特朗普个人建立起来的——这是他的政党，我不认为党内的反弹会像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强烈。

这里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制约因素：交易本身。如果特朗普打算用涉台让步换取中国对美国的大规模投资，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投资中有多少真正能够被美方接受。一项涉及中国电池技术、应用于美国汽车的合资项目？这或许还能被接受。在美国市场销售中国品牌的汽车？我严重怀疑这能在国会、各州议会以及州长那里过关。中方可能会提出一些表面上极具吸引力，但在政治上根本无法落实的条件。这正是我对“特朗普会在未来两年半内真正出卖台湾”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并非因为他本人有所顾忌，而是因为真到了要拍板的时候，成本收益的计算可能根本不成立。

而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峰会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理论上两国之间可以共同推进许多事情，但根本性的互信缺失，使得即便是很小的协议也很难达成。许多交易被提出来，但真正能推进的寥寥无几。如果特朗普要达成一项涉台交易，他需要高度确信中国会真正履约，而不会让他显得愚蠢。而我看不出中国如何能够可信地提供这种确定性。

倪：过去几年间，战场形态经历了快速演变。在乌克兰，无人机和巡飞弹（loitering munitions，即可在目标区域盘旋待机、自主攻击的弹

药)改变了冲突的面貌。在加沙乃至当前的伊朗战争中,我们看到廉价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蜂群被用于挑战海空优势。美国现在也试图以其自身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系统对伊朗实施对等反制。看起来,这些曾是非国家行为体首选武器的廉价智能弹药,正在被国家军队作为核心能力加以采用。这种技术变迁将如何影响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平衡?又会有利于哪一方?

库: 这影响巨大——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内容正是关于这个主题。我的看法是,如果美国、台湾和日本能够做出正确的投资,这一技术变迁将使中国在台湾海峡乃至西太平洋其他地区投射力量变得更加困难。

原因在于,这些能力——无论我们称之为拒止系统,或消耗性装备,还是无人化平台——本质上有有助于较弱一方对那些传统上为强国所倚重的大型昂贵系统构成实质性威胁。投射力量的代价已经上升,风险更高、成本更大。这一点对于美国相对于伊朗而言是真实的,对于中国相对于台湾而言同样真实。

这在实际中意味着,台湾海峡正在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无人地带”。任何一方都无法在不暴露于严重风险的情况下,有信心地通过这一海峡。如果这种态势持续,对台湾而言实际上是有利的。因为如果中国无法将三十万到四十万军队投放到岛上,它就无法成功执行入侵行动。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威胁都被消除——北京仍可以实施封锁或夺取外岛——但最高强度的情形,即全面的两栖入侵,会因这些技术而变得远为困难。关键在于,台湾、美国以及可能的日本,必须在正确的能力上进行投资,以使中国军队面临实质性的风险。我们目前已经在

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需要大幅扩大规模，并且速度要快得多。

总体而言，我认为这种技术变迁有利于防御性的、维持现状的力量。这正是台湾的定位，这也应该是美国的定位。所以总的来看，我认为这对中国是坏消息，对台湾则是好消息。

倪：您似乎认同，廉价的蜂群系统有利于防御一方——即有利于较弱的防御者对抗较强的入侵者。这种框定方式准确吗？

库：我会对这种框定方式做一些细化。我不认为这单纯是进攻与防御的问题。这些系统同样可以用于进攻。我更倾向于做出“控制”与“拒止”之间的区分。

控制是指前往某地并加以掌控——无论是陆地、海域还是空域。这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代价也越来越高。拒止则是指阻止对手建立控制，这正变得越来越廉价、越来越容易。拒止与防御常常存在重叠，但二者并不等同。这正是为什么这些消耗性系统同样可以被用于进攻目的。真正困难的是利用它们去夺取并控制领土。因此，我认为“控制与拒止”是比“进攻与防御”更清晰、在分析上也更为精确的框定方式。

倪：这里还存在一个工业层面的维度。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能力，物力和人力资源极为充裕。假设中国决定大规模生产无人机、火箭弹、廉价导弹和巡飞弹，以压制台湾的防空系统，并对美日舰队形成拒止，如果中国在这一能力上的投入速度超过美国、台湾和日本所能跟上的步伐，这是否会使力量平衡向中国一方倾斜？

库：这确实发挥了中国的一项真正优势，即能够快速、大批量地生产廉价产品——这并非美国所擅长之处。另一方面，美国、台湾、日本以及越来越多的伙伴国家都在推进这些技术。这一联盟内部的合作，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随时间抵消中国在产能上的优势。

但从军事史中可以汲取的更深层教训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这种技术如何被整合进作战部队之中。在这一维度上，我认为美国目前处于领先地位。原因有两点：

首先，美军当下正处于实战状态，已经积累了切实的作战经验——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理解——了解如何部署自主系统、如何在实际作战中运用人工智能，以及在实战条件下究竟什么真正有效。我们在当前与伊朗的冲突中所汲取的这些经验，确实具有真正的价值。

其次，美军是围绕“任务式指挥”这一原则构建起来的：即赋予各层级指挥官自主判断，让他们自行找出完成任务的最佳方式。中国的体制并非如此运作。它更趋于自上而下，对下级指挥官的信任程度也远低于美军。一个关键问题是，一个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体制能否让一线指挥官大规模、有效地运用自主系统。我认为解放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形成这种适应能力。因此，即便中国能够更快地生产更多这类系统，我仍然希望美国、台湾、日本及其盟友在真正整合并有效运用这些系统方面，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倪：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被普遍认为比自民党的历任前任更为强硬——她支持废除“宪法第九条”，支持日本军事力量的正常化，允许

日本制造和出口更多武器，并在西太平洋联盟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如果她领导的政府推进修宪，并持续推进防务建设，您认为美国的西太平洋战略将如何调整？一个更具实力、更为强势的日本，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地区安全架构？

库：我不认为日本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转变。这更像是一种渐进式的演变，朝着一个在安全角色上更为强势、更有自信的日本方向发展。这一进程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安倍朝这个方向推动过；岸田则做成了一些安倍未能完成的事情。高市很可能会加快防务建设的步伐，并可能调整一些法律上的限制。但这些变化，美国基本上是支持的，而且坦白说，美国其实希望这些变化能更早发生。

这更像是演进，而非革命。但我的看法是，在一场涉及美国介入的台湾冲突中，日本几乎肯定也会被牵涉进来。因为中国的打击很可能会波及驻日美军基地，从而在法律上促使日本考虑与美国一同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些防务变革正使日本更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将其视为能力的提升，而非根本性的修正。高市显然希望拥有一支更强大、更具能力的日本军队。但她能够推进的速度存在实际制约，即便从相对有利的政治地位出发，她也需要审慎而有步骤地积累公众支持。

倪：如果日本在防务建设上持续推进，您认为特朗普总统会更愿意还是更不愿意在该地区投入美国的装备？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读：更强大的盟友可以为美国更深的承诺提供正当理由；又或者，一个更有

能力的日本可以让美国减少自身的暴露，将资源转向其他地方。

库：我不认为这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特朗普的决策方式。即便日本在防务上推进得很快，它也无法独自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而美国确实需要日本。没有基地使用权和日本的配合，我们无法在该地区开展行动。这一同盟关系仍然至关重要。

我会以北约作个类比。特朗普多次表示，如果北约不加大投入，美国可能会收缩——但我们现在看到北约确实在加大投入，而美国仍在收缩。他或许同样会谈论，如果日本不加大力度，美国就会从亚洲收缩，但美国的基本利益决定了无论如何都需要在日本和东亚保持存在。日本当下的决策，可能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特朗普在该地区的行事方式。

欧洲是另一种情况。俄罗斯在军事上，大致相当于欧洲各国合计实力的一半。而在亚洲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实力远远超过其他亚洲国家的总和。即便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大幅增加防务开支，它们仍无法单凭自身在军事上与中国相匹敌。这种不对称性与欧洲的情况正好相反。如果美国彻底退出北约——我个人并不支持这种做法，因为我曾在北约工作过——欧洲国家或许能够在五到十年内，发展出足以威慑俄罗斯的集体能力。而如果美国退出东亚，这种选项根本不存在。东亚国家无法独自应对中国军队。这两个战场的战略动态根本不同。

倪：您认为北京会如何看待高市加快推进的防务建设？中国历来以“日本再军事化”的幽灵作为自身军事扩张的理由。日本的扩军会引发中国的反应，还是会加快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时间表？

库：中方在日本问题上从来反应不佳。而且，我认为，日本问题有时被中国当作一种工具，以便为国内本就想要推行的政策寻找正当理由。

但这种中方论调在中国之外并没有太多说服力。如果你前往东南亚，问当地哪个国家是该地区最具稳定作用的域外力量，答案是日本。真正对日本的活动怀有历史记忆所驱动的严重担忧的，基本上只有中国，或许还有一两个其他国家。

作为一个在日本花费大量时间的人，我认为中方所说的叙事——即一个能力稍有提升的日本军队，可能会从深度防御型定位转向进攻型定位——是对日本政治动态的一种根本性、且相当明显的误读。日本重建某种军事能力、随后转向进攻性行动，这种情形几乎不存在任何可能性。日本人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完全不是这样。

如果退一步审视该地区防务开支的实际走势，日本的增幅相较于中国的所作所为而言相当有限。过去四十年间，地区军事平衡发生剧烈变化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持续多年、规模庞大的防务建设。这才是真正扰乱地区秩序的因素——而不是日本那远小于中国所做的任何举动的有限增幅。

至于日本的扩军是否会具体影响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判断：我认为影响不大。如果中国真的对台湾采取行动，主要推动因素将是一种政治判断——即认为台湾正不可逆转地远离大陆。日本的防务能力实际上并不在这一判断的考量范围之内。而对中国军事行动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美国是否会介入的问题。这取决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动态以及谁是总

统，而非日本的所作所为。

倪：就您个人判断而言，如果中国在 2027 年或临近 2028 年时确实决定对台采取行动，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对抗的可能性更大还是更小？

库：说实话，我不知道，而我认为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特朗普极难预测。这几乎就像是抛硬币。如果我是习近平，我看不出自己怎么可能有信心断定特朗普不会介入，或者一定会介入。

而这是一场代价极高、一旦判断失误便后果严重的赌注。因为如果中方发起军事行动，特朗普决定介入，而这次行动又以失败告终，习近平就有可能在历史上被记作一位失败的领导人，甚至可能在政治上都无法存续。我无法想象他会愿意在对特朗普会采取何种行动毫无确切信心的情况下，承担这样的风险。而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确信特朗普在一场军事危机中会如何行事。他已经让所有人感到意外，或许连他自己也不例外。

所以我对能够维持威慑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恰恰是因为总统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威慑形式。这对习近平而言将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决定。

倪：习近平的个人历史抱负——“统一”中国，成为具有帝王般历史地位的人物——是显而易见的。但一次失败的入侵很可能对他个人以及整个中共都是灾难性的。您如何看待这种张力？

库：去年我参与了一份报告，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即一次针对台湾的失败军事行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研究结果相当严峻。一次重大军事失败的影响，将在四个维度上具有毁灭性：中国经济、国内政治稳定、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解放军本身。

其中一个关键发现是，冲突越糟糕、持续时间越长，这些领域中出现的后果就越具灾难性，而且这种关系并非线性的。一场规模较小、持续时间较短的冲突，或许在大多数维度上都还可以应对。而一场规模庞大、旷日持久的冲突，对整个共产党而言将是一场存亡攸关的灾难。

我认为人们大大低估了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对中共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因为相关讨论往往聚焦于中国成功所带来的风险，而非失败所带来的后果。但中国自 1979 年以来未曾发动过重大军事行动，而那一次它输了。如果你是习近平，你究竟能有多大信心，确信解放军能够成功执行一场大规模两栖入侵？你又能有多大信心，确信美国会保持中立？这些都是极为巨大的赌注。如果被逼入绝境，或许你会选择冒险一搏。但如果台湾没有把你逼入绝境，美国也没有把你逼入绝境，更容易的路径就是等待——耐心蓄势。希望这正是我们目前所走的道路。

倪：如果让您指出未来五年中，台湾安全方面最被低估的单一风险——也就是在华盛顿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因素——您会选择什么？

库：台湾自身。华盛顿需要得到保证，确信台湾正在尽其所能保卫自身。遗憾的是，在野党在立法机构中对防务预算的抵制，正使这里的人们对台湾在自我防卫问题上的认真程度产生怀疑。这种印象很重要。

而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无论是今年晚些时候，还是 2028 年——台湾民众对美国保持一定程度的信心同样至关重要。如果他们失去这种信心，我认为台湾内部将出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寻求某种与北京的妥协安排。我不认为这样的安排会对台湾人民有利。但如果他们真心认为自己无法信任美国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支持这种安排。

因此，台湾内部的政治动态，可能是最为关键、也最被低估的变量。这种相互保证的结构——台湾必须愿意为自己而战，而美国必须可信地承诺，一旦台湾开战便会出兵相助——是十分脆弱的。如果华盛顿与台北之间的相互信任因为一次重大失误而崩溃，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一方撤回信心，另一方便随之转而依照自身利益行事。

访谈

莫伊努尔·哈克
苏利利

中国民主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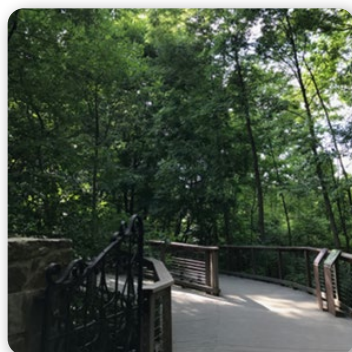
第4卷 第3期
2026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孟加拉起义：2024 年学生抗议、军队 背弃与政治转型



莫伊努尔·哈克



苏利利

编按：孟加拉 2024 年民众抗议的成功与接下来的政治转型，是近年来全球民主衰退背景下少见的新气象。本刊上一期曾发表两篇译文分析介绍这一历史性事件，为给中文读者提供更细致、丰富的信息，我们委托社会运动研究者苏利利女士对穆罕默德·莫伊努尔·哈克（Mohammad Moynul Haque）做了这个专访。哈克出生于孟加拉，曾获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学位，目前是达卡贾格纳特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非暴力行动、公民抵抗、民主与政体转型等。访谈追溯了 2024 年孟加拉运动的起源、发展与结果，讨论了在断网条件下学生们如何动员和非暴力行动战略的重要性，并特别关注了孟加拉国军事精英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拒绝实施大规模镇压、支持政治转型以及军方与旧政权和临时政府之间的关系。访谈还探讨了革命后的政党政治、选举结果、学生领袖向政治家转型以及孟加拉民主的发展前景。

苏利利（以下简称苏）：我对 2024 年孟加拉国爆发的七月革命做过一些研究，但不是很深入。很荣幸能邀请你来讨论这个话题。我想从

孟加拉公务员配额制度开始。因为我们的读者对这场运动最初为什么会开始可能并不太了解。

关于配额制度，我最初是从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的那个时间点知道的。希望你先给一个关于这个配额制度的整体介绍。

哈克（以下简称哈）：七月革命确实是孟加拉国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也一直对这个问题保持关注。就像你一样，我也研究了 this 事件的一些细节。公务员配额制度为特定群体预留了一定比例的政府职位。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有 30% 的名额留给 1971 年解放战争中“自由战士”的后代。

这个制度可以追溯到 1972 年，也就是独立运动之后不久。当时的政府在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领导下，把配额作为国家建设和民族整合的工具。穆吉布说，我们要尊重那些为独立做出牺牲的人，并确保他们的家庭在战后重建和区域重建中不会被落下。基于这一点，当时引入了配额制度。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配额制度经历了各种政治操弄，逐渐演变为不公正、不平等的政治，最终导致了我们在 2024 年看到的严重后果。如果我们将这个配额制度与 2024 年的运动相联系，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诱因或催化剂。

如果跳出学生运动的角度，客观来说，政府在 2024 年恢复配额的官方说法是合法的，因为最高法院在 2024 年 6 月 5 日裁定恢复配额，理由是人民联盟（Awami League）在 2018 年行政废除配额的行为是越权的。这意味着 2018 年政府没有权力单方面推翻一个法定制度。

因此，上诉法院在 2024 年恢复了该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只是遵守了司法裁决。

但批评者并不同意，他们认为配额政策存在很大问题。几十年来，政府职位中有 56% 被分配给各种配额类别，只剩下 44% 留给按能力竞争的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叙事：分配比例已经被政治化了，于是围绕这个问题就引发了社会矛盾。许多大学生开始呼吁彻底废除这个配额制度，反对 2024 年政府再次恢复 2018 年的安排。结果冲突就爆发了，随后我们看到，诉求从配额问题发展成要求总理辞职。

苏：转变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但配额政策是诱因，促使不满变成一场运动的“导火索”是什么？我记得它是从一名大学生被枪击开始的。能介绍一下相关背景吗？

哈：在 7 月 5 日恢复配额之后，学生开始在校园内进行动员。他们最初主要局限在校园内。这场运动后来变得激进起来。实际上，这一变化可以追溯到一个关键性表态，在国内外媒体广泛传播这个表态。2024 年 7 月 14 日，时任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公开把抗议者称为“拉扎卡尔（Razakars）的后代”。这个表态对抗议者来说非常有挑衅性，可以说，是对我们新一代的诋毁。

“拉扎卡尔”意思是“协同作祟者”，在历史上来指 1971 年大屠杀期间协助巴基斯坦军队的人。因此，在这样一个把解放战争视为国家认同核心叙事的国家里，把学生抗议者称为“拉扎卡尔”的子孙后代不仅仅是侮辱，这实际上是对距离 1971 年几十年后出生的一代人提

出叛国指控。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导火索。

总理的表态直接激怒了学生群体。结果如我们所见，达卡大学以及其他高校的许多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并高喊口号。比如，“你是谁？我是拉扎卡尔？！拉扎卡尔？！”，以及“谁说的？谁说的？独裁者！独裁者！”而这里的“独裁者”，指的就是谢赫·哈西娜。从那个时候起，学生开始把哈西娜称为“独裁者”。然后，在 48 小时之内，抗议者与政府支持的学生组织“学生联盟”（Chhatra League）之间发生了冲突。警方对学生抗议者使用了暴力。7 月 16 日，（朗布尔）贝古姆·罗克亚大学（Begum Rokeya University, Rangpur）英语系的一名学生阿布·赛义德（Abu Sayed）被枪杀。这一事件大大地激化了抗议活动。学生们有了一个真正的动力，他们必须反抗，因为他们的同伴被人杀害了。

亲政府的学生团体积极配合政府执法机关严厉镇压，不仅在学生群体中引发了强烈不满，也激起了社会其他群体不满。阿布·赛义德被枪杀的画面被拍摄下来，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对学生和公众构成了一种道德冲击，极大地扩大了参与规模。这种情绪强劲地推动了抗议动员，成了实际上的运动助燃剂，使其最终演变为广泛参与的、反对哈西娜的运动。随后，为了遏制这场抗议，政府在 7 月下旬实施了宵禁并切断互联网，但讽刺的是，这反而进一步激化了运动。当学生被切断互联网和其他通信手段时，他们变得非常愤怒。这也成为推动这场运动的另一个因素。

苏：你刚才不仅提到了宵禁，还提到学生上社交媒体，但我知道政府也封锁了社交媒体，特别是 Facebook 和 X (Twitter)。学生是怎么上

网动员他人的？

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也采访过一些抗议活动人士，他们使用了 VPN，通过 VPN 进行在线交流。当政府完全关闭宽带网络时，一些学生改用了 2G 手机来保持联系。他们不用智能手机，就改用按键手机，就是那种旧式的诺基亚手机，只用于发短信。

苏：那他们必须彼此知道电话号码。

哈：是的，他们互相都有电话号码。有些人彼此是很亲密的朋友，像纳希德·伊斯兰（Nahid Islam）、萨尔吉斯·阿拉姆（Sarjis Alam）以及其他活动人士，等等，彼此关系都很密切。他们知道彼此的宿舍房间号，也知道彼此的手机号码。他们当时就是用按键手机通信的，这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有趣情况。在政府关闭包括 Facebook 在内的所有应用之后，他们就通过短信和直接通话来交流、保持联系。

苏：政府为什么没有拦截他们的电话？在中国，政府在监听电话方面非常强。

哈：我认为你说的情况是一种智能镇压。政府实际控制了媒体、光纤以及其他互联网基础设施，但忽略了对移动通信网络的控制，因为政府并没有预料到这种规模的风暴会降临。当时还是一些顾问建议他们关闭社交媒体或切断互联网，这样就不会扩散得那么快，于是政府就立刻采取了行动。但我认为他们忘记了关闭这些按键手机的通信网络。

苏：学生采取了非常聪明的办法。我还想了解军队的角色。我知道军队跟警察、亲政府学生组织和边防部队属于同一阵营，但后来立场发生了变化。是什么导致军方改变立场？

哈：我认为军方见证了自己的历史。他们一直都与孟加拉的政治密切相关。在政治抗议运动中，军方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 1990 年之后，军方开始抓住机会参与政治，因为在 1975 年之后，军方曾经接管政权长达 15 年，但由于国际压力，军政府统治无法长久，后来军方实际上也不愿意直接接管政权。在 2007 年到 2008 年危机期间，军方曾支持过一届看守政府收拾局面，而没有直接接管政权。

军方明白，如果直接控制国家，就会失去国际社会支持。他们更倾向于默许或间接支持抗议运动。军方这一行为是决定这次起义结果的一个关键变量。军队在最初被部署来维持秩序之后，你可以看到，在瓦克·乌兹·扎曼（Waker-Uz-Zaman）将军领导下，拒绝对平民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扎曼公开表示军队不会向平民开枪，他说这不符合孟加拉军事文化。

军方也不想借机掌握政权。但很明显，后来的临时政府是在军方支持下成立的。军方和瓦克·乌兹·扎曼将军实际上与多个政党进行了协商，在幕后发挥了作用。

军方不愿掌权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结构性限制。比如孟加拉是联合国维和任务最大贡献国之一，这些维和任务为军队带来了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入。如果大规模杀害平民，可能会立即引发联合国制裁，终止

其参与维和行动。这显然不符合军方利益，因为军方不想失去参与联合国任务的机会。

另一个因素是瓦克·乌兹·扎曼将军本人。他跟哈西娜可能是远房表亲，大概是远房的姻亲关系。我记不清具体关系是什么。有意思的是，尽管他是哈西娜的亲戚，但他优先考虑的是军方的长期合法性，而不是对哈西娜的短期忠诚。他没有选择短期忠诚，也就是不愿支持哈西娜，因为他希望保持军队的信誉（integrity）让军队远离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

因此，不同于 1975 年和 1982 年，这次军队内部没有派系认为政变是有利的。这正是我一开始提到的重点：军方不想重复过去的模式。军方更多是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政府。

苏：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支军队与以前不同，部分原因是领导人不同吗？这个领导人虽然是哈西娜的亲戚，但他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这使他能够站在学生一边。

哈：是的。瓦克·乌兹·扎曼大约是在（2024 年）6 月 23 日刚刚接任军队领导人。他刚刚担任陆军参谋长，当时可能在想：现在这个重大考验就摆在自己面前，该怎么办呢？他选择了不卷入有争议的政治，所以与过去那种接管权力的政治保持距离。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肯定的是，他有一定愿景，希望把国家带回正确的轨道，也就是民主轨道，否则他完全可以轻易就干预进来。当时他拥有利用国家权力的所有条件，但他并没有追求这种对国家权力的掌控。

苏：让我们看看另一个国家——缅甸——的情况。今天的缅甸，军方直接掌权是重点，军队领导人成了国家元首。缅甸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循环：“军方政变→社会运动→新政府→再次政变”。

基于这种观察，去年，我认为孟加拉的未来可能仍然充满不确定，觉得孟加拉军方似乎想直接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所以，我当时认为情况可能会像缅甸那样，回到刚才说的那个循环。你的看法是，这是一支新的军队，现在的孟加拉军队跟以往不同了。但为什么哈西娜这样的政府会提拔一个与她立场相冲突的将军？当然，一个人的立场有可能过去是模糊的，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

哈：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实际上正是这支军队协助哈西娜从孟加拉逃往印度。他们安排了所有相关程序，以确保她安全前往印度，而军方其实完全可以像缅甸那样把她软禁起来，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选择让她自由离开，然后开始重建这个国家。也就是说，在政府缺位的情况下，军方与多个政党展开对话，以填补权力空缺。军方联系了一些政治人物，包括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Dr. Muhammad Yunus）。在与各党派和七月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协商之后，军方邀请尤努斯回国。他们希望由像尤努斯这样有国际声望的人，而不是学生运动领导人纳希德·伊斯兰（Nahid Islam）来领导，因此请求尤努斯担任临时政府负责人。所以可以说，军方实际上促成了过渡政府——这就是由军方主导的过渡。

苏：在这场运动中有一个发挥关键作用的政党，就是孟加拉国民党（BNP）。BNP 在当时具体发挥了什么作用？

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BNP 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到 2024 年就冒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这场运动的受益者究竟是谁？BNP 突然出现在舞台上，声称这是他们的运动，说他们在哈西娜的独裁统治下领导了 15 年的斗争。BNP 的做法使得 BNP 处在一个既尴尬又精明的位置：“精明”的意思是指他们给予的支持足以使他们从起义成功中获益，但 BNP 同时又显得保守、克制，以免自身有争议的历史影响这场运动。这是因为 BNP 长期被排除在严重分裂的政治权力之外——在哈西娜统治下，BNP 大批中低层干部和活跃分子被系统性地抓捕入狱。哈西娜禁止 BNP 举行政治集会，其支持者也受到骚扰。他们的领导人卡莉达·齐亚（Khaleda Zia）也因腐败指控被判刑，那一判决被普遍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在运动早期阶段，BNP 成员参与了一些声援活动，但党内领导层认为，直接参与会让哈西娜把抗议定性为受反对党操控的运动。BNP 不希望哈西娜借机打压他们，说这是 BNP 在幕后操控，然后又清算到 BNP 头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 BNP 谨慎地参与了这场运动。

但在 8 月 5 日之后，BNP 的策略发生了明显转变：他们突然转而要求举行选举，并企图利用反人民联盟情绪，趁这种公众情绪尚未变化之前抢占政治优势。BNP 认为现在可以把公众情绪转化为自己的选票基础，让人民给自己投票。所以，在抗议取得一定进展之后，BNP 曾试图说服民众：选举是可以使孟加拉重归民主的唯一途径。后来 BNP 在选举中获利就跟这个有关。这非常有意思，BNP 希望把群众支持转化为自己的票仓。他们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因为从结果上来看，BNP 在 2026 年 2 月议会选举中，在 300 个直选席位中获得 209 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苏：我们开始时曾讨论配额制度。配额制度给“自由战士”后代保留30% 名额进入政府岗位。这些“自由战士后代”是谁？他们只是人民联盟的后代吗，还是也包括 BNP 的后代？这个群体包括哪些人？

哈：这些人指的是战争老兵的后代，也就是我们称为“自由战士”的孙辈。但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是，70 年代之后，其实很难再找到他们真正的孙辈。却仍然有一种现象存在：在这些“自由战士”的家族中，有人声称自己是孙辈，或者是孙辈的亲属。这些人用这种办法让这种身份继续存在，他们会说：“既然我的祖父辈是自由战士，那我也属于‘自由战士’家庭，所以我有权享受这个配额。”这些“后代”就是以这种办法混进来的。

苏：那么，这些后代中，有没有 BNP 成员的后代，还是主要是人民联盟的后代？那这些人是支持人民联盟多一些，还是支持 BNP 多一些？

哈：实际上，我们国家大致分为两个政治阵营。一个阵营是亲独立阵营，由人民联盟领导；另一个是民族主义阵营，由 BNP 领导。属于亲独立阵营的这类人通常属于人民联盟。人民联盟认为，如果招收这些自由战士的后代，他们就会忠于人民联盟。结果就是，大量政府职位被支持人民联盟和亲独立意识形态的人占据。这样一来，人民联盟就想要有这样的安排。人民联盟试图在民众中灌输一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热情，以确保人民始终支持人民联盟作为执政党。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背后就隐藏着政治因素。

苏：这里存在强烈的价值冲突。一方强调要靠能力，另一方则强调要

靠身份。我的理解是，这才是真正存在于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冲突。那么 BNP 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呢？

哈：BNP 实际上默默地给学生提供了支持，因为 BNP 也试图提供一种不同于人民联盟意识形态的替代方案。BNP 认为，人民联盟正在通过配额制度来争取大多数人支持，而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东西可以提供给新一代人，因此 BNP 就想拆解这种体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学生不去加入人民联盟，而是加入 BNP。BNP 努力鼓励学生把配额问题当作一个核心议题，因为配额制度具有歧视性，并且不承认学生的能力。这样一来，学生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配额，要求尊重能力。这样就形成了“能力 vs 配额”的对立。“能力对抗配额”的抗议口号就是这么来的。BNP 支持能力原则。

苏：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尽管 BNP 各级领导人遭到了全面打压，但 BNP 仍然存续了下来至少 15 年之久。为什么哈西娜政府会允许反对党一直存在？

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传闻有很多。有一种说法就是，一些 BNP 领导人与人民联盟高层有过协商，目的是避免 BNP 被彻底清除或者全部送进监狱，所以在幕后存在着某种秘密协议。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存活下来，但他们并不处于权力核心位置。也就是说，他们表面存在，但作用非常有限。他们只是维持一般政治活动，比如组织一些较温和的抗议活动，但并未对人民联盟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人民联盟允许他们存在。而当他们被认为（对执政）有威胁时，就会被逮捕。BNP 中低层领导人被送入监狱是家常便饭。BNP 平常就是这

样熬过来的。

苏：哈西娜也想维持一种“民主”形象，对吗？

哈：是的。哈西娜一直定期举行选举，她需要选举来维持表面上的合法性。这种体制属于“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既不是完全民主，也不是完全专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是一种灰色地带。

苏：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学生运动实际导致人民联盟或哈西娜权力崩溃，但当在谈到新的选举时，是 BNP 领导人而不是学运领导人掌权？这是为什么？

哈：我认为，这是因为使革命成为可能的技能不等于竞选技能，也就是说，你可能具备运作革命的技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借助这种技能在选举中获胜，孟加拉就是这种情况。在选举政治方面，BNP 比那些实际领导革命的抗议者有更强大的组织能力。2025 年 2 月成立的国家公民党（NCP）是在革命之后不久成立的，他们在选举前只有不到 12 个月的准备时间，而且也没有全国性的组织结构。他们没有成熟的竞选体系，也没有票源网络。在 300 个选区中，他们没有具有知名度的地方候选人。BNP 具备这些条件，他们有这些基础，而且他们已经积累了 15 年。人们知道 BNP 是孟加拉第二大政党，所以说，BNP 拥有这样的声望。尽管动员和推翻哈西娜确实是由学生运动推动的，但这场革命的基础来自 BNP。BNP 本身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他们拥有基层组织 and 领导结构。这就是为什么 BNP 赢得了 209 个席位，

而 NCP 在 30 个选区中只赢得了 6 个席位。这说明赢得选举比推翻威权政权需要更多的技能。

苏：选举政治与抗议政治是不同的，对吗？

哈：是的，确实如此。

苏：现在我们来谈谈民主本身。目前 BNP 是执政党，他们现在是否面临反对派，因为我认为人民联盟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了。通常的民主政治至少有两个主要政党，对吧？一个执政党，一个反对党。那么，现在反对 BNP 的政党是谁？

哈：在议会中真正的反对党是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以下简称大会党），他们与国家公民党（NCP）是合作关系。BNP 是议会中最大的政党，而大会党与 NCP 联合组成反对党联盟。人民联盟已经退出政治竞争，他们被取缔了，还要面临法律指控。我不知道这些指控是否会很快被取消，这取决于法律程序，至少目前不能把人民联盟视为反对党。我们现在的反对党是大会党，他们在过去 50 年一直没有掌权，现在他们第一次有大量成员进入国家议会，这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机遇，向民众证明他们是真正代表人民的。

我有时通过媒体观看议会会议，我看到大会党对政府进行批评时，常常被打断，但他们并没有阻碍政府运作。最近孟加拉面临严重能源危机，大会党主动建议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找出造成能源危机的漏洞和解决方案。政府也积极回应了这一建议，表示将成立一个由执政党

和反对党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这是孟加拉目前出现的一种发展趋势，这种情况相当少见，即反对党对执政党持相当支持的态度。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大会党作为反对党，其所发挥的作用相当正面。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认为反对党过去的负面形象会有所改善，还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反对党政治模式。

苏：那你怎么看孟加拉的未来？

哈：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如果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先思考我们如何理解“民主”。我们是否认为民主只是取决于选举结果或选举本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孟加拉现在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因为在很长时间之后，孟加拉终于有了一次有公信力的选举，还受到许多国际观察员的高度评价。我们也看到许多政治参与者的行为更加民主化。与过去相比，在 2026 年的选举中，伤亡人数也更少，政党之间的对抗也减少了。因此，如果从选举政治的角度来看民主，那么可以说这是孟加拉民主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的迹象。

在这次选举中，还举行了一次公投，有 68.6% 的选民投票支持宪法改革。参与宪法公投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 60.26%。如果 BNP 在其任期内落实这些公投内容，那么孟加拉有一个更能被问责的政府，因为公投内容包括规定总理任期最多两届、建立三权分立的司法体系、以及设立独立的反腐败委员会等等。

这些都预示着良好治理的方向。如果这些改革能得到落实，那么我对孟加拉建立新的民主治理体系非常乐观。但我认为仍然存在一些结构

性风险，比如“赢家通吃”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在孟加拉政治中根深蒂固：执政集团往往会操弄权力，操控媒体、官僚系统和警察，就像哈西娜那样。这种结构尚未被打破，至今仍然这样运作。

这很讽刺，但事情不止于此。BNP 自身也有历史问题。BNP 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政党。他们有着臭名昭著的腐败历史和失败的治理经验。此外，大会党和 NCP 也有人抵制 BNP 的宣誓就职，他们要求尽快落实公投内容，但 BNP 并不打算立即实施这些改革，他们希望能宽限一些时间。我不知道大会党和 NCP 会沉默多久，但如果 BNP 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果公投内容得不到解决的话，未来 BNP 与大会党之间就可能发生冲突。所以我既有一些乐观，也有一些悲观。

再补充一点：我担心 BNP 不能摆脱“威权均衡陷阱”。也就是说，执政党利用国家权力巩固自身地位，使得权力和平更迭变得异常困难，其结果就是权力更迭要么产生危机，要么只有通过危机才能实现权力更迭。我不确定 BNP 能否避免这种情况，也许在某个阶段，BNP 也会在民主外衣下重新走向威权。目前在孟加拉，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苏：我还想回到 7 月革命，因为还有与民主运动、非暴力抵抗相关的问题，要与你讨论。在 2024 年，我不认为学生们事先有组织，他们应该没有这种准备。那么，他们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么大规模动员的？如何突然之间动员起这么多人来参与这场运动？

哈：是的，他们并没有正式的政治组织背景，也没有主流政治地位，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有紧密联系。所以我说，这是一场网络型运动。

在这种网络型运动中，你可以得到一些便利，例如可以迅速与同伴建立联系。在孟加拉，大多数动员发生在大学校园，而大学本身具有一些优势。为什么？因为学生住在宿舍里，而宿舍彼此距离非常近，学生可以很方便地面对面交流。同时，他们在 Facebook、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上的联系特别密切。学运就是这么迅速扩散的。可以说，是 Facebook 在短时间内促成了学生之间的大规模动员。

苏：我觉得这对中国人来说也很重要，因为他们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靠网络建立联系。

哈：我还想说，2024 年的运动形式与 2013 年孟加拉的“沙赫巴格”（Shahbag）运动有一定联系。“沙赫巴格”运动是在很短时间内组织起来的，而且是一场广泛传播的运动。我认为这是孟加拉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非暴力公民抵抗，我的博士研究就是这个主题。我在论文中证明，这是一场规模最大的公民抵抗，有学生和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并且采用了明确的非暴力战术。那些非暴力战术推动了学生的大规模动员，吸引了大量参与者。当一场运动以非暴力方式组织时，学生们会更容易将它发展成规模巨大的运动。

非暴力是一种对抗的技术。它并不是消极地坐在那里要求改变，而是一种针对政府或权威发起的行动，但不使用暴力，而是使用策略、技巧。比如，你向对手投掷鲜花，对方却用枪指着你，这时他们开枪就缺乏正当性，因为你没有挑衅他们，你只是向他们投花。鲜花不能用子弹来回答，对吗？这就是一种非暴力策略。

再比如，你在对方面前唱歌，这种歌声会引起很多学生共鸣，这就拧成了一股绳，你知道这就是团结。当他们听到这种音乐并感到振奋，他们就会来到现场支持运动。这些非暴力方法，包括静坐、示威、抗议、口号。比如，有这样一个口号：“是谁说的？！是谁说的？！独裁者！”还有，“我们变成了谁？！我们变成了拉扎卡尔？！”这些口号激发了社会各阶层，人们听到后情绪爆发：哈西娜竟然说我们是拉扎卡尔？！绝对不行，我们要反抗！口号本身就是一种非暴力工具。这种非暴力方法使运动更加壮大。非暴力正是吸引大量人参与的原因，这就是反对哈西娜的抗议基础，它通过非暴力方法达成了目标。

苏：在我看来，这种非暴力战术是为了避免冲突升级。在政府方面，他们没有理由升级冲突，对吗？

哈：是的，原因正是如此。他们没有理由对这些抗议者升级暴力。

苏：是的，即使他们真的升级暴力，也很难对他们进行严厉惩罚。我记得在 2019 年的香港，抗议者不也创作了自己的歌曲吗？这些歌曲也是抗议歌曲。这些抗议歌曲，即使政府想阻止他们演唱，也不能仅仅因为唱支歌就把他们关押多年，对吧？

哈：是的。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战略性的领导。这类运动通常被称为“无领导运动”，你找不到一个突出的领袖，可以说他们每个人都是领袖，所有人都是领袖。你也找不到一个当地的领导中心，这是一种在实际的抗议运动中被使用的策略。所以，这场运动，在无领导、网络型动员和非暴力等策略的共同作用下，促成了反对哈西娜的抗议

取得成功。

苏：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种策略是让运动保持无领导的状态，这样使每个人都相对安全，但在成功之后，由于学生运动是无领导的，结果在选举中没有人真正拥有影响力。这就意味着，即便你是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之一，也不见得你就会成为国家领导人。那么，对于想要掌权的人来说，这存在着一种两难的困境：你希望带领运动取得成功，但成功之后却未必有政治影响力，也就是说你不会成为国家领导人。

哈：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我读过很多关于孟加拉学生运动和学生领袖的研究。在 1952 年的语言运动中，学生们做出了重要贡献。在 1990 年代，他们也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其中，学生领袖发挥了很大作用。在 2013 年以及 2024 年，学生主导了运动进程。但在这一次，也是孟加拉历史上第一次，学生领袖变身成为了政治精英，也就是说，从政治活动人士变成了政治精英。现在有两到三位学生领袖进入内阁，他们被选为了国会代表。在孟加拉历史上，从来都是学生领导人付出很多努力，却得不到议会席位。但 2024 年的运动让学生成了政治人物。我认为这是学生政治的一种创新。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学生政治将为孟加拉民主带来积极成果，因为搞政治不能够没有任何目标，你必须要有目标、成为有远见的领导者。这场抗议为此提供了渠道，它成为通向政治领导人的路径。

苏：就此看来，这场运动产生了三赢的结果：BNP 获得了大胜，大会党也赢了，学生也有所斩获。

哈：绝对如此，而且学生政治本身也成功了。

苏：我认为，在中国，学生活动人士可能会觉得，就是自己希望将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似乎也不现实。如果你希望自己未来进入政治并成为政治精英的话，学生政治就是这样一种途径。

哈：是的，你说的对。这一现象也启发了其他国家。例如，在尼泊尔2025年“Z世代抗议”结束之后，有多名学生活动人士也成了众议院议员。这一趋势在今天是很强劲的，在孟加拉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学生如何在两种课堂中锻炼自己。一些学生们对参与街头政治和街头教育，比对你课堂里的教育更有兴趣。

苏：这确实很有启发性，对很多仍然在奋斗中的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今天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专访。同时，我非常赞赏你的见解和渊博的知识。

哈：对，谢谢你，利利。谢谢你对孟加拉的兴趣并让我在这里与你讨论。

笔谈

钟伟锋
张伦
王超华
苏利利
胡平
王天成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3期
2026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通向民主之路： 军人的角色问题

编按：军队是独裁政权极其重要的权力支柱。民众非暴力斗争的战略规划者必须考虑如何获得军队的同情，促使军队撤销、停止支持独裁政权。从世界范围的历史看，不少大规模的非暴力行动，因为军队拒绝参与镇压、不再效忠独裁政权而取得了成功，开辟了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道路。但也有不少非暴力行动，因为军队参与的残酷镇压，加之缺乏有效应对镇压的战略，而惨痛失败，并削弱了未来坚持非暴力的信心。

当今中国的活动分子、意见人士，在暴力与非暴力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不少主张采取暴力的人寄希望于军人政变，并且以这一期待来驳斥非暴力主张。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值得探讨。理清思路有助于反抗运动的规划、开展和成功。

当大规模民众抗议发生的时候，抵抗运动最好应给军人发出什么样的信息？是号召军人捍卫自己的荣誉、拒绝镇压民众，还是更进一步，发动政变推翻独裁者？

军事政变如获成功，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权力格局，它对于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上是否有这方面重要的比较研究、统计分析可供我们借鉴？军人是否最好保持“政治中立”，让民众与独裁政权的冲突以政治而非武力方式解决？

中国的军人和民主、人权活动人士，是否都有责任从1989年的血腥悲剧中吸取教训，尽可能避免大规模流血？如何避免？

受《中国民主季刊》邀请，钟伟锋、张伦、王超华、苏利利、胡平和王天成等六位人士，就上述问题进行了以下讨论。



钟伟锋（乔治梅森大学默卡特斯中心学者、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高级顾问）：把民主转型的希望寄托在军人政变上，并以此驳斥非暴力路线，这种期待混淆了

两个必须分开的概念。政变（coup）是军人夺取国家权力，而背离（defection）是军队拒绝替政权镇压民主运动。指望军人夺权，是押错了赌注。民主转型真正需要的是背离，不是夺权。而要让镇压机器失去确定性，归根结底是一个信息问题。

先看政变。比较研究并不支持“政变能带来民主”的命题。政变后即便有选举，也常常不足以巩固民主。埃及即是前车之鉴——2013年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领导军方推翻民选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次年经选举正式上台，但随即恢复并强化了军方主导的威权统治。从更大的样本来看，威权崩溃的例子中，近一半只是从一个威权变成另一个威权而已。¹而其中最可能“还政于民”的是军政府，最不可能的是高度个人化的强人政权。习近平治下的中共政权已高度个人化，因而不属于政变后能“还政于民”的那一类。

与此相对，非暴力路线胜算更高。从1900至2006年的数百场民主运动中，非暴力抵抗的成功率是暴力抵抗的两倍以上；其关键之一，正是军方的中立化与背离——面对手无寸铁的人群，士兵更难为开枪找到理由——不是政变。²

那么军队会不会背离，由什么决定？政治学者瑙尼哈尔·辛格（Naunihal Singh）在《夺权》（Seizing Power）中，基于1950至2000年间471次政变企图的数据指出，军队在危机时刻

的选择本质上是一场协调博弈——决定结局的不是谁更强、也不是某位将领良心发现，而是谁能让更多军官相信“大势已定”。³背离需要共识，而共识依赖信息。

1989年确实暴露出军队并非铁板一块的现实。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接到进京戒严命令后当即拒绝，宁可入狱也不带兵进城，部分部队迟疑观望。由此可见军方的忠诚并不是想当然的。但这些裂缝最终没有汇成一场足以改变结局的协调博弈——中共靠调外地部队强行压下了广场上的示威者。

而过去三十多年，中共在持续修补这个弱点。2016年习近平将原七大军区改组为五大战区，重塑联合作战指挥体系；2018年元旦起，武警脱离国务院，改为由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无论官方动机如何，这些改革至少有一个政治效果：压缩军内协调空间，把强权集中到最高领导层手中。即便是1989年的那种迟疑观望，现在也更难出现了。

在此之上，又叠加了人工智能监控的因素。在人工智能时代，监控会更自动化，并能把检测、追踪与威慑从人转移给系统，从而减少政权对一线安全部队的依赖。只要人们认为自己时刻被政府盯着，他们横向联络的成本就变得很高。从协调博弈的框架来看，这会削弱背离所需的共同知识。这正是呼吁军人拒绝开枪越来越无力的原因。军人没有变得更忠诚，只是政权更善于阻止他们横向联络而已。

那么支持民主一方还有没有筹码？其实还有，恰在信息这一端。镇压依

赖命令、宣传、动员和对局势的“定性”，因而政权必然要在官僚语言里留下痕迹。我和合作者开发的开源项目“政策变化指数”（Policy Change Index, PCI）中有一个针对镇压的模型，通过机器阅读《人民日报》的官方宣传，能从官方话语中识别由“游行”转向“动乱”和“暴乱”的转折，从而推断镇压风险上升、官方定性转向的信号。换言之，镇压有其“指纹”。

那支持民主一方该向军人发出什么信号？我认为不应是号召他们夺权，而应是传递一个可信的“大势所趋”的信号，让背离重新成为他们的可能选项。民主运动真正的优势不是政变，而是开源的预警与协调。谁能更早识别镇压链条中的裂缝和犹疑的信号，并帮助人们横向联络，谁就更可能让镇压机器失去确定性。六四给双方的真正教训，不是“军队也许会救我们”，也不是“军队一定会镇压我们”，而是那场镇压其实有迹可循。

下一次，谁能赢得信息之争，谁就能决定结局。



张伦（法国赛尔奇 - 巴黎大学教授、1989 年学生抗议领袖）：军人在民主转型中的角色至关重要，多年来各国学者多有研究，即对所谓“转型守门人”（the Gatekeeper Proposition）的探讨：它在面对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及反对派的挑战时，选择或拒绝镇压，关系转型成败；军队不可能单独达成民主，但却能决定民主能否建立。至于军队在转型中为何扮演了不同角色，最终态度的取舍，牵涉诸多其内部结构、运作方式，军队文化以及转型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国际环

境等多方面的因素。

以 1974 年被亨廷顿视为第三波民主发端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为例，假如没有那些青年军官们精心策划领导的“武装部队运动”，那场革命是不可能发生也很难最后成功的。但那场运动的产生，则又是与整个二十世纪葡萄牙军人的历史以及当时的情境条件有关的。之前有过的数次军人起义与政变，指向不同，都决定性地影响了葡萄牙的世纪进程。如 1910 年 10 月推翻长达八个世纪的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革命，就是由里斯本的共和党士兵、水手以及平民发动起义引发的。但后来，激进的改革，各种内外因素，包括政治派别冲突造成政治与经济长期不稳定，又导致 1926 年的军事政变。此次政变之后建立了所谓的“第二共和”，亦称“民族专政”（Ditadura Nacional）政权，大学经济学老师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被执掌军人政权的若热·门德斯·卡贝萨达斯（José Mendes Cabeçadas）将军任命上台，开始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威权统治时代，其中军队一直是政权的最重要支柱。但随着葡萄牙在应对殖民地爆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陷入困境，高级军官利益与政治绑定固化，下级军官晋升制度上遭遇不公，军队内部挫败与不平感日增，最终又是军队终结了这个政权。是中下层军官们的选择，以及他们与和社会有极强关连带且厌战的义务兵结盟，带动了军队上层，决定了军队的走向。

以此来引申，探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中军队的可能立场，也需要对军队内部结构，制度运作，包括对不同军人与权力体系的关系和对社会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军队的文化跟传统等等做更细致的分析，这样相关讨论才有意义。例如军队内部高级军官与中低级军官利益同构或

冲突的问题，又如现行法律名义上是义务役与志愿役相结合，但事实上以志愿役为主的征兵制对军队构成及立场可能的影响，再如受整体制度及社会环境左右衍生出来屡禁不止（已带有制度化特征）的大规模军队腐败及其后果，还有因军事现代化进展而有所强化的军人职业化趋势对型塑军人的自我认知、社会认知、以及军人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倾向的作用等等……因各种显见的原因，我们缺乏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条件，但起码要有意识且努力对每一个问题都尽可能做些细致研究，才不至于在军队与转型这个问题的讨论上陷于“空泛相因”，无的放矢。

以腐败为例：一方面因害怕利益受损，军队尤其是高级军官，对民主变革可能持敌视态度；但另一方面腐败也可能软化军官们固化的意识形态精神结构，这是否有助于将一些权力问题转换成可量化的利益计算呢？至于军队对党和党的领导人的忠诚问题，随着那批在文革期间为躲避去乡村或工厂从事严酷劳动，借助父辈关系进入军队，后成为高级将领的红二代陆续退役，未来民主转型中军队中立的可能性与“六四”期间相比是增加了还是弱化了？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王超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兼职助理教授、1989年学生抗议领袖）：未来中国发生变动、催生民主化进程的时候，军队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什么作用？

四十年前，追求民主化的中国人很少提出关于军队的问题，但 1989

年的六四镇压使得所有人无法再回避这个问题。历史和未来交汇在这里。就像未来可以从假设开始一样，历史研究也是容许反事实假设的（也即英文中的“counter-factual history”）。过去几年遇到的一些与此相关的假设情境，我以为有助于思考这个问题。

在回溯六四历史时，吴国光教授的“军事政变说”认为，非程序军事调动为非程序最高层人事变更奠定基础，之后发生六四血腥镇压，这是中国式军事政变的三个重要步骤。苏阳教授殊途同归，也将动用军事力量置于社会运动造成的权力动荡和选择政治接班人的框架下考察。这类研究引起人们（包括我本人在内）提问：赵紫阳身处高位，既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又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如果他像叶利钦那样站到抗议民众一边，与邓小平等人正面对抗，军队是否会因为他的正式身份而跟他走？或者，军队会不会因此而坚决保持中立不介入的立场？

“抗命将军”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的庭审视频流出后，北京军区第28集团军何燕然军长和张明春政委率部抗命的情况也渐为人知。设若这几位将军不仅仅是各自（或联手）率部消极执行命令，而是坚持本部不介入，甚或如罗马尼亚军人对齐奥塞斯库夫妇那样采取主动行动，或者像张学良那样“兵谏”，是否真会发生当时盛传的诸如“38军和27军打起来了”那样的军内火并？

曾有一位留学生在“白纸”抗议后的政治讨论中问我，如果中国发生动乱，而不少驻扎湖南的河南籍军人，有可能被家乡父老召回，抢劫河南本县附近的军火库，割据一方，你们民运人士如何回应？我当时对这类问题毫无准备，匆忙岔开了话题。但他提出的假设需要更明确

的回应。

这些假设性提问至少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方向来探究。一个是中国人对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的心理恐惧和厌倦，另一个是中共治下的党军关系对军队内部指令传输架构的影响。以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控制的发展程度来说，虽然很难绝对排除，但政治动荡引起军阀割据的可能性应该说已经大大减小。同时，军队对社会和平民的威慑力，不仅在于其武力，尤其在于其基于内向忠诚度的令行禁止。离开原有建制的散落军人，除了个人英雄，很难在地方文官率领下实施有效割据。军阀割据重现的最大可能，恐怕还是个别中下级军官能够把成建制的军事单位成功带出来，置于自己脱离原有体制的绝对指挥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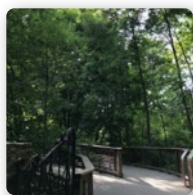
为什么说只有个别中下级军官有割据可能？这是因为中共治下特殊的党军关系。中共军队的内向忠诚度始终建立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之上，党主席 / 总书记理应兼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时期虽然属于例外，但即使名义上可以指责他“以枪指挥党”，但实质上职业军人仍必须听从“党”的指令。徐勤先的部下无疑非常想保护他个人，但却不会表态说跟著他走，指哪打哪，无视更上层的指令。“党指挥枪”在习近平时代发展得尤为极端，前面的各种假设完全可以替换成假如张又侠提前动手会怎样，而且海外确曾有人这样提过。这就可以看出，从林彪到张又侠，哪怕军事长官在军队内部已经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也无法利用部队对其个人的忠诚度来保护自己不受清洗。

“党”及其“领袖”的权威永远高于具体的指挥官。张又侠等一大批高级将领被清洗，中高层将领跃跃欲试争夺空位，显示出中共军队内部行事看上级眼色的痼疾。这也是美方观察人士判断解放军高度中央

集权，缺乏灵活度和实战经验的原因。

在这种背景条件下，面对突发政治动荡时，我以为最高期待还是只能放在军队不介入上面，对个别指挥官做工作很难有实际效果。而一旦民主进程启动，推动者就必须尽快以“军队国家化”取代“党指挥枪”，建立军队向国家效忠的原则。

苏利利（社会正义与社群参与工作者、研究者）：我重点讨论军事政



变为何难以带来自由民主。判断军事政变能否带来自由民主，关键不在于军队是否推翻政府，而在于军队是否受制于一个真正限制权力的宪法秩序。在自由民主国家，宪法的合法性原则上来自人民主权，它既确立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也限制军队行为。在此结构之下，军人的天职不是“无条件服从”，军队的行为必须符合宪法的授权。

然而，在专制政权和混合型政权治下，军队跟国家的关系至少有以下两种类型：

1. 在第一类国家，军队成为“国家监护人”，往往表现为军队头脑可通过政变掌握权力，或容许文官政府在军方划定的范围内执政。在这种政体之下，军队虽名义上属于国家，本质上却凌驾于文官政府与法律之上，成为政治秩序的最终天花板，如泰国、缅甸、巴基斯坦和苏丹等。另外在拉美，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的前军事政权也曾属于此类；玻利维亚、秘鲁和厄瓜多尔则仍呈现不同程度的不稳定性。这些国家并非完全相同，但若军方掌权则对文官政治有最终否决权。

2. 在第二类国家，军队从属于政权，充当“政权安全的保护者”，军人异化为“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的暴力工具。从当代历史上看，军事政变在这类国家很少发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军队没有独立性，同时军队首领与最高掌权者之间的权力差距太大，如中国、朝鲜、伊朗、白俄罗斯以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图一 军队主导政体的循环政治

在这两类政权之下，都有过很多的民众起义并被血腥镇压，如历史上的阿根廷和现今的伊朗。

这样的政权，其脆弱性互不相同：

在第一类国家，政权持续高度依赖于军队维持国家主权独立的承诺。这类国家常会见到如图一所示的政治生态循环。在这些国家，军事领导人即使在不直接掌权的情况下，其存在本身也是对政权的威胁，而

公民社会虽可存在，但其社会运动往往遭到暴力干预并导致军方直接掌权。如泰国 2014 年政治危机导致军方直接接管政权；苏丹 2019 年民众起义推翻巴希尔（Omar al-Bashir）政权后，军方以过渡安排的形式保留最终权力，并在 2021 年再次发动政变，最终不同军方派系间因争权而爆发内战。

在第二类国家，如伊朗，其倒台过程会更为复杂。该类国家政权即使在对外的军事冲突中失败，其合法性遭到严重打击，但因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保持控制，就可观察的案例而言，从其军事失败到丧失政权之间或将经历很多年，如清朝从 1840 年起，历经 70 年才倒台。

军事政变，在军队监护型国家，只是政治生态的新一轮循环；而在政权控制军队型国家，即使发生军事裂变，也更可能引发夺权斗争或内战，而夺权的军队很少会主动将权力还给人民。因此，军队是否被置于人民主权与宪法之下才是关键而非政变。



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在民主转型中，军队扮演什么角色。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的八九民运就是被军队使用重大杀伤性武器镇压下去的。

有人批评说，中国八九民运的失败，败就败在学生和民众对中共产有幻想，而最大的幻想莫过于以为军队不会向民众开枪。这种概括过于简单

化。首先，当时的人们并非幼稚到以为“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要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民众自发地去拦阻而不是欢迎军队进城呢？再者，民众也不是不担心军队会镇压民运，所以他们才夜以继日地向军人宣传喊话，要求或鼓动军人拒绝执行戒严令。

批评中国人对共产党抱幻想的人，照例称赞东欧人对共产党不抱幻想。可是，如果说最大的幻想就是以为军队不会开枪，那么东欧人恰恰是抱有“幻想”的。手无寸铁的东欧人走上街头，他们当然不是去迎接子弹，他们是通过展现真正的人民的意志，打动当局及其军队中多数人的天良，分化瓦解专制统治集团。

“六四”屠杀招致世界各国的普遍谴责，但也有例外。例如东德共产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等强硬派公开赞扬中国的镇压行动，表示要向中国学习。然而，东德民众并没有被吓倒。在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爆发大规模示威，约7万（一说高达10万）民众走上街头，高呼“我们是人民！”东德政府则集结军队和警察准备镇压。接下来，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促成了东德共产党高层分裂，强硬派失势，示威活动和平落幕。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民主运动。一个月后，柏林墙倒塌，第二年，两德统一。

一方面，专制政权就是靠着枪杆子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另一方面，专制政权之所以会垮台，就因为在一定情况下，统治集团会分裂，镇压机器会失灵。正如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所说：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

行上级的命令；军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兵变。各国非暴力抗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例证。

以为共产党的军队不会向民众开枪并不一定是幻想。如果共产党的几百万现代装备的军队始终铁板一块，唯党命是从，那么共产政权的转型将是很难想象的——除非出了戈尔巴乔夫。我们必须相信，军队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批判“六四”屠杀的罪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激发军人的道义良知，就是为了改变军心。

在当今中国，民间不具备进行暴力抗争的物质条件。搞政变必须是高层，搞兵变必须是军人，民间无法直接参与。我们仍然要坚持非暴力抗争。我们应该做的是，用我们的文字与理念，用和平的集体行动所展现出的意志与力量，去影响和施压于那些高层的人以及军人。



王天成（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主季刊》主编）：“当我们谈论反抗的时候，应该问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等待某个或几个将军来拯救我们。军事政变即使发生，其前景也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事例少得可怜”，在《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2期的笔谈中，我曾这样写道。在此，我想先重申这一看法。

反抗的主体应该是民众，而不在别处。不要坐等军事政变，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军队角色问题之重要，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不只是不可避免的，还必须纳入战略考虑。那么，对于战略规划者而言，

在发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是积极争取军队背弃独裁者、拒绝开枪镇压民众，还是要更进一步，鼓励、号召、支持军人发动政变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分享几项比较政治学界重要的研究成果：

- 在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情况下，军事政变的机率会显著上升。根据 1951-2005 年的案例统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比平时高大约 2-3 倍，而且，非暴力反抗要比暴力更可能激发军事政变；⁵

- 尽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会提升，但机率显著低于军方拒绝镇压、中立或站在抗议者一边。在 1946-2014 年发生的被称为“专制终结游戏”的 40 个大型抗议中，军队拒绝镇压的有 15 个，政变只有 6 个；⁶

- 冷战后的军事政变在 5 年之内举行选举的比例显著高于过去，但多数没能导致高质量的民主，而是建立了“竞争性威权政体”，或不久后回归完全的威权统治；在曾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有相当数量后来又重复发生政变。⁷

这些研究值得给与认真对待。那些将希望寄托在军事政变的人，并没有想过军事政变可能导致的复杂情况。与军人抗命、拒绝镇压不同，军事政变意味着接管政权。从那一刻起，主动权将落于军方。军队将处于国家政治方向掌握者的地位，承担起并不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这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可能会有严重后果。

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军人领导的过渡政府可能会承诺制定新宪法、举行民主选举。它未必会兑现自己的承诺。以“秩序”、“防止国家分裂”、“为民主做准备”等名义无限制延迟甚至取消选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军方兑现承诺，它“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仍会作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者行事，在转型期间制定的新宪法中固化——或试图固化——其政策偏好”⁸。它所设定的转型过程可能会力图保证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宪法，并可能在新宪法中为自己保留实质性政治权力。⁹

或许有必要略举几个例子，以更清楚说明在政变情况下民主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2011年，埃及军方在民众抗议中接管了政权，然后制定宪法、主持选举，2013年又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1991年，马里军人停止了射杀和平抗议者、调转枪口推翻了独裁者，然后在2012、2020年两次发动政变，中断并最终结束了民主。

1988年，我们的邻国缅甸发生民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并在不久后开启了选举，但软禁了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而且拒绝接受这个政党接下来压倒性的胜利。另一个邻国泰国的政治现代化最早是1930年代军方通过政变开启的，军队从此在政治中获得了一种特殊地位；这个国家后来政变次数之多，不能不让人惊讶。

1974年，葡萄牙中下级军官的政变，即著名的“康乃馨革命”，不只成功在本国建立了稳定的民主，也揭开了世界范围第三波民主化的序幕，但它的成功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例外。

最后，我还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技术中还有个重要概念，叫“支撑性力量”（pillars of support）。军队无疑是独裁者最关键的支撑性力量之一。研究发现：非暴力反抗运动如果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更有可能促成这些力量背离独裁者，从而提高运动的成功机会。¹⁰

至于“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意味着什么、如何做到，已超出这里的讨论范围，但值得有志于反抗运动的人给予特别关注。

此外，我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战略也应包括如何应对镇压的计划。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当镇压发生的时候，如何顶住镇压继续抗争，从而使镇压归于无效。不能指望非暴力抗争没有任何伤亡，但应尽量避免1989年那样的大规模流血。

注释

- 1 芭芭拉·格迪斯、约瑟夫·赖特和埃丽卡·弗兰茨，《独裁政权的运作机制：权力、权力个人化与崩溃》[Barbara Geddes, Joseph Wright, and Erica Frantz, *How Dictatorships W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 埃丽卡·切诺韦思和玛丽亚·J·斯蒂芬，《为什么公民抵抗会成功：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Erica Chenoweth and Maria J.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 3 璫尼哈尔·辛格，《夺取政权：军事政变的战略逻辑》[Naunihal Singh, *Seizing Power: The Strategic Logic of Military Coup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 4 陈子健、钟伟峰，《预测威权政权的镇压：一种机器学习方法》[Julian TszKin Chan and Weifeng Zhong, “Predicting Authoritarian Crackdowns: A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Mercatus Working Paper (Mercatus Center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January 2020).]
- 5 杰奎琳·约翰逊、克莱顿·L·赛恩，《响动的车轮与军队的忠诚：国

内抗议如何影响军事政变（1951—2005）》[Jaclyn Johnson and Clayton L. Thyne, “Squeaky Wheels and Troop Loyalty: How Domestic Protests Influence Coups d’État, 1951–2005,”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8, Vol. 62, No. 3, pp. 597–625.]

- 6 凯文·科勒、霍尔格·阿尔布雷希特,《革命与军队: 终局游戏政变、不稳定性与民主的前景》[Kevin Koehler and Holger Albrecht, “Revolutions and the Military: Endgame Coups, Instability,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Armed Forces & Society*, 2021, Vol. 47, No. 1, pp. 148–176.]
- 7 奥伊辛·坦西,《“民主政变”论题的局限: 国际政治与政变后的威权主义》[Oisín Tansey, “The Limits of the ‘Democratic Coup’ Thesi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ost-Coup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2016, Vol. 1, No. 3, pp. 220–234.]
- 8 奥赞·瓦罗尔,《民主政变》[Ozan O. Varol, “The Democratic Coup d’État,”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2, Vol. 53, No. 2, pp. 291–356.]
- 9 同上。
- 10 埃丽卡·切诺韦思、安德鲁·霍金、佐伊·马克斯,《非暴力抵抗战略的作用模型》[Erica Chenoweth, Andrew Hocking, and Zoe Marks, “A Dynamic Model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Strategy,” *PLOS ONE*, 2022, Vol. 17, No. 7, Article e026997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69976>.]

专题探讨

裴毅然

作者裴毅然为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者，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3期

2026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中共“大外宣” 历史考察（上）

摘要：“宣传”乃中共立党之本、开路先锋。“大外宣”，即“对外宣传大布局”，引起广泛关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其历史相当久远。1949年后，大外宣一直是中共政权重要一翼，涓滴渗漫海外，文革前有效影响西方舆情，文革后亦悄然改变一些海外华媒立场。近二十年，中共不断为“大外宣”拨款输血，全力向海外放送红色意识形态，试图与欧美争夺意识形态制高点。

前 言

文艺复兴“人的意识”觉醒，西欧从君主制向民主制转型，“主义”纷起，各立标准、各绘未来。每一场大型社会运动均起于意识形态飘出的“幽灵”，搅动社会认知，吁求变更秩序。

1917年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侥幸夺权成功，共产主义甫一落地，即显露狰狞：

粮食产量骤降到1914年前的一半，造成数百万人不是饿死就是流离失所。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最初三年，全国一直处在饥饿状态中。到1921年，共产党政府不得不请求国际援助。¹

斯大林时代，苏联受难者高达2000～4000万。²但苏共全力遮罩真相，自塑英姿，天天放送“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二战后，“东风”一时强劲，共产阵营景象蔚然。

1955年12月，毛泽东谕示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³“以中国观点报道新闻”，以中共立场裁剪报

道、影响舆论，赚取中外“理解”，再“出口转内销”，把这些宣传内容倾销给国内民众。中共政权体制性“大外宣”（对外宣传大布局）成型。

本文简要梳理中共“大外宣”历史资料，力图较直观呈现其发展轨迹及其内在特征。

一、文革前的外宣

“宣传”一直是中共开路先锋。1937年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为弱小的中共阵营召来成千上万热血知青，是为“外宣”经典样板。1938年1月，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机关报《新华日报》，1946年在沪港创办英文版《新华周刊》（*New China Weekly*）、《中国文摘》（*China Digest*）。⁴是为中共“大外宣”之先声。

1942年初，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凡有转载，须经毛主席亲笔批示。”⁵同年春，“整风运动”，取消党内思想自由，开启资讯层级制，发行仅供高干阅览的《参考消息》。⁶

1943年，中宣部长陆定一提出无产阶级新闻学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⁷这无异于否定事实的客观唯一性。这种“事实与立场”相结合的宣传手法很快便得到应用：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在南泥湾烧鸦片屋塌而死，报道隐去“鸦片”，说成“烧炭”。⁸

1949年后，寰内媒体悉归党营，公器沦为党器，大陆民众从此听不到“不同声音”。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会，周恩来公开讲：“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外交无小事”出处）。⁹外交取决于内政，外宣取决于内宣，内宣取决于中共内需。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新华社随军记者接令“三不报”：

- 1、不报任何战败消息；2、不报志愿军伤亡；3、不报志愿军的“痛苦”。¹⁰

许多记者把战场上的悲惨死亡描写成为了保卫祖国“英勇”、“忘我”、“光荣”、“伟大”的牺牲，把阵地失守改写成阵地转移等等。

甚至连志愿军的家信也伪造。新华社随军电讯员姜桂林（1933～，1959年12月27日于开罗叛逃）吉林老家新建大屋被区长霸占，双亲赶入破败陋室，但这些事情均瞒着他，他在战场上收到的家信全系凭空捏造：

父亲（按：原开养猪场）早已经变成了一个以拾柴为生的乞丐了。母亲早年所积存的衣服已经被迫捐献了，穿在身上的衣服破烂到不能蔽体的程度。从家人的叙述中才使我明白，我在韩国战场上所收到的那些家信，其中描写家庭生活如何这般的优越，都是出自共匪写信队的杰作。……自己身为中共的一个宣传干部，不但自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子，而且骗局还临到了自己的家庭，自己这个骗子也被大骗子所愚弄了。¹¹

中共陆续成立一系列外宣机构：中央外事小组、国际宣传领导小组、国务院外事办、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外文局前身）、中宣部国际宣传

处。1952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国际时事宣传的决定》，强调国际时事的报道与评论统一归口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其他媒体只能转载。

1950年1月，英文版《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半月刊）创刊，文革前发行量一度达12万份。1952年1月中国福利会（民间身分）外文版月刊《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总发行量达到20万份（五种语版）。1964年《人民画报》14种外文版发行量高达58万份。

外宣口径从最初向苏联“一边倒”到1960年代“反帝反修”，视所有欧美国家为敌，光荣孤立，自称唯一“伟光正”。但“新华社对外新闻部向国外发送的新闻很少为国外报刊选用”。¹²

1958年，外文出版社制定1959年出版计划：中文选题从200种跃进至300种，外文品种450种跃进至800种，“准备在三年之内居于压倒美国出版物的地位”。但到1962年，出版外文图书250余万册，可实际在外国仅发行57万余册。¹³《新中国对外宣传史》不得不承认：“外宣工作的发展并不顺利，对外书刊在西方国家接连碰壁，甚至在一些亚非国家也不时遭遇挫折。”¹⁴

对内，中共禁灭异议，单声道自我表扬，自欺欺人。毛泽东明确施行愚民政策（弱民易控）¹⁵，封锁内外信息。《人民日报》只报道“正面”，仅高干才能看到的《内部参考》才稍载实讯。1957年，引用外电的《参考消息》仅发行2000份（省军级）。¹⁶1959年6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

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¹⁷

1946年1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陆定一发文《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¹⁸

当年对准国府的矛头，1949年后成了尴尬的“历史先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了，但只能得到过滤的“新闻”，甚至要从外电获知本省本城的重要资讯。

中共媒体必须执守党性原则：报道要为政治服务，真实要为需要服务，用选择性资讯强化既定观点，长期引导社会舆论。全国小学生被告知，蒸汽机、电灯电话都是俄国发明。¹⁹还有“中国被迫卷入‘抗美援朝’”、“中国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等等。1963年发起学雷锋运动，但“雷锋的很多事迹都是伪造的”。²⁰

有相当一批海外白人左翼知识分子被中共媒体误导。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曾说：“共产主义不适于美国但适于中国。”²¹还说：“中国的革命是很成功的。”²²1983年，费正清还坚持：“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²³1986年费正清出版《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991年费正清临终才悟识：

中共政权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自选自任的共党专制政府和以前历代王朝一样，要继续垄断手中的权力。²⁴

遮掩大饥荒

文革前十七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着陆变现——土改镇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祸乱很快从政治思想领域渗漫至经济基础各个领域。1958年“大跃进”摧毁农业生态，粮棉大减产：²⁵

年份	粮食（亿斤）	棉花（万担）
1958	4000.0	3937.5
1959	3400.0	3417.6
1960	2870.0	2125.8
1961	2950.0	1600.0
1962	3200.9	1500.0

1959年1月全国农业电话会议，副总理谭震林（1902～1983）估计500万人浮肿、7万人饿死；而周恩来估计12万人饿死。其实毛泽东也知道饥荒，但他在转发的报告中却故意淡化饥荒。²⁶ 1959年4月12日《内部参考》报道《山东省春荒严重》。²⁷

1959年2月4日《内部参考》写道：

湖北省新洲县……听到有人来参观，县里马上召集下层干部开会，要食堂把群众生活搞好，并警告群众，不准说没有吃饱。所以群众都愿意天天有人来参观，这样可以吃得好吃得饱。有民谣：“……

省委参观走，稀汤难入口”。……现在农民们有苦不敢说，因为村上的干部开会说：“如有人来村里调查生活情况的时候，只能说我们生活好，每天吃三顿小米饭和玉米馍，不要说没有粮食吃。如果谁说了，就要开大会斗争你们。”²⁸

毛泽东卫士李银桥（1927～2009）的回忆录写道：

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无法入睡。他起来了……毛泽东的桌子上堆满文件和电报，饥荒已经笼罩全国。安徽、山东、河南等地发来饿死人的绝密电，这些内容只有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才能看到。……国庆节之后，毛泽东立刻南下视察。专列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喃喃道：“天灾人祸啊！”²⁹

上天堂的“大跃进”成了下地狱的大饥荒。实践检验“主义”，大饥荒直击中共政权“合法性”，但中南海密遮紧掖，否认事实，造假自欺。此时，中共高层已知共产之路不通，但“阶级本能”使他们共同维护“大局”。

1960年11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柯庆施（1902～1965）对埃德加·斯诺（1949年后惟一获允访华美国记者）说：我们现在不是闹饥荒，将来也不会闹饥荒。³⁰

1961年2月8日杭州，毛泽东会见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1996，后为法国总统）时说：“中国没有饥荒，

只是一时的匮乏。”³¹

1960年1月7～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60年继续“跃进”：

1959年全面跃进，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1959年形势更好。1960年钢产量1840万吨，粮产量6000亿斤，分别比1959年增长33%和11%。³²

196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版8），张沛的《红旗飘飘》写道：

“赤地千里，饿殍盈野，卖儿鬻女，惨绝人寰”，这些旧中国历次大灾荒的真实写照，今天，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民公社是征服灾荒的最强大的武器。

一位中组部副部长说了实话：下放干部有的严重浮肿走不动路，担架抬进城住院，但还对人说在下面“吃得饱，吃得好”。这位副部长不久就被撸掉了“乌纱帽”。³³

铺天盖地高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如何向人民解释如此大反差的食物短缺？为何口粮定量一再下调？许诺与现实反差实在太。为“不给社会主义抹黑”，公安部重点打击五类分子的“造谣”、“诬蔑”、“反动言论”。云南大理州贫农王某在食堂说“我的小娃饿坏了”，立即以“现行破坏”逮捕，判刑六年。漾濞县农民苏某1956年买蚕豆1.5斗、1957年买腊肉4斤送胞姐，判刑1年、罚款150元。³⁴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新华社的食堂都到了吃玉米芯粉³⁵，

《内部参考》（限阅 13 级以上）仍密不透风，仅一二处出现“浮肿病人”。全国媒体仍在唱高调，仍在营造“共产党来了苦变甜”，还在宣讲“十年伟大成就”、“今后幸福远景”，澄清“模糊观念”。如“为什么丰收了、工业发展了，粮食定量一再下降？买不到日用品？”官方的“正确解释”：

不是粮食少了，而是吃的人多了；不是东西少了，而是买的人多了。³⁶

1960 年饿殍遍野，四川第四监狱（泸州），肥胖狱吏向饥囚宣教：“共产主义在向我们招手了”。文革时期，监狱王政委谆谆教导犯人：“看大好形势主要看政治，不要光看锅里头、碗里头。”³⁷

不仅剥夺百姓的知情权，高干也大多蒙在鼓里，至多只知所在地区情况，无法获悉全国信息。新华社高干李慎之（1923～2003），1990 年代仍不相信发生大饥荒，不相信张闻天秘书何方（1922～2017）一天生食 40 多斤白萝卜。1997 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撰序，再知李锐北大荒挨饿，才完全相信发生大饥荒。³⁸

1961 年，侨领陈嘉庚（1874～1961）仍以为中共救了中国，遗嘱：

国民党过去做尽坏事，他们逃到台湾去了，那些人一生自私自利，假公济私，现在还在捣乱。我们必须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中国。³⁹

2019 年，拙著《赤难史证——大饥荒成因》考证饿死人数至少 4147 万。⁴⁰

欺惑外人

十月革命后，欺惑外人一直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拿手好戏。1919 年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 1866 ~ 1936）的访俄观感如是写道：“我已经见到了未来，它正成为现实。⁴¹”

1946 ~ 1949 年国共内战期间，费正清的亲共立场深度影响白宫。余英时说：“他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直接涉及美国的对华政策。”⁴² 费正清说：“1949 年底，杜鲁门政府召集三个人制定对华政策，我建议最好是承认中国的新政府。”⁴³

英国坎特伯雷大教长休立特·约翰森（Hewlett Johnson, 1874 ~ 1966），曾在 1930 ~ 1950 年代访苏、访华期间，高调力挺共产主义政权。1953 年约翰森出版《中国：新的创造性时代》，宣称在中国看到二十年前苏联出现的“人间天国”：

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宗教性的戏剧，它对贪婪的憎恶和基督教完全一致。……（中国）正在把人从物质占有的本能中解放出来，为建立在更高基础上的新社会铺平道路。……他们的小我消失了。我们梦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国实现了。⁴⁴

1956 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全球哗然，共产主义浪潮从此拐头下行，一批欧美左翼知识分子将希望转系中共：

法国号称“独立”的大报《世界报》刊载赞扬韩素音充满谎言的书，吸引了很多人去中国旅游朝圣。他们发回的报道写得天花乱坠，西

蒙娜·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甚至称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真正革命和发动群众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制度……绝口不提随后的镇压。对中国发生饥荒的传言，他们则归咎于“帝国主义的诽谤”。⁴⁵

1958 年“大跃进”，大外宣也“跃进”——向海外铺设站点。1965 年底，新华社海外分社 51 处，派往 67 国常驻人员 225 名（其中 85 名记者）。⁴⁶

1960 年 6 月 28 日～11 月 15 日，埃德加·斯诺再度访华。⁴⁷ 全程中国旅行社安排“波将金式旅行”⁴⁸，未得陪员同意不得拍照。1962 年，斯诺在美国出版《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否定中国发生大饥荒，称从内蒙走到重庆：

我看不到乞丐、饿得半死的人民、衣衫褴褛的顽童，或集体饥荒的任何迹象。……采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效的粮食供给制度，共产党目前已成功防止了由于广泛灾荒所引起的传统性的人口毁灭。⁴⁹

1962～1963 年斯诺奔走美国 51 所大学及各种论坛各类组织，发表亲共演讲。“他的著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⁵⁰

1960 年底，英国保守党议员约翰·特普 (John Temple) 参观中国农村，宣称：

共产主义切实可行，中国正在飞速发展。⁵¹

中共尽量邀请不了解中国的欧美左翼人士访华，容易赚取颂扬。感情决定倾向，这些亲共外国人以“亲睹中共伟大成就”宣扬：中国不仅没有饥荒，还丰衣足食。1959年英国著名诗人赫伯特·里德爵士（Herbert Edward Read, 1893～1968）访华，赞扬人民公社：“不管这个体制叫什么……比统计数字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幸福和满足。”⁵²

1959年5月，前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长博伊德·奥尔勋爵（John Boyd Orr, 1880～1971）访华后说：中国粮产量确实提高了100%，“现代农业方法已经将中国的粮食产量提高到了与英国相当的水准，并且结束了中国传统的饥荒回圈……”。⁵³

1958年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 1900～1995）两度访华后说：

（集体食堂）在今天的中国是一种骄傲，与强制或严格控制无关。⁵⁴

1961年12月法国《世界报》，瑞士经济学家吉伯特·埃提尼（Gilbert Etienne, 1918～2014）写到：

也许一开始就可以说，“普遍饥荒”是错误的——这是我们可以断言为绝对错误观点之一。国民党时期因缺乏最低生活条件而使千百万人丧命的悲惨时代还没有出现。⁵⁵

1960年，英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e, 1909～1985）访华后说：

中国不再因饥饿而死。那里可能存在食物短缺和严重饥荒，但没人饿死——不争的事实是，长期困扰中国农民生活的饥荒和对饥饿的

恐惧，如今已一去不返。⁵⁶

1961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Bernard Law Montgomery, 1887～1976）访华后感叹：“中国人口非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⁵⁷

1965年，英国诺奖学者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则赞叹道：

中国人曾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⁵⁸

这一时期，“大外宣”也有失败例证。1959年9月～1960年3月，对外广播部日语部向日本听众寄发3500份调查表，收回530张，270张没表示意见，80张赞扬，54张认为“太单调”、“宣传气味太浓”，14张认为“不公正不客观”。另有外国听众来信：“听北京广播就像在受训，没有亲切感，不平易近人，宣传有一种喊叫的味道。”1958～1960年是中共政权“前十七年”外宣效果最差时段。1960～1966年关闭了一些新华社分社：布拉格、贝鲁特、新德里、波恩、喀布尔、雅加达、阿克拉（加纳）。⁵⁹

1958年，有荷兰人凭常识质疑中国报纸上的粮产卫星：

你们说在一英亩土地上可以收获14吨大米，是否把稻草也算进去了？⁶⁰

1960年5月中旬，国家副主席兼中共监委书记董必武（1886～1975）视察淮北，安徽省委将浮肿者藏入草堆或抬上船运走（船翻了，淹死

不少人），还让干部穿上新衣在公路旁劳动以蒙骗董必武。最高法院副院长王维刚（1903～1984）上凤阳视察，亦遭类似的“波将金式”欺骗。⁶¹

二、文革时期

1966年6月～1967年，“大外宣”趋于巅峰。1966年10月～1967年11月，25种外文版《毛选》发行460万册（148个国家与地区）。⁶²文革期间小红书（《毛语录》）译成50多种文字，总印数50多亿册。⁶³打着“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旗号，以为世界革命在望，大力输出革命，尤其出钱出人支持东南亚与南美共产党武装暴动——学习毛泽东搞农村包围城市。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新加坡、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尼、印度、斯里兰卡、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非洲一些国家赤色组织，均得中共资助。⁶⁴1980年，中共才停止对马来西亚、泰国的赤色广播。⁶⁵

中共甚至向西北欧国家渗透，驻外使领馆向当地民众赠送毛语录毛像章，交谈时先背诵毛语录，上街撒传单，向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但1966年起，对外广播听众的来信逐年减少，1970年跌至最低点。⁶⁶

1960年代中共基本停止发布外宣统计数据，文革十年学术杂志停刊。⁶⁷《新中国对外宣传史》记载：“随著文革的爆发，几乎所有的外宣媒体都一度陷入了混乱乃至瘫痪之中。”⁶⁸但十分吊诡，最黑暗的十年文革竟是中共政权海外形象最佳期，“针灸神效”、“大寨成

绩”……，外国左翼群体甚至相信：“1967 年的中国是一个很幸福和充满活力的时期。”⁶⁹ 西方左翼知识界也热忱支持中共“继续革命”。

1967 年秋，法国共青团几个干部访华，决心也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回国后发起“插入运动”，数百法国知识青年弃学“插厂”。1970 年代初，数千法国知青再掀“回归土地”，坚持七八年，最后偃旗息鼓。⁷⁰ 相当一批西方知青从文革获得灵感，发动种种“反建制”运动，西方学界也有一派认为文革标示人类希望。一些港台青年知识分子认为中共通过文化革命进行自我改造。⁷¹

1967 年，台湾作家陈映真（1937～2016）阅读马列书籍后激情澎湃，认定共产主义为人类找到理想制度，坚信大陆没发生大饥荒，更不认为文革是大灾难，秘密成立“共产主义学习小组”，被捕蹲狱七年。⁷² 陈映真终生亲共，认为不可全盘否定文革，支持“六四”镇压学运，1990 年代定居并逝于北京。⁷³

1972 年，费正清说：

“毛泽东的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数百年来仅此一见的“最好的事”。⁷⁴

费正清认为文革乃“影响深远的道德十字军远征”，将人性引向“自我牺牲和为别人服务的方向”，并认为中共依靠道德而非法律管理中国，值得美国仿效。⁷⁵

1972 年美国教友派代表团访华报告说：

我们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诚心拥护他们的政治制度……从中国人民的观点来看，这个政治制度已为他们带来真正与持久的福利。在以经济安定取代赤贫、秩序取代混乱、公正取代压迫、强盛取代衰弱、民族自尊取代辱权丧国方面，过去的几届政府均告失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成功地做到了。⁷⁶

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1943～）写道：

1970年代初期，这种对毛治下的中国有利的观点在美国意见领袖之间已广泛为人接受。……大多数电视记者均赞扬中国人民的纪律与公德心。……当时一些美国作者不仅认为“毛主义”可为第三世界提供一种宝贵的新发展模式，甚至相信它对西方已开发国家中的某些问题，诸如犯罪、社会疏离感与生态污染等，也可能是灵丹妙药。……当时许多中国事务专家的确对文革期间普遍存在的暴行一无所知。……美国当时几乎全盘接受中国官方宣称的一切。⁷⁷

由于对中国实情了解太少，“从不将人往坏处想”的欧美左翼人士竟完全相信中共安排的“访问”（只接触官方人员），西方出现一股对中共“成功实验”的歌颂浪潮。1966年美国学者薛曼（Franz Schurmann，1926～2010）出版《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美国汉学研究生兴奋不已，此书告诉他们：中共制度很完美，上层精英讨论形成政策，通过严密组织传达基层。1973年，“颂共”仍在继续。

黎安友说：

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外界一无所知。一位学者根据香港地利所观察

到的迹象发表了一篇饥荒的文章，大多数学者表示怀疑，说他证据不足。当凌耿在台湾国安单位的协助下，以他红卫兵的亲身经历出版《天谴》这本书，揭露红卫兵的残暴行为，外国也拒绝相信，认为它是反共的意识形态的宣传。

……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们非常敬重他们所谓的“毛泽东实验”。一个叫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团体派了两个代表团到中国，回来后发表了赞扬中国的正面报道的书，称赞它正在创造一个理想化的社会，追求平等、发动群众以集体主义的方式求发展，男女平等，用调解的方式处理社会冲突等等。1970年代初，我在哥大的同事奥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和其他可敬的学者们编了一本书《中国发展经验》，谈及中国在公共卫生、环保、小企业等方面很棒的创举，要求我们向中国学习。这些正面的观点来自于被中方引导的参观和汇报。

1973年我也随著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去了……我们听官员们冗长的“简单介绍”，一切都通过翻译……然后集体在那个单位中走访一圈。你无法脱离团体，无法私下里与任何人做任何实质性的交谈。……当时访问中国回来的人写的书和文章，都是按照在中国短期访问的见闻写出的，这些书受到欢迎。⁷⁸

1974年，英国史家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说：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⁷⁹

国府反共元老邹鲁之子、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说（1918～1999），其著中反复表示：深深理解“中国专制政治存在的合理性”，对文革与“农业学大寨”深情向往。1980年代，邹说获聘中国社科院名誉研究员、北大名誉教授。⁸⁰

1973年春，美国西雅图大学，逃港清华生吴树仁演讲会，一位左翼教授诘问：

美国有什么自由？美国参加越战，迫使中共集中力量对付此一战事，无暇顾及“国内”，而使成千成万的中国大陆人民饿死，这责任应由美国来负才是。⁸¹

2016年纽约新学院，中国流亡学者徐友渔（1947～）讲演“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一群白人左翼知识分子到场诘问：“徐教授，我们都知文革很好，为什么你要说文革不好？”⁸²这番认知可谓“大外宣”标准铸件之一。

文革时期，神州水深火热。1976年中国人均GDP \$165.68（¥316），是年美国人均GDP \$8592.25，中国仅为美国的1.93%。⁸³1957年全国职工均薪¥624，1976年为¥575，十九年不增反跌¥49。⁸⁴

欧美左翼知识分子因逆反心理嫌恶西方而向往东方。1954年5月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偕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访苏，回法国发表演讲（后承认撒谎）：

苏联公民能比我们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评政府。……在苏联有绝对的批评自由。……苏联人民不是不可以自由出国旅行，而是他们不

愿离开自己美丽的祖国。⁸⁵

这一时期，中共也受到外宾批评。1977年6月，1960年曾采访周恩来来的英国记者格林，致函新华社：

我坦率地说，你们的对外宣传是失败的，你们的对外宣传没有说服力，有的东西反而引起外国人的误解……⁸⁶

(待续)

注释

- 1 【英】贾斯帕·贝克尔 (Jasper Becker)：《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姜和平译，明镜出版社（香港）2005年，页66。
- 2 【美】兹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1989），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32。
- 3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182。
- 4 习少颖：《1949～1966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武汉）2010年，页16。
- 5 舒群：《枣园约稿宴》，《众说纷纭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页299。
- 6 朱鸿召：《唯读《解放日报》》，《上海文学》2004年第2期，页78、83、84。
- 7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9月1日。《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北京）1987年，页6。
- 8 于浩成：《九一忆往》，新世纪出版及传媒公司（香港）2016年，页56。
- 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9年，页10。
- 10 姜桂林：《“新华社”十二年》，正声广播公司（台北）1962年，页97～98。

- 11 同上。
- 12 习少颖：《1949～1966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页68、18～19、133、125。
- 13 周东元、元文公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资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140、287。转引自习少颖《1949～1966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页137、287。
- 14 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页104。
- 15 李慎之：《“大民主”与“小民主”一段公案》，《百年潮》（北京）1997年第5期，页48。
- 1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4年，页106。
- 17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北京）1995年，页136。
- 18 陆定一：《人民的报纸》，《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北京）1987年，页72。
- 19 侯凤菁：《裴多菲俱乐部真相》，《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5期，页75。
- 20 同注释8。
- 21 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14年第2版，页529。
- 22 梁恒：《费正清教授的思想与生活》，《知识分子》（纽约）1984年10月号，页5。
- 23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4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3年，页258。
- 24 《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正中书局（台北）1994年，余英时序、页466。
- 25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哈尔滨）1985年，页472。
- 26 【荷】冯客（Frank Dikötter）：《毛泽东的大饥荒》，郭文襄等译，INK印刻公司（台湾）2012年，页104。
- 27 新华社（北京）：《内部参考》第2750期（1959年4月12日），页2～3。
- 28 新华社（北京）：《缺粮情况》，《内部参考》第2702期（1959年2月4日），页28。
- 29 李银桥：《在毛主席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1991

- 年，页 264、266。
- 30 【美】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即《今日红色中国》，新民译，新华出版社（北京）1984 年，页 424～425。）
- 31 【荷】冯客（Frank Dikötter）：《毛泽东的大饥荒》，页 203。
- 3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3 年，页 303。
- 33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上册，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 年，页 361。
- 34 《云南省志》第 55 卷（审判志），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1999 年，页 242。
- 35 丁抒：《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香港）1996 年（修订版），页 231。
- 36 高华：《历史的记忆：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 年 8 月号，页 75。
- 37 严家伟：〈来自中国古拉格群岛的报告〉，《观察》（美国）2006 年 8 月。《严家伟文集》（一），2010 年自印本，页 14。
- 38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上册，页 375。
- 39 李梦桥主编：《中国世纪名人遗嘱遗书遗言遗作》，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页 245。
- 40 裴毅然：《赤难史证——大饥荒成因》，秀威资讯公司（台北）2019 年，页 356～358。
- 41 原文是 I've seen the future and it works. 出自 Ella Winte（林肯·斯蒂芬斯之妻）《红色的美德》，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出版社，1933。
- 42 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页 522。
- 43 梁恒：《费正清教授的思想与生活》，《知识分子》（纽约）1984 年 10 月号，页 11。
- 44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 年，页 267、189～190。
- 45 【法】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毛主义与法国知识分子》，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 年，页 320。
- 46 何清涟：《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八旗文化 / 远足文化事业公司（台湾）2019 年，页 66。
- 47 谭外元、郭六云编著：《斯诺》，辽海出版社（沈阳）1998 年，页 171。

- 48 1787年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南巡，宠臣波将金在第聂伯河畔布置可移动假村庄，用画布和演员制造繁荣景象欺骗女皇。
- 49 【美】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即《今日红色中国》），新民译，新华出版社（北京）1984年，页349、41、312。
- 50 张威：《晚年斯诺》（上），《传记文学》（台北）2024年1月号，页17、页22（注释55）。
- 51 【荷】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页203。
- 52 【英】贾斯帕·贝克尔：《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页410～413。
- 53 同上。
- 54 贾斯帕·贝克尔：《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页49。
- 55 同上。
- 56 同上。
- 57 同上。
- 58 【英】伯兰特·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6年，页1。
- 59 习少颖：《1949～1966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页100、144、199。
- 6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志》上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319。
- 61 《张恺帆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394。
- 62 何清涟：《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页40。
- 63 徐友渔：《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熊景明等主编：《中外学者谈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页xxxviii。
- 64 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年第3期。
- 65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联合早报（新加坡）2000年，页669～671。
- 66 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页192～193。
- 67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4版，页242。
- 68 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页160。
- 69 梁恒：《费正清教授的思想与生活》，《知识分子》（纽约）1984年10月号，页4。
- 70 【法】潘鸣啸（Michel Bonnin）：《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 1968～1980》，欧阳因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434、255。
- 71 李怡编：《知识分子与中国》，远流出版公司（台湾）1990年，页58、85。
- 72 寒山碧：《陈映真从共产主义到民族主义》，《争鸣》（香港）第69期（1983年7月号）。寒山碧：《我的文学足印》，东西方文化事业公司（香港）2019年，页156～157。
- 73 激流网：《悼念陈映真：我在台湾所体验的文革》，<https://www.jiliuwang.net/archives/33824>。
- 74 《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北京）1972年10月号，页176。转引自《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正中书局（台北）1994年，余英时序，页3。
- 75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页190。
- 76 【美】黎安友：《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知识分子》（纽约）1985年4月号，页11～13。
- 77 同注释73。
- 78 黎安友：《中国政治变迁之路》，何大明译，巨流图书公司（台北）2007年，页108～111。
- 79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1985年，页289。
- 80 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2006年，页464。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邹谠/2023658>。
- 81 吴树仁：《中共的真面目》，民主出版社（台北）1973年，页4。
- 82 徐友渔：《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匠心文化创意公司（台北）2023年，页132。
- 83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55。《中国、美国历年人均GDP数据比较》，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_per_country/g_gdp_per_capita/chn-usa.html。
- 84 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897～898。
- 85 曹长青：《萨特/西蒙·波娃的“荒谬存在”》，《开放》（香港）2005年9月号，页88。
- 86 戴延年、陈日浓：《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第1册，新星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308。

专题探讨

坚真光

坚真光（笔名）系中国大陆社会学学者、
副教授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3期

2026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额头上的疤 痕：饥民社 会的缘起与 危害

摘要：本文以童年额头受伤这一具身经验为切入点，提出并界定了“饥民社会”（Famine-Mentality Society）这一原创性社会学概念。其形成条件有二：客观上，长期稀缺经验与反复生存威胁构成结构性背景；主观上，制度性保障和超越性信仰的匮乏使不确定性被系统内化为稀缺性焦虑。在上述条件持续作用下，社会形成互防、互斗、依附与零和思维的稳定行为结构，制度则以控制稀缺与利用稀缺为核心运作逻辑——此即饥民社会的概念内容，有别于单纯的贫困社会、稀缺社会或焦虑社会。本文围绕缘起与危害两个维度，揭示稀缺性焦虑的生成逻辑及其从个体、群体到文明层面的渐进侵蚀机制，为理解中国历史积淀与当代社会困境提供一个整合物质条件、制度结构与心理机制的分析框架。

引言

我的额头上有一道疤痕，源于童年一次兄弟姐妹争食冲突。多年后，当我以社会学的眼光重审那个场景，看见的已不再只是饥饿孩子的混乱画面，而是一种结构性力量的具象化身：是什么使“先占为主”成为比“礼让三分”更具合理性的行动逻辑？是什么将资源有限这一客观条件，转化为彼此提防、相互消耗的稳定行为模式？

表层答案是稀缺，但更深层的机制在于：当稀缺与分配不确定性、社会保障缺失和超越性信仰阙如相叠加时，资源不足便迅速转化为弥漫性焦虑；焦虑驱使个体抢先占有，抢占行为进一步侵蚀信任，合作与秩序由此在结构层面趋于瓦解。这是典型的“饥民行为”。本文将“饥民”一词扩展为社会学指称：凡在持续资源不安全感中形成高焦虑、高防御、高争夺行为倾向的社会成员，皆可纳入广义“饥民”的范畴。

当上述特征制度化、结构化并趋于普遍，社会便演变为“饥民社会”。就概念内容而言，饥民社会中个体普遍以“不先占有即可能失去”为认知前提，形成互防、互斗、依附、短视与零和思维的稳定行为结构；制度以控制稀缺、分配稀缺和利用稀缺为核心运作逻辑；文化持续复制“落后即危险、失败即沉没”的心理脚本。从概念区分看，饥民社会以客观稀缺为背景基础，以主观焦虑为传导中介，以制度化依附和零和竞争为行为输出——贫困社会、稀缺社会与焦虑社会均可能是饥民社会的构成部分，但任何单一维度均不足以等同于饥民社会。有必要指出，同样面临资源约束的社会并不必然走向饥民社会：日本藩政时代形成的村落连带制度使稀缺转化为集体互助；北欧在相对贫寒的环境中，因土地分配较均等与较完善的救济机制，使稀缺成为共同承担的问题；台湾 1950 年代的土地改革则在短期内显著改变了农村的竞争性行为模式。这些对照说明，饥民社会并非长期稀缺的必然结果，而是资源稀缺、制度性保障不足和超越性信仰缺失相叠加的特定产物。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普遍性饥饿已大幅缓解，然而稀缺性焦虑已向教育、住房、医疗与社会上升机会等领域发生结构性转移，表现为对“掉队”“失去通道”“被挤出”的系统性担忧。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数据显示，年轻人焦虑症检出率高达 24.6%，显著高于国际平均水平¹。因此，更准确的表述是：中国在摆脱绝对赤贫后，仍保有强烈的饥民社会心理结构与制度遗产。

本文与若干已有研究存在密切对话关系。白鲁恂（Lucian Pye）在其政治文化研究中观察到中国政治心理中存在结构性的权威焦虑——对

强权的依附与对被抛弃的恐惧——与本文在现象层面有所共鸣，但解释机制根本不同：白鲁恂从儿童社会化路径切入，关注中国人如何感知权威²；本文则从物质稀缺与制度配置以及观念缺失的历史叠加切入，追问何种结构性条件迫使人们形成这一感知。若白鲁恂的框架成立，改变物质条件不会根本改变焦虑结构；若本文框架成立，制度保障的建立和超越性信仰的输入可在一代人内产生可见效果——台湾战后的历史经验对后者更具支持性。裴敏欣对“困陷式转型”中掠夺性制度如何维持民众依附性的分析，与本文第一节第二部分方向高度一致³；裴侧重制度运作的宏观逻辑，本文补充民众选择依附而非合作的微观心理基础，二者结合能更完整地解释公民社会自主合作能力为何持续匮乏。昂格尔（Jonathan Unger）的农村研究表明，特定制度安排可在短时段内催生竞争性行为；⁴ 本文追问的则是：为何这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能反复出现并迅速获得配合——这需要长时段历史积累来解释，两者互补而非竞争。

在研究路径上，本文采用历史社会学与跨文明比较相结合的方法，以综合性文献梳理为基础，辅以典型案例比较，致力于建构一个兼具解释力与概念清晰性的分析框架。本文论述范围限于饥民社会的“缘起”与“危害”两个维度；继续机制与超越路径留待后续研究展开。

一、缘起：饥民社会的生成逻辑

饥民社会的核心特征并非一般性贫穷，而是稀缺性焦虑的制度化——即焦虑从心理状态固化为行为规范乃至权力运作原则的过程。这里的关键因果链条并非“只要资源不足，人就必然焦虑”，而是：当客观

稀缺反复发生，而风险分担机制、公共救济体系、可信制度规则与超越性意义框架均告阙如时，社会成员便会将不确定性内化为稳定的不安全感，并据此系统性地重组行为逻辑。以下将区分饥民社会的初次形成条件与持续再生产机制两个层次分别展开。

（一）物质与环境因素：客观稀缺的结构性背景

1. 自然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

黄河周期性泛滥、长江流域洪涝频发、华北平原干旱连年，构成传统中国农业生产的高度波动环境。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及各地方志记载，地方性饥荒与全国性荒歉在前现代中国具有高度规律性，叠加交通、仓储与救济网络薄弱，使灾区极难依赖跨区资源调配来平滑风险。竺可桢等学者的气候史研究表明⁵，小冰期（约1300—1850年）造成的低温与粮食减产，与明清两代民变、流民潮和饥荒高发期存在高度时间相关性，从物质层面印证了客观稀缺的间歇性冲击对社会心理的长期塑造。

然而，客观稀缺并不会以机械方式自动转化为均质焦虑。更准确的表述是：当灾荒反复发生，而个体又缺乏稳定的粮食获取权、社会保险与可信分配机制时，资源短缺才会通过价格飙升、粮路中断、家庭创伤记忆与死亡威胁等途径转化为广泛的稀缺性焦虑。底层农户、佃农与城市贫民首当其冲；权贵阶层的焦虑则转向税源枯竭、地位下滑与政治清算，应对策略为囤积、征敛与强化控制。于是，“先占在手”既成为底层民众的求生逻辑，也成为精英阶层的保权策略，二者在行

为结构上共享同一套稀缺性焦虑驱动的底层认知。值得强调的是，自然环境构成饥民社会生成的必要背景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相同的环境压力在不同制度配置下会产生不同结果，这正是本文需要同时引入制度与文化分析的原因。

2. 生产效率低下与粮食“获取权”的系统性脆弱

森 (Amartya Sen) 的“食物获取权理论”指出：饥荒的根本原因并非粮食的绝对短缺，而是获取权利或渠道的系统性崩溃⁶。清末丁戊奇荒（1876—1879年）提供了典型例证：天灾导致减产，但更具决定性的致死因素在于运输能力低下、地方政府封锁粮食外运与官员囤积居奇，造成上千万人死亡。制度性剥夺与获取渠道的不可预期，才是将客观资源不足转化为主观不安全感的关键中介。生产效率低下的深层根因亦不仅在于技术落后，更在于产权制度的系统性不稳定：明清频繁调整的“摊丁入亩”、层层加码的“耗羨银”与地主对佃农的高额租约，使农业生产始终笼罩在被随时剥夺的阴影之下，深刻内化为“多得只是暂时，随时可能被夺走”的认知框架。

3. 知识输入受阻与治理纠错能力的结构性缺失

中国的地理边界系统性地抬高了外部知识、技术与制度经验进入的成本，明清时期以海禁为代表的封闭取向造成一种“知识孤岛效应”，使社会在面临危机时纠错参照系相对狭窄⁷。毛泽东时期的大饥荒（1959—1961年）对这一机制提供了更直接的验证：高额征购任务、系统性浮夸上报、信息封锁与纠错机制的全面失灵，使局部减产被持

续放大为系统性的灾难性死亡。据各方估算，这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 1500 万至 4500 万之间，数字差异显著，各方均属估算⁸；但无论取何估值，其规模均远超客观减产所能解释的范围，充分表明知识与信息的封闭不只是减缓技术进步，更会剥夺社会在危机时刻的自我修正能力。

上述三类物质与知识条件，并不必然直接产生饥民社会，但共同构成了客观稀缺高概率发生的结构性背景。只有当这一背景与频繁灾变、弱保障、强征敛、低社会流动与低社会信任相互叠加时，客观稀缺才会逐步沉淀为长期心理不安全感，并经由家庭记忆、村落规范与制度安排完成代际复制。

（二）历史与制度因素：主观稀缺的结构性放大

客观稀缺是物质层面可量化的资源不足；主观稀缺则是个体对自身资源状态的主观感知，受认知框架、社会比较基准与情绪状态的强烈调节，并不必然与客观稀缺成正比。决定主观稀缺程度的关键变量，除客观资源水平外，还包括制度保障的可信度与文化脚本对“足够”的定义——这意味着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化解稀缺性焦虑，这正是以下制度分析的必要性所在。

1. 战争频仍与社会信任的系统性清零

钱穆梳理中国历史指出，从秦汉至清末，两千余年间大规模战争平均每 7 至 8 年便爆发一次⁹。蒂利（Charles Tilly）的“战争造就国家”命题

揭示欧洲战争促使统治者与商人形成财政—军事契约，孕育出议会与法律制度；¹⁰然而在中国，战争更多表现为统治集团的内部汲取——加税、征粮与强制徭役——其制度效应是政权更趋集中掠夺，而非催生公共契约。从“安史之乱”后河北百年流离，到明末李自成军队的彻底破坏，再到太平天国十四年战争对江南的系统性摧毁，每一次大规模战争都是对社会信任资本的系统性清零，在民间社会固化了“与其相信制度与他人，不如将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防御性认知底线。

2. 集权分配体制与依附型理性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的集权体制下，资源配置优先保障统治集团，地方社会自主调配资源的制度空间极为有限。诺斯（Douglass North）的制度经济学分析表明，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普通民众缺乏对未来保障的稳定预期，倾向于焦虑性地争夺眼前可见的有限资源¹¹。集权分配由此催生“依附型理性”：资源获取经由与掌权者建立个人庇护关系来实现，固化了“对强者效忠顺从、对弱者支配压制”的双重行为模式，而非基于规则的平等合作。裴敏欣对当代中国“困陷式转型”的分析亦表明，这一历史逻辑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依然具有结构性再生产能力¹²。更值得关注的是，集权分配体系将社会上升通道收窄为科举仕途，将教育资源争夺转化为对政治权威的确认与再生产，制造了一种刻意设计的制度性稀缺。

3. 超越性信仰匮乏与普遍主义伦理的缺席

韦伯（Max Weber）指出，超越性伦理具有支撑延迟满足与跨圈层合

作的关键功能。欧洲基督教所提供的跨越阶层的统一性价值观，为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奠定了意义基础¹³。相比之下，费孝通的研究揭示，中国传统三大思想体系在提供普遍主义超越性伦理方面均存在结构性局限：儒学的实践逻辑将合作限定于血缘与地缘小圈子，其对“礼”的强调更多服务于现有等级秩序的维护；佛教的出世取向与道教的顺应自然逻辑，虽各有其社会功能，但同样缺乏跨越阶层、在陌生人间系统性建立普遍信任的价值机制¹⁴。这一局限使“圈内互助、圈外防御”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常态，稀缺性焦虑难以被广泛的社会合作与公共福利所缓解。

战争频仍、集权分配体制与超越性信仰的制度性缺席，共同将客观稀缺转化为主观稀缺，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内化为恒定的心理不安全感。

（三）稀缺性焦虑的自我复制机制

以上分析揭示了饥民社会的初次形成条件。一旦形成，稀缺性焦虑便通过认知锁定、文化惯习与情绪传染三种机制获得跨代延续与横向扩散的自我复制能力，使饥民社会无需持续的外部冲击即可自我维持。

1. 认知锁定：稀缺的隧道效应

穆莱纳坦（Sendhil Mullainathan）与沙菲尔（Eldar Shafir）的“隧道效应”（tunneling effect）研究表明，在稀缺条件下，人类认知带宽被眼前紧迫需求系统性占据，长期规划能力因此受损¹⁵，生成“越

焦虑则越短视，越短视则越匮乏，越匮乏则越焦虑”的自我封闭认知陷阱。认知锁定的影响不止于单次决策，更会长期重塑个体的世界观框架：从幼年便在资源争夺中成长的个体，往往将竞争性人际关系视为常态，将合作与分享视为不可信的行为选项，即便在外部物质条件改善后依然如此。神经科学研究进一步表明，儿童期稀缺经历会通过影响杏仁核与前额叶皮层的发育，形成“有毒压力”（toxic stress）效应，赋予稀缺性焦虑以跨代传递的生物基础。

2. 文化惯习：焦虑的自我合法化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理论指出，特定心理倾向与行为模式会通过家庭教育、日常实践与社会化过程，以“第二天性”的形式完成代际传递¹⁶。在饥民社会中，孩子在焦虑与抢夺氛围中成长，自然习得同样的心理结构与行为逻辑。文化习惯更深刻的顽固性在于其自我解释功能：个体不仅按照习得的焦虑逻辑行事，更会将这种行事方式理解为对焦虑合理性的“现实确认”。父母重复“不努力就会被淘汰”，子女在竞争中受挫后便“验证”了这一预言；同事因晋升而相互背刺，则“证明”了职场必然是零和丛林。稀缺性焦虑由此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结构（self-fulfilling prophecy）。

3. 情绪传染：焦虑的横向扩散

哈特菲尔德（Elaine Hatfield）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情绪可经由面部表情模仿、镜像神经元激活与社会规范同化三重机制实现快速横向传播¹⁷。在数字媒体时代，算法机制将这一效率极大放大：偏好高情绪

强度内容的算法系统，使焦虑类信息获得更高传播曝光；“学区房一夜涨价”、“985 毕业生也难觅就业”等叙事，足以将局部稀缺体验标准化为全社会的共同焦虑，大幅缩短稀缺感知的传播周期。

综上，饥民社会由客观稀缺的结构性背景、制度性放大机制与心理的自我复制回路三者共同生成，一旦确立便无需持续外部冲击即可自我维持。这三类机制的叠加，正是饥民社会顽固性的根源所在。

二、危害：稀缺性焦虑的三级侵蚀结构

稀缺性焦虑的危害具有多层次、渐进性与相互强化的结构特征：从个体认知与人格层面出发，向上渗透至群体关系与社会结构，最终上升为文明演化层面的系统性制约。低层级的破坏为高层级的恶化持续提供“燃料”，而高层级的结构失序又反过来固化低层级的心理创伤，形成难以单点突破的封闭循环。

（一）个体层面：人格、认知与健康的系统性损耗

1. 防御性人格与系统性不信任

在稀缺性焦虑的持续压迫下，个体更容易发展出防御性人格结构，表现为对资源争夺的优先性关注与对道义考量的系统性压抑。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描绘的“人对人是狼”¹⁸，在高不安全感环境中具有现实的经验基础。费孝通的乡土社会研究表明，围绕分家、遗产、宅基地与养老责任，血缘亲属间常因“吃了亏”而形成长期提防

与互害关系¹⁹。这一逻辑在当代城市转化为优绩主义框架下的互踩行为——晋升名额有限、绩效系于相对排名时，同事间容易出现抢功、隐匿信息、“甩锅”卸责等行为。防御性人格的深层表现是对一切规则与承诺的系统性不信任，并形成典型的自我实现性低信任陷阱：规则被预期不会被遵守，遵守规则便成为单方面不理性行为，规则真的不被遵守，不信任因此获得“现实验证”。

2. 认知窄化与习得性无助

森将贫困界定为“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系统性剥夺²⁰。在饥民社会中，个体因缺乏稳定的未来安全预期，长期规划能力趋于瓦解。穆莱纳坦与沙菲尔的稀缺隧道效应研究表明，焦虑使认知带宽系统性集中于当下紧迫问题，抑制对长期利益的理性权衡²¹。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躺平”与“摆烂”现象，从心理结构分析其实是长期高压焦虑下的认知耗竭与习得性无助：年轻人并非主观上拒绝努力，而是在反复受挫后确信努力与回报之间的正向联结已根本性断裂。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数据显示，城市青年焦虑症检出率持续攀升，印证了这一心理畸变已从个案上升为结构性现象²²。

3. 身心健康的慢性耗竭

持续性焦虑从多个生理机制对个体健康造成损害：皮质醇长期高水平分泌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风险并损害免疫功能，慢性心理压力是抑郁障碍的主要风险因子。近年来中国职场“过劳死”事件日趋频繁，年轻群体心血管疾病的早发化趋势，表明稀缺性焦虑驱动的高强度竞

争已开始直接损耗社会人力资本存量。

4. 道德实用主义与逆向淘汰

稀缺性焦虑的深层道德后果是对道德判断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延迟满足、诚实守信等道德规范在极端稀缺压力下面临强烈机会成本，当违反道德者反复获得正向回馈，社会便形成“道德不是原则而是工具”的文化共识。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失范状态”（anomie）理论表明，当社会规范失去约束力，个体趋向以任何可用手段满足需求²³，历史饥荒时期乡绅掠夺逃荒者土地、弱者境遇逆转后以同样逻辑回击所形成的互害循环即为典型表现。当道德实用主义逻辑弥漫全社会，便产生逆向淘汰效应：诚信者持续吃亏，迫使越来越多的行为者得出“守信才是弱者逻辑”的结论，社会信任底线被持续侵蚀。

（二）群体层面：信任、博弈结构与压迫形态

1. 信任坍塌与正式制度的空壳化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揭示，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与地缘为信任边界，构成圈内互助与圈外防御的二元格局，在资源竞争压力下这一格局只会进一步强化而非松动²⁴。“陌生人倒地不敢扶”这一社会现象，是差序格局在高度流动社会中延续的典型表征，反映出公共信任的系统性瓦解。公共信任系统性瓦解在奥尔森（Mancur Olson）的框架中构成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²⁵，同时阻碍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所揭示的自组织治理机制²⁶。信任坍塌在制度层面的最深刻后果，是诉诸

正式法律被解读为高风险行为——司法结果的不可预期性、高额诉讼成本与可能激化的对方报复，共同使正式制度路径趋于边缘化，社会转而依赖熟人网络与私下交易维持秩序，形成正式制度空壳化效应。

2. 零和博弈的常态化与想象力的压制

福斯特 (George M. Foster) 提出的“有限善假设” (image of limited good) 指出，在资源受限的农民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将财富、土地、机会乃至声望理解为总量固定的稀缺物，他人所得即自身所失，成功被系统性解读为对他人的掠夺²⁷。传统社会围绕灌溉水权、山林采伐权的宗族械斗，当代学区房竞争的激烈程度，均是有限善假设的行为表达。零和博弈常态化在文化层面产生两种相互强化的后果：其一，对他人成功产生结构性不适感——他人的成就不是激励，而是自身相对位置下降的信号；其二，对正和博弈可能性形成系统性怀疑——商业成功者被默认与“原始积累”挂钩，慈善行为被解读为“动机不纯”，合作提议被视为潜藏陷阱。这种对创造新价值可能性的深层否定，在文化层面系统性地压制了创新与社会变革所必需的想象力资源。

3. 套娃式压迫：结构性暴力的层级传递

稀缺性焦虑通过加尔通 (Johan Galtung) 所揭示的“结构性暴力”机制²⁸，在社会中生成特有的“套娃式”压迫形态：资源向上集中，风险向下转嫁，心理压力沿层级链条逐层传递。饥民社会中“人人既是受压者又是压迫者”的普遍性，源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处于层级链条的中间位置：在上级面前承受控制与剥夺，在下级或更弱者面前则有

动机将风险、成本与羞辱继续转嫁。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描述的“权力的毛细血管式渗透”在此获得具体化身²⁹：支配逻辑不需要中央命令的显性强制，而是经由每一个中间层级的主动复制在日常关系中实现自我扩散。套娃式压迫的终端受害者——底层工人、留守儿童、外来务工者——承受着来自上方层层累积的全部焦虑与压力，却没有任何可以继续转嫁的对象，只能将压力内化为自我损耗。

4. 群体对立与污名化机制

稀缺性焦虑在群体间激活“内群体偏爱”与“外群体偏见”的双重心理机制。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系统性污名化（将其定位为“竞争者”而非社会建设者）、城乡居民间的文化鄙视结构、网络空间对“精英群体”的强烈仇视，均在功能上具有重要的转移效应：它们将结构性问题个人化与群体化，将制度性根源置换为特定群体的道德归因，在维护现有秩序的同时加剧了社会横向撕裂。

（三）文明层面：制度脆弱、创新受阻与退化循环

1. 制度脆弱化与合法性的持续流失

诺斯将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视为有效制度的核心要件³⁰。在饥民社会的运作逻辑中，制度常被理解为统治者表达意志与分配资源的工具，而非社会各方稳定契约的制度化表达。制度的权威因此取决于背后支撑权力的强度，而非其合理性与可预期性，历史上每次王朝更替伴随的制度全面重置即为极端表现。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的分析表明, 规则的不确定性是腐败扩散的制度温床³¹, 制度合法性的持续流失进一步加速了上述循环。

2. 系统性短视、创新受阻与技术—权力同谋

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指出, 创新是资本耐心、知识网络、制度预期与组织协作共同作用的系统性产物, 其前提是信任与长期投入³²。在饥民社会中, 这一系统性前提的三个关键要素均告缺失: 创新收益通常具有时间滞后性而成本必须当下支付, 驱使资本倾向短周期低风险项目; 低信任环境驱使知识被囤积, 知识共享与容错合作的成本骤增; 一次失败往往意味着失去饭碗、信用与社会地位, 个体和机构因此系统性地偏向模仿复制而非冒险创造。这一框架解释了为何中国制造业长期停留于代工与仿制阶段: 当生存焦虑足够强烈, 模仿的安全性远优于创新, 规模扩张的确定收益远优于研发投入的不确定收益。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glu) 与罗宾逊 (James A. Robinson) 进一步指出, 掠夺性制度系统性地倾向于将技术配置于强化精英权力而非促进社会创新³³。人脸识别、大数据监控基础设施被优先配置于社会控制功能; 与此同时, 当网络内容审查与政治意志深度绑定, 技术便从扩展认知边界的工具转变为强化认知封闭的机制性围墙, 维持了“知道得少才安全”的系统性认知稀缺, 使稀缺性焦虑中的信息维度难以经由技术发展得到根本化解。

3. 文明退化循环的自我锁定

上述机制共同构成自我强化的退化循环: 物质稀缺引发普遍社会不

安，不安加速竞争性行为，竞争侵蚀信任，信任匮乏导致制度脆弱化，制度脆弱化抑制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丧失使社会面对外部冲击时的适应性降低，稀缺因此进一步加剧。唐德刚的“历史三峡”隐喻直观呈现了这一循环：晚清社会在权力高度集中与民众普遍不安的结构性拉扯中反复震荡，制度改革屡遭阻断，现代化转型难以积累稳定动能。这一退化循环的顽固性在于，其中每一个环节都能为自身延续提供内在合理化依据：因为稀缺所以争夺，因为争夺所以不信任，因为不信任所以制度脆弱，因为制度脆弱所以无法形成长期投入，因为缺乏长期投入所以稀缺持续。

结 语

饥民社会就像一道被集体无意识忽视的伤疤。疤痕的存在，既是创伤的客观证明，也是生命修复能力的内在见证。正视它、分析它、理解它的生成逻辑，是从生存焦虑走向价值自由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本文从一道童年创伤的具身经验出发，揭示了饥民社会作为一种稳定社会形态的生成逻辑与多层侵蚀机制。稀缺性焦虑并非单纯的个体心理状态，而是由客观稀缺的结构性背景、主观不安全感的制度性放大与心理焦虑的自我复制机制共同建构的结构性力量。其核心论断在于：这一力量不是任何单一变量的线性结果，因而单纯的经济增长或技术进步均无法自动化解其制度根源；它的危害具有层叠性与系统性，各层级之间相互强化，构成难以单点突破的封闭结构；而其持续的再生产，亦并不全然依赖外部强制力——普通民众的依附心理、对无序的文化性恐惧与“次级获益”³⁴的微观激励，共同赋予饥民社会以广泛

的内部支撑力，这是理解其高度顽固性的核心所在。

然而，揭示危害并不等于指明出路。饥民社会之所以能够持续自我再生产，在于其拥有多层次、相互强化的继续机制——文化心理的代际传递、制度权力的结构性锁定、民众的主动自我维护与外部压力的持续催化，共同将稀缺性焦虑编织进社会日常运转的每一个细节。理解这一继续机制，是后续研究的首要方向。

注释

-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精神卫生调查》，2022年。
- 2 白鲁恂：《亚洲的权力与政治：权威的文化维度》、《中国政治的精神》[Pye, L. W. (1985).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ye, L. W. (1992).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3 裴敏欣：《中国的转型困境：发展型威权主义的局限》[Pei, M. (2006).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4 乔纳森·昂格尔：《中国农村的变迁》[Unger, J. (2002).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 5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35—38页。
- 6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权利与剥夺论》。[Sen, A. (1981).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7 费正清与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Fairbank, J. K., & Reischauer, E. O. (1978).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8 杨继绳：《墓碑：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饥荒纪实》（上、下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关于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各方估算差异显著：冯客（Frank Dikötter）估约4500万，Judith Banister估约3000万，官方从未公布系统数据；学界普遍认为超过1500

万，但上限各方仍有争议，引用时均属估算。

- 9 钱穆：《国史大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
- 10 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Tilly, C.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Blackwell.]
- 11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表现》[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2 同注释3。
- 13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Weber, M. (193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 Parsons. London: Allen & Unwin.]
- 1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15 穆莱纳坦与沙菲尔：《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Mullainathan, S., & Shafir, E. (2013).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New York: Times Books.]
- 16 布尔迪厄：《实践的逻辑》[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7 哈特菲尔德、卡乔波与拉普森：《情绪感染》[Hatfield, E., Cacioppo, J. T., & Rapson, R. L. (1993). *Emotional Contag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8 霍布斯：《利维坦》[Hobbes, T. (1651). *Leviathan*. London: Andrew Crooke.]
- 19 同注释14。
- 20 阿马蒂亚·森：《发展即自由》[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
- 21 同注释15。
- 22 同注释1。
- 23 涂尔干：《自杀论》[Durkheim, É. (1897). *Le Suicide*. Paris: Alcan. 英译：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trans. J. A. Spaulding & G. Simpson. Glencoe: Free Press, 1951.]
- 24 同注释14。
- 25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群体理论》[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6 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7 福斯特:《农民社会与有限资源的观念》[Foster, G. M. (1965). *Peasant Society and 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2), 293–315.]
- 28 加尔通:《暴力、和平与和平研究》[Galtung, J. (1969).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3), 167–191.]
- 29 福柯:《监视与惩罚》[Foucault, M.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Paris: Gallimard. 英译: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 A.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1977.]
- 30 同注释11。
- 3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ontesquieu, C. de S. (1748). *De l'Esprit des lois*. Geneva. 英译: *The Spirit of the Laws*, trans. A. Cohler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32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Schumpeter, J. A.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 33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起源》[Acemoglu, D., & Robinson, J. A.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 34 有关“次级获益”参考:费希柏恩:《次级获益概念:定义问题及其临床滥用》[Fishbain, D. A. (1994). “Secondary Gain Concept: Definition Problems and Its Abuse in Medical Practice.” APS Journal , [Volume 3, Issue 4: 264–273.](#)]

专题探讨

徐贲

作者徐贲为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多产的公共知识分子，最新著作有“极权三部曲”——《极权下的人性》、《极权下的日常生活》、《极权下的身份焦虑》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3期

2026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从AI的局限性 到民主研究的新尝试

摘要：民主制度的危机，并不总是来自暴力颠覆或公开否定，更常发生于合法、合规却持续累积的制度性扰动之中。本文尝试引入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对抗性样本”与“过拟合”等概念，将其作为分析工具而非修辞比喻，以重新理解现代民主在高度程序化和理性化条件下所呈现的结构性脆弱。正如一个在训练数据上表现优异的算法可能因微小噪声而产生严重误判，民主制度也可能在规则完整、程序合法的前提下逐渐丧失判断能力与实质功能：规则没有被破坏，却被精准利用；制度仍在运转，却已发生功能偏移。本文试图说明，民主面临的关键挑战或许不仅是如何设计更完善的规则，更是如何提高制度的鲁棒性（Robustness），使其在面对恶意利用时仍能维持判断、自我修正和持续运转的能力。

在机器学习研究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叫作“对抗性样本”（Adversarial Examples）。它指的是：只需对一张图像进行极其微小、几乎无法被人察觉的修改，就可能让原本表现优异的人工智能系统作出完全错误的判断。¹ 研究者由此发现，一个系统的危险往往不来自正面摧毁，而来自对其运行规则的精准利用。

将这一发现用于思考民主制度，并非简单的技术比附，而是因为两者在结构上存在某种相似性。民主制度和算法系统一样，都依赖一套规则、程序和基本假设才能正常运作。当这些假设被有意利用时，制度未必会立刻崩溃，却可能逐渐发生功能偏移。规则依然存在，程序依然运转，但其结果已经偏离最初目标。

这种现象并不一定表现为公开的政变或暴力推翻，更常见的是形式合

法、程序合规的策略性操作。例如利用言论自由传播虚假信息，利用经济规则进行政治施压，或者利用程序漏洞谋取制度优势。这些行为并未直接破坏规则，却可能像算法中的“对抗性噪声”一样，持续干扰制度的判断能力。

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本文还将借用机器学习中的另一个概念——“过拟合”（Overfitting）。所谓过拟合，是指一个系统过度依赖既有经验，以至于难以应对新的环境变化。² 与之相对的“鲁棒性”（Robustness），则是系统在面对干扰、操纵和不确定性时保持稳定运行的能力。³ 本文试图说明，民主面临的关键挑战或许不仅是如何设计更完善的规则，更是如何提高制度的鲁棒性，使其在面对恶意利用时仍能维持判断、自我修正和持续运转的能力。

这一类比还揭示了民主制度潜在的“过拟合”风险。当一个制度长期在价值共识高度统一、环境相对稳定的“训练集”中运行时，它会不断优化自身，使规则更细化、程序更透明。在已知分布内，这样的优化看似成功，但也容易导致制度僵化。当环境发生偏移，面对高度异质、不对称、甚至恶意的参与者时，这种高度优化的制度可能像一个在标准数据集中表现完美、在现实世界却频频出错的模型。

然而，这种类比同时提醒我们必须警惕结论的边界。对抗性样本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模型本身应被否定，而是促使研究者去提升模型的鲁棒性。同理，民主制度遭遇操纵，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失效，而是提醒我们需要引入“抗对抗性”的设计。倘若结论被引向“为了反制攻击，系统必须同样不透明和不可预测”，那么就陷入逻辑陷阱。这既是算

法的误区，也可能使政治制度走向其反面——以牺牲透明与合法性换取短期防御能力，实则是“自我背叛”。

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证明规则本身的软弱，而在于揭示：任何过度依赖僵化规则、却丧失主动判断能力的系统，都可能成为对抗性操纵的理想目标。难题在于，如何在坚持透明与规则的前提下，让制度具备识别恶意、保持审慎的“免疫力”，从而不只是“拟合过去”，而能够有效应对未知的恶意干扰。

一 AI 的“对抗性样本”撬动传统的民主研究范式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曾报道过一个经典案例。⁴ 研究者拍摄了一张猫的照片，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毫无歧义的对象：一眼即可识别。然而，当研究者以一种高度计算化的方式，对图片中每一个像素施加极其细微的数值调整后——这些变化小到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图像在视觉上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结果却令人错愕。当这张“被污染”的照片被输入谷歌的图像识别系统时，系统以接近百分之百的置信度断言：这不是一只猫，而是一台拖拉机。

这一结果并非偶然失误，而是揭示了一个深层悖论：算法的逻辑越严密、模型越复杂、参数越精细，它反而越容易被那种在常识层面完全“不成理由”的微小扰动所击垮。这种理性病理并不只存在于算法之中。当我们审视人类社会中那些看似无懈可击的规则体系时，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性：最精密的程序正义，往往也最容易被战略性的规则套利所寄生；最透明的制度框架，反而可能为最擅长伪装的行为者

提供最完美的舞台。而当这种脆弱性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本能地转向一种更古老、更直觉的解决方案：“恶人自有恶人磨”。

民主理论研究正面临一个需要深刻反思的时刻。传统的民主研究范式，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启蒙时代以来对理性、透明和程序正义的信念之上：只要规则足够公正、程序足够透明、信息足够公开，民主制度就能产出合理的决策。然而，这套理论框架在二十一世纪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挑战不仅来自外部竞争，更来自民主制度内部的异化：算法操纵舆论、极化政治侵蚀共识、程序正义被战略性利用为阻挠工具、透明空间反而成为虚假信息扩散的渠道。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利用数千万用户数据进行政治画像和定向传播的事件⁵，引发了全球对民主社会信息操纵能力的担忧。规则并未被公开废除，选举程序也照常进行，但信息环境本身却遭到了精细化干预。此后，围绕社交媒体平台、推荐算法和舆论操控的争议不断出现，显示出民主制度赖以运作的信息基础并不像传统理论设想的那样稳定。⁶

与此同时，一些非民主国家也逐渐学会利用开放社会的制度特点影响民主国家的公共讨论。例如，近年来围绕境外社交媒体的信息战、网络水军传播以及针对特定议题的舆论放大现象，已成为各国情报与安全机构持续关注的问题。其特点并非直接摧毁民主程序，而是利用民主社会开放、透明和自由表达的环境，向其持续输入具有误导性或高度极化的信息。这种做法与机器学习中的“对抗性样本”颇为相似：系统本身仍在正常运行，但其判断过程却被经过精心设计的输入所干扰。

例如，自 2019 年以来，围绕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以及疫情叙事的大规模跨平台信息传播行动，已经成为欧美学界研究“国家支持信息操纵”（state-backed information operations）的重要案例。⁷ 其特点并不是说服所有人接受某种观点，而是通过制造噪音、放大分歧、削弱信任来干扰公共判断。对于民主社会而言，这类行为利用的恰恰是其最珍视的开放原则：信息越自由流动，操纵性信息也越容易进入公共讨论空间。换言之，开放本身成为了被利用的条件。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重新审视民主制度提供了一个意外的视角。机器学习研究发现，一个系统即使在正常环境中表现良好，也可能在面对新的环境或刻意设计的干扰时迅速失效。这种现象为理解现代民主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新的分析语言。与其将民主危机简单理解为民主与专制、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对抗，不如将其视为一个制度如何应对操纵、适应变化并维持判断能力的问题。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过拟合”这一概念。在机器学习中，一个系统过度依赖过去的经验和既有环境，因此在面对新的情况时反而表现不佳。类似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在政治制度中：许多民主制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其运行往往默认参与者遵守某些基本规范和共同规则。然而，当越来越多行为者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制度的开放性和程序性优势时，这些原本有效的设计可能反而成为脆弱性的来源。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鲁棒性”——即一个系统在面对干扰、变化和恶意利用时，仍能维持基本功能和判断能力的特性。从鲁棒性角度看，当代民主面临的核心挑战或许不只是如何实现更开放、更透明的治理，

而是如何在保持开放的同时避免被系统性利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借助“过拟合”的视角，重新审视“恶人自有恶人磨”这一古老的政治直觉。这句话既表达了人们对失灵规则的失望，也寄托着以更强大力量制衡作恶者的期待。然而，它同时包含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当人们试图用更深的算计对付精于算计的人时，究竟是在修复制度，还是在进一步侵蚀制度赖以存在的规则基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或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民主制度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如果这个尝试能够为当代民主研究提供哪怕一点新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制度脆弱性的根源，能够启发我们思考超越简单对抗的第三条道路，那么它就实现了自己的目的。算法的过拟合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冷酷的镜子，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人类世界中那些看似成熟、实则脆弱的博弈结构，以及我们在理性的名义下，究竟走向了何处。

二 民主仍然合法，但是否还有效？

对抗性样本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并不在于系统会“犯错”，而在于：错误并不是通过正面摧毁系统产生的，而是通过精确地利用系统自身的规则、假设和敏感点产生的。民主制度的脆弱性，恰恰也集中在这些“看似合理、甚至是民主自身美德”的细小部位。

首先，一个高度脆弱的地方在于程序正义对结果正义的过度信任。

民主制度往往假定：只要程序是合法的、形式上是公平的，结果就具有正当性。但现实中，程序本身可以被极端策略性地操纵——选区划分、投票门槛、投票时间安排、候选人资格规则、信息披露的时点——这些都不违反程序，却可以系统性地扭曲结果。就像对抗性样本并没有“破坏算法”，而是让算法在完全遵循自身规则的情况下，得出荒谬结论。

第二个极其敏感的部位是对“理性选民”的假设。民主制度在设计时，往往隐含着一个温和而乐观的前提：公民大体上能够在事实上形成判断。但在现实中，只需要对信息环境施加极小但持续的扰动——情绪化叙事、碎片化事实、阴谋论的“合理怀疑”包装、算法推荐的微妙倾斜——就足以让公共判断整体偏移。这里的“干扰”并不需要是赤裸裸的谎言，它只需要改变注意力的分布，就像在图像中加一点噪声，系统就再也“看不清”整体。

第三个脆弱点在于权力制衡机制对“善意使用”的依赖。民主制度中的制衡，本质上假定各方会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制度精神，而不仅仅是制度表面。一旦某一方开始以“极限合规”的方式行动——凡事只问“是否合法”，而不问“是否破坏制度的功能”——制衡机制反而会变成瘫痪机制。否决权、拖延程序、司法解释空间，这些原本是防止权力滥用的装置，在对抗性使用下，会像被精心设计的输入一样，触发制度的反向行为。

第四个往往被低估的脆弱性，是民主对“例外状态”的容忍。民主制度允许紧急状态、临时授权、非常措施，这是为了应对真实的危机。

但问题在于，“危机”的定义本身极易被操纵。一旦社会被不断维持在一种轻度但持续的紧张状态中，例外就会常态化，而民主并不会在某个明确的节点“被推翻”，而是像模型性能逐步退化一样，慢慢偏离原本的功能区间。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微小”却致命的地方：民主对冷漠的高度敏感性。民主制度并不是在公民积极参与时最脆弱，而是在多数人疲惫、犬儒、觉得“反正也改变不了什么”时最容易被对抗性利用。低参与率并不违反民主规则，但它会极大地放大少数高度动员群体的影响力。这种变化在统计上看似正常，在制度上完全合法，却会在实质上改变权力结构。

如果对这个类比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民主的崩坏往往不是“被攻击致死”，而是在持续、合法、微小的扰动中，被引导着走向一种仍然自称为民主、却已经在功能上变质的状态。

反过来可以问，有没有可能设计一种“对抗性鲁棒”的民主？还是说，民主的开放性本身就注定了它永远暴露在这种脆弱性之中？在机器学习里，一个系统有“鲁棒性”，并不是指它永远不会犯错，而是指：当输入遭遇小幅、噪声级、甚至是敌意的扰动时，系统的整体判断不会发生灾难性偏移。鲁棒性也称稳健性，指事物可以抵御外部应力和影响并维持原有状态的自身性质。鲁棒系统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脏数据、异常样本、策略性攻击，它的性能可能下降，但不会被轻易“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换句话说，鲁棒性关心的不是完美，而是退化方式：系统是在压力下缓慢变差，还是突然翻车。

把这个概念移植到民主制度中，“对抗性鲁棒的民主”并不是指一种不会被操纵、不会被侵蚀的民主，而是指一种制度结构：即便存在恶意行为者、信息污染、规则套利和公民冷漠，民主仍能在功能上保持基本判断能力，不会因为一系列合法但精确的“小动作”，就迅速滑向实质性的专制。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完全“对抗性鲁棒”的民主几乎不可能，但“提高鲁棒性”的民主不仅可能，而且是民主唯一现实的生存策略。

原因恰恰在民主的开放性。民主的开放性意味着三个结构性暴露点。第一，它允许输入来自任何方向，事实、谣言、情绪、恐惧都可以进入公共空间；第二，它承认规则先于动机，只要形式合法，行为就具有正当性外观；第三，它依赖公民持续参与，而参与本身无法被强制。这三点共同构成了民主不可消除的“攻击面”。从这个角度看，民主确实不可能像一个封闭系统那样被彻底加固。

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只能在脆弱中等死。机器学习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鲁棒性不是通过封闭实现的，而是通过冗余、校验、延迟和反思实现的。

对应到民主制度，有几种非常“反直觉”、却高度契合鲁棒性思维的方向。

第一，放弃对单一决策节点的过度信任。高度鲁棒的模型，往往不是“一锤定音”，而是通过多层判断、不同尺度的校验来降低单点失效风

险。对应到民主，就是避免把政治命运压缩到一次选举、一次公投、一次简单多数的瞬间判断中。时间上的延迟、程序上的复议、多机构的异步判断，本质上都是在增加制度的“抗噪声能力”。

第二，承认并显性化“坏行为者”的存在。在鲁棒训练中，模型会被故意暴露在对抗性样本下，而不是假设世界是善意的。民主如果仍然假定权力参与者“总体上是诚实的”，那它在结构上就注定脆弱。更鲁棒的民主，不是靠道德呼吁，而是靠制度默认：有人会钻空子、制造恐慌、操纵规则，于是提前为这些行为设置摩擦成本。

第三，把“判断能力”而非“表达意愿”作为核心资源来保护。一个鲁棒模型的关键不是输出，而是内部表征是否稳定。民主也是如此。如果公共讨论空间被情绪化、极端化、即时化彻底侵蚀，那么再完美的投票机制也只是噪声聚合器。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生态、教育制度、讨论节奏，反而是民主真正的“防御层”，而不是选举技术本身。

第四，也是最残酷的一点：民主必须对自身的退化保持可感知性。鲁棒系统不会假装自己“正常工作”，它会暴露不确定性、显示置信区间、发出预警信号。而现实中的民主，往往在形式上运转良好时，掩盖了功能性失效。越是“合法、平稳、程序完整”的崩坏，越难被察觉，也越危险。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民主的开放性确实使它永远暴露在对抗性脆弱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注定失败。它意味着民主不能被理解为一种静态制度设计，而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持续的“鲁棒性工程”——

种永远假定自己会被攻击、被误导、被利用，因此不断自我修正、自我加固的政治形式。

三 算法的完美表演与致命脆弱

现代深度学习算法并不是在“理解”对象，而是在一个极其高维的空间中，构建精细而复杂的决策边界。这些边界在训练数据上表现得近乎完美，却也因此变得异常脆弱。只要输入略微偏离既有分布，判断就可能突然跨越边界，从“这是猫”跳跃到“这是拖拉机”，中间没有任何渐进的过渡。

这正是所谓的“过拟合”问题。但与其把它理解为一个纯粹的技术缺陷，不如将其视为一种理性形态的结构性后果。过拟合把历史经验当成真理本身，与之同构的现象包括：官僚体系中对流程的迷信、极权环境中对“正确表态”的依赖，技术治理中对指标、排名、基准测试的崇拜。算法的“记住一切细节、却失去理解”，正是人类社会中那种“执行得无懈可击，却对现实毫无感知”的理性病理。

算法并没有走错路，它只是把人类已经走过的那条危险道路推向了极端。为了在既定评价体系中取得最优表现，算法学会了极其精确地贴合过去的经验，记住了所有细节，甚至包括其中的噪声，却因此失去了对对象本身的把握。它并非真正理解了世界，而是把历史数据误认为世界本身。就像一个学生可以完美背诵历年考题，却在题目稍作变化时完全失去应对能力。

这一现象揭示了机器学习领域著名的“没有免费午餐定理”（No Free Lunch Theorem）。⁸ 该定理指出，不存在一种能够在所有问题和所有环境中都保持最优表现的算法。一个系统在某些条件下表现越出色，往往意味着它对这些条件的依赖也越强；而这种成功本身，恰恰可能成为其脆弱性的来源。换言之，任何针对特定环境优化到极致的方案，都不可避免地要以牺牲其他环境中的适应能力为代价。

从这个角度看，算法在基准测试中的“完美表现”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稳健。相反，它有时更像一种危险的幻觉：人们误以为系统已经掌握了世界的规律，而实际上它只是高度适应了某一种特定环境。一旦环境发生变化，或者遭遇超出预期的输入，原本令人惊叹的成功便可能迅速转化为彻底的失效。算法的教训在于，最大的风险往往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把局部成功误认为普遍真理。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没有免费午餐定理”不仅适用于算法，也适用于制度、组织乃至文明本身。任何一种规则体系，都不可能同时所有情境下达到最优；它所获得的优势，往往也是其未来脆弱性的来源。

这种理性病理并不只存在于算法之中。在现实世界里，当规则、程序和指标被视为判断的替代物时，类似的脆弱性同样会显现。一个高度透明、强调程序正义的制度，内部看似无懈可击，却可能在面对刻意利用规则灰色地带、擅长战略性伪装的对手时显得迟钝而被动。规则本身并未被违反，但规则赖以运作的前提——对诚实参与的默认假设——却被系统性地寄生和消耗。结果是，越是严格遵守程序的一方，越容易陷入一种“诚实者的困局”。

问题的核心在于，任何明确的规则体系都必然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张力：规则越是精确、透明、可预测，就越容易被那些将规则本身当作博弈对象的行为者所利用。这不是规则设计的失误，而是形式理性的内在悖论。一个完美透明的系统，恰恰为战略性行为提供了完美的可计算性。当所有参与者都知道规则的每一个细节，知道执行的每一个步骤，那些不受诚信约束的行为者便获得了巨大的优势——他们可以精确计算如何在技术上遵守规则，同时在实质上完全违背规则的精神。

这种现象在国际关系中尤为明显。某些国家可以一边签署国际公约，一边通过巧妙的法律解释、技术性的规避手段、或者利用执行机制的软弱性，将承诺变成一纸空文。他们精通如何在形式上满足所有要求，同时在实质上追求完全相反的目标。更关键的是，这种行为往往很难被明确指控为“违规”，因为它恰恰利用了规则体系对程序正义的承诺——任何指控都必须提供确凿证据，任何惩罚都必须经过漫长的程序，而在这个过程中，违规行为早已完成，利益早已到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恶人自有恶人磨”这一逻辑显得格外诱人。当一个长期依赖规则套利、信息不对称和战略装傻的行为者，突然遇到一个拒绝按既定套路出牌的对手时，原有的机制似乎会失效。这种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它承诺了一种迟来的清算，一种对长期失衡的纠正，一种让擅长玩弄规则的人也尝到被玩弄滋味的痛快。

四、“磨恶人”的多重面相：从规则悬置到高阶博弈

然而，“恶人自有恶人磨”这一现象远比简单的“以暴制暴”或“以不可预测性对抗不可预测性”复杂得多。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和社会博弈中，真正有效的制衡往往不是抛弃规则，而是调用更高阶、更复杂的规则系统，或者利用多重博弈层次的相互制约。

考察历史上那些成功“磨”掉恶人的案例，会发现它们通常不是单纯依靠蛮力或不可预测性，而是巧妙地组合了多种机制。有些依靠的是国际声誉的长期积累——当一个行为者长期违背承诺、滥用规则时，其声誉资本会逐渐耗尽，最终导致其他国家形成默契的排斥联盟。有些利用的是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通过精心设计的制裁和激励措施，让违规行为的成本远远超过收益。还有些诉诸的是更根本的规范性压力——当某种行为被成功框定为违反人类共同价值时，即便没有明确的法律约束，行为者也会面临巨大的道德和政治成本。

以冷战后期苏联的解体为例。西方阵营的胜利，并非主要依靠军事威胁或不可预测的冒险主义，而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多层系统：意识形态上的持续竞争、经济上的技术封锁与消耗战、外交上的联盟网络建设、以及对东欧国家民间社会的长期支持。这是一种“元规则”层面的博弈——不是在具体的条约和协议中针锋相对，而是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定义什么是可接受的行为、什么是合法性的来源。当苏联发现自己不仅在经济上难以为继，更在道德叙事上完全失去说服力时，体制的崩溃便成为必然。

同样，欧盟对成员国的约束机制，也展现了一种复杂的多层博弈结构。当某个成员国的政府试图违背民主原则或法治精神时，欧盟不仅可以

启动正式的制裁程序，更可以通过暂停资金拨付、降低投票权重、动员其他成员国的舆论压力等手段，形成一个立体的制约网络。这种机制的有效性，恰恰在于它不依赖单一的强制力，而是通过多重关系的相互嵌套，让任何单方面的违规行为都会触发多个层面的反应。

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成功的制衡案例都利用了“退出选项”(exit option)⁹的威慑力量。当一个行为者过度依赖某个关系网络时，其他参与者威胁退出本身就成为一种强大的约束。这不需要诉诸暴力或不可预测性，只需要清晰地展示：如果你继续滥用规则，我们可以选择离开这个游戏，建立一个你无法进入的新游戏。这种威胁之所以有效，恰恰因为它保留了理性和可预测性——它不是疯狂的赌博，而是经过计算的战略选择。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磨恶人”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规则、拥抱混乱。相反，最有效的制衡往往来自于规则的分层和冗余：当一层规则被利用或规避时，还有更高层次的规范、更广泛的联盟、更长期的声誉机制可以调用。这是一种“元博弈”——不是在具体的规则内部争夺优势，而是关于哪套规则应当适用、由谁来解释、在什么范围内有效的更高层次的竞争。

当然，这种多层博弈也常常伴随道德上的灰色地带。为了维护更高层次的规则，有时不得不在较低层次上容忍某种程度的违规；为了孤立一个破坏性行为者，有时不得与另一些不那么可靠的盟友合作；为了维持长期的声誉，有时不得不在短期内承受不公平的指责。这些困境并不意味着规则体系本身是虚伪的，而是说明了一个根本性的现

实：任何规则系统都不可能在所有层次上同时达到完美的一致性，维护规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判断、权衡和战略选择的过程。

五 算法与人类的本质差异：为何类比需要谨慎

将人类社会直接类比为“一个高度过拟合的模型”，虽然具有启发性，却也可能掩盖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算法的过拟合是致命的，恰恰因为它缺乏人类系统所特有的那些“元认知”层面的能力——叙事重构、价值反思、身份认同的转变、以及通过文化和制度演化实现自我修正的可能性。

算法在本质上是一个封闭的优化系统。它接受明确的目标函数，在给定的数据分布上寻找最优解，然后将这个解固化为参数。一旦训练完成，它就失去了重新审视目标本身的能力。当环境发生变化时，过拟合的模型不会意识到“也许我记住的那些模式已经不再适用”，更不会主动质疑“也许我优化的目标函数本身就有问题”。它只能继续执行既有的决策逻辑，直到彻底失效。

人类社会则根本不同。即便在高度僵化的体制中，也始终存在某种元层次的反思能力。人们可以讲述关于自身处境的故事，可以质疑既有规则的合法性，可以想象不同的可能性。这种叙事能力不仅仅是装饰性的，它实际上构成了社会系统自我修正的关键机制。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讲述一个新的故事——关于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旧的规则和制度就会逐渐失去其道德根基，即便它们在形式上依然存在。

更关键的是，人类社会具有“预言自我实现”¹⁰的独特机制。当人们普遍相信某种制度即将崩溃时，这种信念本身就会加速崩溃的到来；反之，当人们相信变革是可能的，这种信念也会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机会。这在算法系统中完全不可能发生——一个神经网络不会因为“相信自己能够泛化得更好”就真的泛化得更好，它只能被动地执行训练中固化下来的参数。

历史中那些“良性黑天鹅”¹¹事件，往往正是源于这种元认知能力的突然激活。柏林墙的倒塌、南非的和平转型、爱尔兰的和平进程，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而是包含了深刻的叙事转变、身份重构、以及对“我们是谁、我们想成为什么”这类根本问题的重新回答。这些转变往往看似偶然，实则是长期积累的文化、道德和政治张力的突然释放。它们无法被简化为一个优化问题，因为它们涉及的是目标函数本身的重新定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社会虽然时常表现出类似过拟合的症状——对既有程序的僵化执行、对历史经验的盲目崇拜、对异常情况的脆弱性——却又能够时不时地通过剧烈的自我转型来避免彻底的崩溃。文化的演化、制度的创新、价值观的更新，这些都是算法所不具备的自我修正机制。它们未必总是及时，未必总是无痛，但它们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系统可以在不彻底崩溃的情况下，逐渐适应新的现实。

然而，这种乐观的观察也需要一个重要的限定：人类的元认知能力虽然存在，却并不保证一定会被激活。历史上同样充满了那些错失自我修正机会、最终走向崩溃的文明和政体。当权力结构过于僵化、当意

意识形态控制过于严密、当既得利益集团过于强大时，即便存在反思和质疑的声音，也可能被系统性地压制。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确实会表现得越来越像一个过拟合的模型——对既有模式的任何偏离都被视为威胁，所有的创新都被扼杀，直到系统在某个外部冲击下突然崩溃。

这提示我们，算法的镜子之所以冷酷，不仅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理性的脆弱性，更因为它警示了一种真实的危险：如果我们持续压制那些使人类社会不同于算法的能力——叙事、反思、想象、质疑——那么我们确实可能退化为一个高度过拟合的系统，失去自我修正的可能性，只能被动地等待下一次崩溃。

六 超越二元对立：鲁棒性工程与制度韧性

当前的分析往往陷入一种二元对立：要么接受规则体系的虚假稳定和结构性脆弱，继续在过拟合的轨道上滑行；要么拥抱“恶人自有恶人磨”的逻辑，以不可预测性对抗不可预测性，最终滑向丛林法则。然而，这种二元框架本身可能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更为复杂、也更为稳健的第三条道路：不是消除不确定性，而是提高系统吸收不确定性的能力；不是追求完美控制，而是建设能够持续适应变化的制度韧性。

这一思路首先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效率与稳定性的关系。算法系统往往倾向于追求极致优化，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状态。但复杂系统的历史反复表明，效率并不等于安全，最优解也不一定是最稳健的解。许多系统恰恰是在高度优化之后变得脆弱，因为它们失去了应对意外

情况所需的缓冲空间。

因此，一个健康的制度体系往往需要刻意保留某种程度的冗余。所谓冗余，并非简单的浪费，而是一种保险机制。这意味着不把所有筹码押在同一套规则、同一个决策中心或同一种解决方案上，而是维持多个平行的、部分重叠的、甚至彼此竞争的子系统。当一种机制失效时，其他机制仍能继续发挥作用；当某种规则被利用时，其他层次的约束能够提供补救。

这种冗余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几乎无处不在。没有单一物种能够永远垄断资源，也没有单一力量能够彻底控制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往往来自这种看似低效的多样性与重叠性。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权力分立、联邦结构、多元媒体、独立司法、学术自治等安排，本质上都承担着类似功能。它们增加了决策成本，却也降低了单点失效导致整体崩溃的风险。

仅有冗余还不够。真正具有韧性的系统，还必须具备持续调整自身的能力。规则不能被视为永恒不变的教条，而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可以不断修正和更新的工具。制度的生命力，不仅来自规则本身，更来自修正规则的能力。

这意味着需要建立适应性治理机制。一个具有适应性的系统，会持续评估自身运行效果，识别哪些规则正在被滥用，哪些程序已经失去原有意义，并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进行调整。在国际治理领域兴起的各种软法机制¹²——行为准则、同行评议、最佳实践规范——正体

现了这种思路。它们不像正式法律那样依赖强制执行，却能够通过声誉、合作和长期关系形成约束，同时保留更大的调整空间。

与此同时，一个稳健系统还需要实现可预测性的分层配置。在基本原则和程序层面保持高度可预测性，使参与者能够形成稳定预期；但在具体执行和裁量层面保留适度弹性，从而防止行为者通过精密计算实施规则套利。

成熟的法律体系通常遵循这一原则。法律提供清晰的原则框架，却不会预先规定所有可能情形的具体结果。法官的裁量权既提高了规则适用的灵活性，也增加了策略性规避法律的难度。这种安排看似牺牲了部分确定性，却提升了整体系统面对复杂现实的适应能力。

类似思想正在影响新一代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单纯提高模型复杂度和预测精度，只会让过拟合风险更加严重。更有前景的方向，是引入分布外检测、不确定性评估、多层验证和元学习机制¹³，使系统能够识别何时应当相信既有模型，何时应当重新学习。结构上的冗余与分层虽然牺牲了部分效率，却换来了面对意外情况时更强的鲁棒性。

这一思路同样有助于重新理解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位置。承认偶然性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接受“一切皆随机”的虚无主义，更并不意味着应当主动制造混乱。历史中的许多关键转折往往源于偶然事件：一次刺杀、一场疫情、一位领导人的突然离世，都可能改变历史方向。但偶然性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复杂系统不存在绝对确定的轨迹，而不

是鼓励人们把不可预测性武器化。

恰恰因为偶然性无法消除，我们才更需要建立能够吸收和利用冲击的制度框架。一个真正稳健的系统，不追求消灭所有波动，而是能够从波动中学习，在冲击中完成调整。偶然性提供契机，但能否将契机转化为积极变化，则取决于系统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准备和韧性。

因此，在规则过拟合的虚假稳定与不可预测性的混乱之间，确实存在第三种可能。它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却不向混乱投降；它接受复杂性的现实，却不放弃理性的追求。它所追求的不是完美控制，而是持续适应；不是绝对确定，而是长期韧性。

七 算法时代：重新定义理性

算法的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冷酷的镜子。我们害怕机器学习利用规则漏洞、学会装傻、学会策略性欺骗，却又在现实政治和社会竞争中不断奖励这些行为。当判断让位于博弈技巧，当理解被压缩为胜负计算，理性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强，反而会越来越像一个高度过拟合的模型：在熟悉环境中表现卓越，在真正的意外面前却毫无防御能力。

但这面镜子带来的并不仅仅是警告。算法之所以能够如此清晰地暴露过拟合的问题，恰恰因为它比人类社会更加透明。算法的失败模式容易被观察、分析和复现，而人类制度中的过拟合则往往隐藏在意识形态、道德修辞和制度合法性的外衣之下。人工智能的发展使这些长期被忽视的问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显现出来。

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定义理性本身。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技术领域还是制度设计领域，人们都倾向于把理性理解为一种不断优化的能力：更准确的预测、更高的效率、更少的误差、更精确的控制。然而，复杂系统的经验正在不断提醒我们，过度优化本身可能成为脆弱性的来源。一个为了特定环境而被优化到极致的系统，往往会丧失面对未知环境时的适应能力。

因此，成熟的理性不应仅仅追求准确率，而应同时关注鲁棒性；不应仅仅追求效率，而应同时维护韧性；不应仅仅追求一致性，而应同时保留调整和学习的空间。在不确定世界中，适度的不完美有时比完美更可靠，适度的模糊有时比精确更具有生命力。

这种转变不仅适用于人工智能系统，也适用于社会制度。一个好的制度不应被理解为能够自动产出正确答案的完美机器，而应被理解为一个能够容纳多样性、吸收冲击并持续修正自身的生态系统。它允许不同观点共存，允许试错和纠偏，允许在新的现实面前重新审视旧的规则。

对于民主制度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传统民主理论往往强调规则和程序的重要性，并相信正确程序能够导向合理结果。然而在算法时代，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规则本身也会被学习、被利用、被优化，直至偏离最初目的。因此，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不仅需要规则，还需要反思规则的能力；不仅需要程序，还需要修正程序的机制；不仅需要稳定性，还需要持续演化的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带给民主研究的最大启示，或许不是如何设计更完美的制度，而是如何建构更具韧性的制度；不是如何寻找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如何维持持续学习的能力；不是如何实现最终优化，而是如何避免陷入危险的过拟合。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于谁能在一场博弈中战胜谁，而在于系统是否仍然保留着判断、修正和重新理解自身的能力。如果所有竞争最终都演变为不可预测性之间的相互消耗，那么主导未来的将不再是理性，而是失控的偶然性。

相反，如果我们能够从算法的镜子中学会谦逊，承认知识的有限性和世界的复杂性，并据此建立更具韧性、更能学习、更善于修正的制度与文化，那么不确定性便不必成为威胁，而能够成为更新和成长的动力。

也许，这才是理性在人工智能时代最值得追求的形态：不是征服不确定性，而是在不确定性中保持学习；不是追求永恒正确，而是保持持续修正的能力；不是赢得某一次博弈，而是让共同体始终保有继续博弈、继续学习、继续进化的可能。

注释

- 1 关于“对抗样本”概念，参见古德费洛、施伦斯、塞格迪：《解释并利用对抗样本》[Goodfellow, I. J., Shlens, J., & Szegedy, C. (2015). Explaining and harnessing adversarial exampl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ICLR).]
- 2 关于“过拟合”概念，参见：杰曼、比嫩施托克、杜萨：《神经网络与偏差 / 方差困境》[Geman, S., Bienenstock, E., & Doursat, R. (1992). *Neural networks and the bias/variance dilemma*. *Neural Computation*, 4(1), 1–58. <https://doi.org/10.1162/neco.1992.4.1.1>]; 斯里瓦斯塔瓦、辛顿、克里热夫斯基、苏茨克维尔、萨拉赫丁诺夫：《Dropout：一种防止神经网络过拟合的简单方法》(Srivastava, N., Hinton, G., Krizhevsky, A., Sutskever, I., & Salakhutdinov, R. (2014). Dropout: A simple way to prevent neural networks from overfitting.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15, 1929–1958.)
- 3 参见马德里、马克洛夫、施密特、齐普拉斯、弗拉杜：《面向抗对抗攻击的深度学习方法》[Madry, A., Makelov, A., Schmidt, L., Tsipras, D., & Vladu, A. (2018). Towards Deep Learning Models Resistant to Adversarial Attack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ICLR).]
- 4 威尔·奈特：《人工智能核心的黑暗秘密》[Will Knight (2017). The Dark Secret at the Heart of AI. *MIT Technology Review*.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17/04/11/5113/the-dark-secret-at-the-heart-of-ai/>]
- 5 参见艾萨克、汉娜：《用户数据隐私：脸书、剑桥分析公司与隐私保护》[Isaak, J., & Hanna, M. J. (2018). User Data Privacy: Facebook, Cambridge Analytica, and Privacy Protection. *Computer*, 51(8), 56–59. <https://doi.org/10.1109/MC.2018.3191268>]; 事件之披露另见卡德瓦拉德、格雷厄姆 - 哈里森：《揭秘：五千万脸书用户资料被收集用于剑桥分析》[Cadwalladr, C., & Graham-Harrison, E. (2018, March 17). Revealed: 50 million Facebook profiles harvested for Cambridge Analytica in major data breach.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r/17/cambridge-analytica-facebook-influence-us-election>]
- 6 参见塔克、格斯、巴贝拉、瓦卡里、西格尔、萨诺维奇、斯图卡尔、尼汉：《社交媒体、政治极化与政治虚假信息：科学文献综述》[Tucker, J. A., Guess, A., Barberá, P., Vaccari, C., Siegel, A., Sanovich, S., Stukal, D., & Nyhan, B. (2018). Social Media,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Political Disinformation: A Review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Research Program,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 7 参见杜贝：《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信息行动》[Dube, R. (2021). Understa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information operations. arXiv. <https://doi.org/10.48550/arXiv.2107.05602>]; 余宗基 (Ming-Te Chris Yu)、何嘉耀

- (Ho, K.): 《新冠疫情与台湾的认知战》[Yu, M. T.-C., & Ho, K. (2023). COVID and cognitive warfare in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58(2), 249–273. <https://doi.org/10.1177/00219096221137665>]
- 8 参见沃尔珀特、麦克里迪:《最优化中的没有免费午餐定理》[Wolpert, D. H., & Macready, W. G. (1997). No Free Lunch Theorems for Optimiz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1(1), 67–82. <https://doi.org/10.1109/4235.585893>]; 其监督学习版本另见沃尔珀特:《学习算法之间并无先验差异》[Wolpert, D. H. (1996). The Lack of A Priori Distinctions Between Learning Algorithms. *Neural Computation*, 8(7), 1341–1390.]
- 9 “退出选项”(exit)出自阿尔伯特·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Hirschman, A.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0 “预言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 prophecy)概念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提出,参见罗伯特·默顿:《自我实现的预言》[Merton, R. K. (1948).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The Antioch Review*, 8(2), 193–210.]
- 11 “黑天鹅”概念出自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Taleb, N. N. (2007). *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Random House.]
- 12 关于国际治理中的“软法”(soft law),参见阿博特、斯奈达尔:《国际治理中的硬法与软法》[Abbott, K. W., & Snidal, D. (2000). 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3), 421–456.]
- 13 分别参见(分布外检测)亨德里克斯、金佩尔:《检测误分类与分布外样本的基线方法》;[Hendrycks, D., & Gimpel, K. (2017). A Baseline for Detecting Misclassified and Out-of-Distribution Examples in Neural Network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ICLR)]; (不确定性估计)加尔、加赫拉马尼:《作为贝叶斯近似的Dropout:在深度学习中表征模型不确定性》[Gal, Y., & Ghahramani, Z. (2016). Dropout as a Bayesian Approximation: Representing Model Uncertainty in Deep Learn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ICML)]; (元学习)芬恩、阿比尔、莱文:《模型无关的元学习:面向深度网络的快速适应》[Finn, C., Abbeel, P., & Levine, S. (2017). Model-Agnostic Meta-Learning for Fast Adaptation of Deep Network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ICML)]

苏珊·斯托克斯
言晓义 译

苏珊·斯托克斯 (Susan Stokes) 是芝加哥大学蒂芙尼和玛格丽特·布莱克杰出服务教授 (Tiffany and Margaret Blake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并担任芝加哥民主研究中心 (Chicago Center on Democracy) 主任。她最新的著作是《倒退者：为什么领导人会破坏他们自己的民主》 (The Backsliders: Why Leaders Undermine Their Own Democracies) (2025)

译者言晓义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获台湾梁实秋文学翻译奖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3期
2026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为什么民选 领导人颠覆 民主

编按：过去20多年表明，当代民主面临的主要威胁已不再是军事政变，而是由民选官员主导的民主侵蚀。苏珊·斯托克斯（Susan Stokes）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民选领导人得以侵蚀民主的原因以及可以采取什么行动阻止、逆转这一趋势。她的研究显示，经济全球化、政党体系重组，尤其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为发达民主国家中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以及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左翼民粹主义者提供了崛起的机会。她认为，要抵制民主衰退，需要反对派政治精英、公民社会组织、司法机构以及选民之间的协调行动与共同努力。本文2026年4月首发于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7, Number 2, April 2026, pp. 49-64）。

军事政变不再是世界上民主不稳定的主要来源。进入21世纪后，由民选领导人推动的民主侵蚀已构成对民主的首要挑战。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有20多个国家的总统和总理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上台执政，随后却开始着手破坏他们国家的公共机构。这些领导人威胁和审查新闻媒体，安插效忠于自己的法官，解雇专业的公务员，将独立机构武器化，使其沦为行政权力的工具，骚扰非营利组织，并将自身的权威强加于大学。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研究者们对所谓的民主侵蚀（democratic erosion）或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进行了深度描述，并指出了促成这一现象的诸多因素。¹

但他们尚未充分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在当前的历史

时刻出现民主侵蚀激增？又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大风险？还有另外两个同样关键的问题值得一提：为什么选民会容忍那些攻击公共机构的领导人？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遏制这一进程？²

民主倒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后期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在当今的发达民主国家中，这些数十年前开始的变化为新的右翼族裔民族主义政党（ethnonationalist）创造了机会；这些政党在许多国家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选民。在一些国家，这些政党加入了执政联盟，其领导人成为总统或总理。而一旦掌权，其中一些人就颠覆本国的民主制度。

另一种导致民主倒退的意识形态类型，是左翼民粹主义者（left-populist）。我们已经看到，这类人物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中获得了权力。左翼民粹主义者的攻击目标并非族裔上的“他者”，而是富人。但与富裕民主国家中相对应的右翼一样，左翼民粹主义倒退型领导人同样试图拆毁那些限制行政权力扩张的既有制度。

要解释右翼民族主义的崛起，有必要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在那个时期，政党竞争主要围绕中左翼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右翼保守主义政党展开——例如英国的工党与保守党、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以及欧洲大陆上的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左翼政党与工业工人阶级以及工会组织有着紧密联系，而右翼政党则同高收入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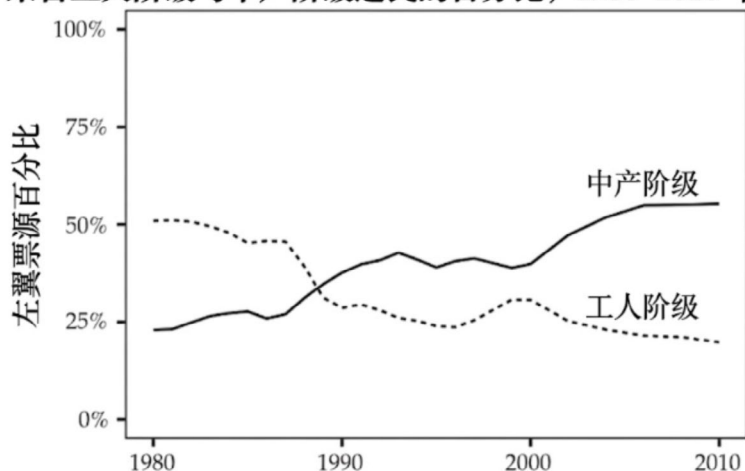
民和商界保持联系。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工人数量的缩减以及劳工运动的衰落，促使左翼政党开始将自身的吸引力扩展到工人阶级之外。它们将注意力转向受过大学教育、具有社会自由主义倾向的城市选民；并非巧合的是，也正是这些专业人士后来填补了议会席位，并占据了其他政党领导岗位。³

尽管中左翼政党在社会福利支出与社会保障方面，依然比其保守主义竞争对手投入更多，但它“亲工人阶级”的形象却开始变得模糊。在20世纪90年代，中左翼政党与保守派在支持经济全球化这一点上逐渐趋同——即减少跨国贸易、资本与人员流动的壁垒。美国的“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s）、英国的“新工党”（New Labour），以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Third Way）路线，都拥抱了经济全球化。

这种转变重塑了中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正如图1所显示的那样，到1990年时，欧洲左翼政党的支持者中，中产阶级选民所占比例已经超过工人阶级或低收入选民。与此同时，保守主义政党则保留了其历史性的政策承诺；实际上，在一些显著案例中，它们甚至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反国家、反监管立场，这一点可以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名言得到体现：“英语中最可怕的九个字是：‘我是政府派来的，我是来帮忙的。’”⁴

图 1——欧洲左翼政党支持中
来自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选民的百分比，1980–2010 年



来源：杰恩·金里奇和西尔雅·豪瑟曼，《工人阶级选票的减少、福利支持联盟的重组及其对福利国家的影响》（Jane Gingrich and Silja Häusermann, “The Decline of the Working-Class Vote,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Welfare Support Coalition and Consequences for the Welfare Stat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5, no.1, 2015: 5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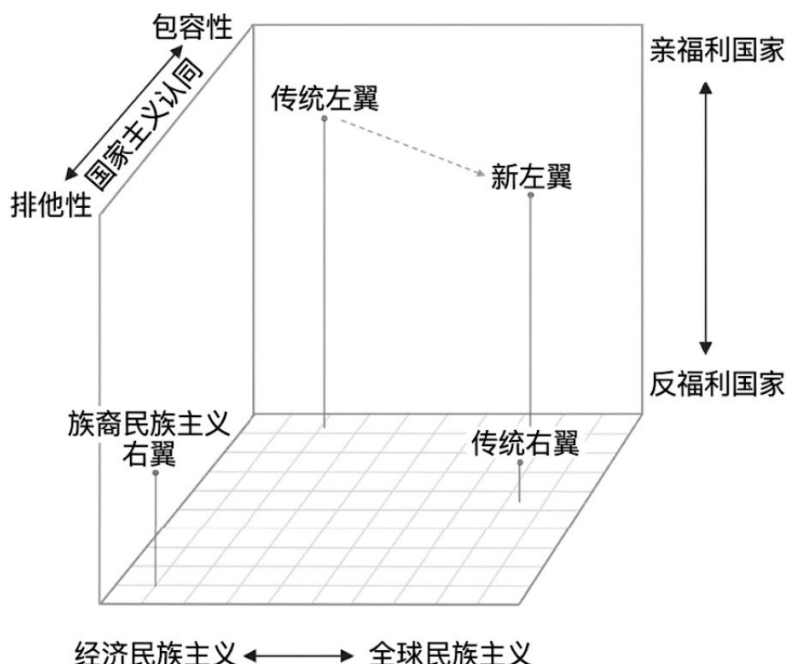
注：该图表报告的是两年滚动平均值。

这些经济发展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使发达民主国家中的大量低收入选民在既有政党体系中相对失去了依托。因此，一批政治创业者（political entrepreneurs）得以获得发展空间，他们开始为全球化引起的不满发声。新的政党开始表达选民那种“被抛在后面”的感受——在这样的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收入不断飙升，而其他

群体的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正是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及其党内派系崛起的背景。他们的领导人对经济充满牢骚，在许多情况下，还比传统右翼更支持慷慨的社会福利政策。⁵与此同时，在这些高度不平等且对全球开放的经济体中，右翼民族主义者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确立了一种鲜明立场——一种排他性的、反多元主义的立场。

图2从三个维度展示了这些转变：政党在福利国家规模、经济开放度以及国家认同上的立场。20世纪后期传统政党立场的变化，促使右翼民族主义者采取了更支持社会福利、更具经济民族主义色彩以及更排他的政治立场。

图 2——发达民主国家政党立场的三个维度



而传统左翼政党与新左翼政党依然较为多元主义，并更能接受不同身份认同；右翼民族主义者则会界定出一个“他者”，并将其妖魔化、塑造成国家的威胁。这个“他者”在不同国家各不相同：它可能是非基督徒或非印度教徒、穆斯林或犹太人、非洲裔群体、库尔德人（Kurds），或 LGBTQ+ 群体；甚至也可能是那些被认为不够虔诚的本国公民（如土耳其），或者被领导人贴上“共产党人”标签的人（如巴西与菲律宾），又或者被描绘成“低等罪犯”的（如萨尔瓦多人）；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他者”还包括移民。

并非所有右翼民族主义者都能够赢得选举。即使他们获胜，也并非总是瓦解本国的民主制度。但他们要突破既有政党体系，还蔑视所谓“精英主义”制度，这种倾向使得他们更可能图谋破坏民主。⁶至于左翼民粹主义者，他们则把富人以及国际资本视为敌人。在执政期间，许多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会推出旨在减少不平等、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条件的政策。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采用倒退型领导人的玩法：改写宪法以扩大行政权力、骚扰新闻媒体、削弱司法独立，以及弱化选举作为问责机制的功能。

并非所有拉美左翼领导人都是民粹主义的制度破坏者。在智利和巴西，一连多位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总统在不破坏制度的前提下，制定了改善贫困人口生活与发展前景的政策。但玻利维亚与厄瓜多尔的左翼民粹主义者则修改了宪法，扩大了行政权力，并削弱了法院与立法机构。在墨西哥，总统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Manuel López Obrador，2018—2024年在任）提高了最低工资、增加了养老金，同时也削弱了独立司法体系，还使国家选举机构更容易受到政

党影响。而委内瑞拉与尼加拉瓜的左翼领导人则主导了对基本民主支柱的破坏，包括剥夺反对派组织与参与公平选举竞争的权利。如今，这两个国家都已经完全走上了威权主义。

经济不平等与民主的倒退

尽管导致民主倒退的领导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异质性，但让他们得以上台的国家却有一个共同特征：这些国家往往存在高度的经济不平等。我与伊莱·劳欧（Eli Rau）做的跨国统计分析表明，不平等是增加民主侵蚀风险最强大、最有力的结构性特征。⁷ 与人均收入、国家治理能力或民主制度的存续年限相比，不平等对于风险程度差异的解释力更强、也更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以人均收入衡量）在民主倒退中的作用较小，而且这一作用的测量结果也不那么一致。至于国家治理能力以及民主制度的不间断存续时间，它们的作用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

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更容易面临民主侵蚀，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民主倒退在21世纪初开始加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民主侵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但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加剧了那些将在21世纪推动民主倒退的种种紧张关系（tensions）。正如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言，全球化可预见地扩大了贫富差距与社会紧张。⁸ 在富裕国家中，全球化加速了制造业外流，加之移民劳动力涌入，结果加深了“身份裂痕”，还促成了“右翼民粹主义”（也就是我所说的右翼族裔民族主义），外国人和少数族裔群体成了攻击目标。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带来了外国产品与外国投资的大量流入，

用罗德里克的话说，这加剧了“收入裂痕”，还助长了左翼民粹主义以及对富豪和大型企业的攻击。

在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国家，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更容易被社会所吸收。在社会冲突较为缓和的地方，民主倒退的趋势也同样缓和。事实上，那些相对平等的国家，例如北欧民主国家，其民主风险较低。⁹ 瑞典便是这种相互作用（dynamics）的一个典型例证。在2010年代，瑞典出现了一个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其主要政治主张是反移民。但尽管该党在选举中取得成功并对政策产生影响，瑞典的民主制度却没有显示出任何遭到侵蚀的迹象。在瑞典，没有政治人物质疑选举的公正性，也没有人试图控制媒体或削弱司法独立。¹⁰

军事政变过去作为民主主要威胁时期所建立的民主崩溃统计模型，未能预测到美国已经持续了15年的民主衰退。¹¹ 按照旧模型的观点，像美国这样富裕而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¹² 但如果我们研究的不是政变，而是民主倒退的成因，那么美国在21世纪初发生民主侵蚀的概率就会显著上升。¹³ 政变与民主倒退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dynamics），并由不同的行为者实施。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中，都有充分理由将二者视为不同的结果，并将其作为不同的因变量来处理。

要研究与民主侵蚀相关的因素，我们需要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能够将其与行政长官较为传统的秀肌肉行为（muscle-flexing）区分开来的方法。政治学家梅利斯·莱本斯（Melis Laebens）开创了这样一

种有用的研究办法。它借鉴了强调“问责制”是民主核心的民主理论¹⁴——包括“横向问责”，即总统与总理受到法院、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以及监督组织制约；也包括“纵向问责”，即领导人受到选民制约（以及受到媒体制约，因为媒体向公众披露政府行为）。当一国的专家认为横向问责与纵向问责都在短时间内出现显著下降时，莱本斯便将该国编码为发生了民主侵蚀。

劳欧与我遵循了莱本斯的研究办法，对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与总理进行了编码，主要根据他们是否、以及何时开始侵蚀本国民主制度。然后，我们将民主侵蚀发生的年份与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指标（例如基尼系数，Gini index）以及其他因素（包括人均收入与民主制度的持续时间）进行匹配分析。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收入不平等最终显现为民主侵蚀中一个强劲和显著的因素。

我的著作《倒退者》（*The Backsliders*, 2025）探讨了收入不平等与民主侵蚀之间的联系。其中若干联系是相对直接的。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人口中相当大的部分往往感到不满，因为社会变得更加富裕的过程中，他们被甩在了后面。即使并不清楚自己在同侪中的具体排名，低收入者在高度不平等的体系中也常常会遭受实际损害。当住房等关键市场迎合富裕群体时，生活成本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便会变得难以承受。因此，不平等以及它所催生的被剥夺感，会促使贫困群体拥抱非自由派政党（illiberal parties）。这些政党鼓励一种观念：精英制度、非本国公民以及那些在文化上与他们不同的群体，正是导致相对贫困者被边缘化的原因。收入高度不平等对民主的威胁性影响也波及富人。60多年前，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便曾推测，在收入高度两极化的社会中，富人倾向于把赤贫

者视为“低等人”，部分原因在于：面对他人的匮乏，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心理机制来为自己的财富辩护。¹⁵

不平等还会削弱人们对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信心。一项2022年的研究记录了美国人在过去50年间对各类机构信任度下降。这些机构包括国会、总统以及（较近期的）最高法院，也包括银行与华尔街、公立学校、高等教育机构、新闻媒体以及宗教机构。¹⁶ 该项研究的作者指出，美国多个制度层面出现的这种信任侵蚀，与“50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相对应。¹⁷

除了不满与不信任之外，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还容易出现党派极化（partisan polarization）。¹⁸ 部分原因在于：当群体利益差异如此巨大时，谁掌握权力便显得格外重要。潜在的独裁者会从政治极化中获益，这会激励这类领导人进一步加剧极化。一个高度极化的选民群体，即便总体上支持民主制度，也会对总统或总理攻击公共制度的行为表现出更高的容忍度。¹⁹ 一个人或许会这样想：我未必喜欢他攻击新闻媒体或法院，但上帝保佑，绝不能让对立阵营掌权。

在《民主侵蚀始于顶层》（*Democracy Erodes from the Top*, 2023）一书中，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指出，欧洲国家出现民主侵蚀并不是因为公众舆论转向反对民主；相反，反民主的心态其实是精英政治话语的产物。²⁰ 类似地，我也研究了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20年间所有民主国家中的极化水平，并以专家调查的数据作为衡量依据。在这里，研究结果再次表明，推动党派对立加剧的主要力量是政治领导人，尤其是那些破坏本国民主制度的领导人。

1995年时，那些后来会发生民主侵蚀的国家，与那些不会发生民主侵蚀的国家，在“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的平均水平上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差异。但到了2020年，发生民主倒退的国家已经表现出显著更高层次的党派极化。²¹因此，不平等为野心勃勃且渴望扩大自身权力的行政首脑创造了机会——他们可能利用选民在经济上“被甩在后面”的感受，以及他们对制度失去信心的情绪，还经常把民众的困境归咎于移民或少数群体，声称这些人“偷走”了工作机会以及垄断了福利资源。

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党派极化会助长民主倒退。²²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民主倒退者在高度极化的环境中更容易壮大，因此他们会努力进一步加深极化，并向政治竞争对手发出充满仇恨的指控。例如，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2019—2023年在任）经常将其工人党（Workers’ Party）对手称为“共产党人”，并且曾经哀叹道：

“选举根本无法改变这个国家。遗憾的是，只有等到这里爆发内战的时候，一切才会改变；而且我们还必须完成军政府当年没有完成的事情：杀掉3万人。如果有一些无辜的人死去，也没关系。任何战争中都会有无辜者死亡。哪怕我自己死了，只要能有3万人陪葬，也就足矣。”²³

极化与“说民主坏话”

然而，极化策略并非毫无风险。当一位总统把主要反对党及其支持者称作“怪物”时，他的支持者或许会真的相信这些说辞，并因此更加

蔑视对立阵营；但这个国家其余的人会作何感想？尤其是那些被贴上“怪物”标签的人？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些人同样会被总统的言辞所动员——也就是说，被动员起来反对他。原本可能不会投票的反对派支持者，现在却拥有了强烈动机前往投票站，投票反对总统及其所属政党。甚至一些倾向反对派的独立选民，也可能因此被动员起来，反对这位正在推动民主倒退的领导人。

为了规避这种因极化言论和行动而引发反弹的风险，潜在的独裁者还拥有另一种工具。他们可以试图说服选民，让他们相信本国的机构早已空洞、腐败而无能，因此，即便领导人削弱这些机构，也不会损失什么。我将这种策略称为“说民主坏话”（trash-talking democracy），意思并不是贬低民主作为一种政体本身，而是贬低那些民主倒退者所瞄准的具体机构。回想一下，极化言论实际上是在说：“别担心我对机构的攻击，真正的威胁是对立阵营的胜出。”而“说民主坏话”则是在说：“别担心我对机构的攻击——这些机构腐败无能，不值得捍卫；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机构拆掉再重建，情况反倒好了。”而所谓“重建”，最终将使这些机构更加处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

文本定量分析技术取得的进步，使研究政治人物话语成为可能。借助这些技术，研究者不仅能够在大规模文本中识别不同类型的话语模式，而且更关键的是，还能够辨别这些言论的语气——例如，区分一位总统针对新闻媒体或选举机构所发表的是贬低性言论还是赞扬性言论。一项2025年的研究运用了这些技术，结果发现，在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担任总统期间，他花费在“说机构坏话”上的时间，比批评反对党所花的时间还要更多。²⁴ 在《倒退者》一

书中，我将这一分析扩展到委内瑞拉那位摧毁民主的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1999—2013年在任）。与性格严肃阴郁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不同，查韦斯是一个“快活的斗士”；但当他的言论转向阴暗时，其攻击目标往往主要是各种机构，而不是反对派领导人或政党。

当领导人贬低本国机构时，他们的话语会影响公民的看法吗？我在拉丁美洲、土耳其以及美国获得的证据表明，“说坏话”确实会削弱公众对机构的信任；并且，正如我预测的那样，它在产生这种效果的同时，并不会激起反对派选民强烈反弹。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坏话”并不只是“单纯”的修辞。举例而言，在整个总统任期内，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每个工作日都会举行长达数小时的新闻发布会。这种庞大的演讲工程，为他后来攻击墨西哥国家机构预先塑造了公众舆论。当墨西哥最高法院阻止总统对国家选举事务院（National Electoral Institute，简称 INE）进行的政治化努力时——该机构负责监督全国选举——他便将自己的语言攻击炮火转向法院，反复指责相关裁决是由“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作出的。

最终，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与现任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改变了整个联邦司法体系的遴选方式：从2025年起，所有联邦法官都通过普选产生，其中包括墨西哥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同年6月举行的首次司法选举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候选人名单，竞争881个联邦法官职位；在一些州，地方层级法官也同时进行选举。大量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可能是导致投票率极低（13%）的重要原因之一。执政党还分发了标示本党关联候选人的“作弊小抄”，而

这些候选人最终赢得了绝大多数法官席位。这一经历引发了人们对司法机构服从行政部门的广泛担忧。

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倒退型领导人？

倒退型领导人“说民主坏话”时常包含某些真实成分。但这些领导人试图极化社会、摧毁公众对制度信心的目标，也会驱使他们编造纯属幻想的叙事，即许多支持者都会相信的阴谋论。例如，2018年，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曾警告印度选民说，如果国大党（Congress Party）执政，大部分社会福利支出就会被转移给穆斯林。²⁵ 2020年在美国，一位总统顾问声称：“我们的选票是在德国和西班牙统计的，而负责统计的公司归查韦斯和马杜罗的关联方所有。”²⁶ 而在2024年，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则宣称真正赢得大选的是他自己，尽管实际上反对派候选人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人们之所以会相信政治人物这些荒诞不经的说法，原因多种多样，其中许多属于心理或情感层面。许多政治人物都是高明的“业余心理分析师”，他们凭直觉便知道如何激发人们的负面情绪。根据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如果把一种糟糕的处境描述为某些人有意实施、旨在伤害特定个人或类似群体的行为所致，那便会激起人们的义愤。²⁷ 而这些情绪属于“趋近型情绪”（approach emotions）——即一种可以驱使人们走向公共空间、与他人接触并采取行动的情绪——因此对政治人物极具利用价值。最后，老练的政治人物还会与支持者建立情感纽带。人们可能会钦佩、甚至热爱自己的领导人，因此也更容易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困在宣传和阴谋论的世界中无法脱身。批判性思维和教育能够让人对极端误导性的说法产生免疫力。

怎么办？

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而民主倒退这场戏仍在继续展开。因此，我们对迄今为止从这些经历中能吸取的教训应当保持谨慎——无论是关于如何在倒退型领导人掌权时减缓侵蚀、如何通过亲民主力量在任期内替换这些领导人，还是如何在倒退型领导人下台后修复民主侵蚀所造成的损害。

在考虑各种应对方案时，我们应当牢记民主倒退国家的模糊性质：它们虽然部分走向了威权主义，但仍然保留着部分民主特征。只要那些原本用于制衡行政权力的制度仍有一部分保持有效，亲民主力量就能够利用这些制度来阻挡民主的倒退者。在国家立法机构中，亲民主的少数派政党即便无法完全阻止政府削弱或摧毁制度，也至少能够拖慢这一进程。州与地方政府中的少数派领导人，也能够自身辖区内采取行动，以阻挡威权主义指令。法院仍然可能作出不利于政府的裁决，从而重新确认法治原则，并保护其他机构不受行政权力侵蚀。即便在司法独立已经遭到严重削弱的体制中，法院仍有可能作出反对行政部门的判决，并帮助保护亲民主政治人物与活动人士，使他们免受行政权力的打压。与此同时，公民社会仍可以发动抗议、向公众传播信息，并对行政部门提起法律行动；媒体机构也仍能够继续报道政府的不当行为。

民主倒退的国家仍然会举行选举，一些推动民主倒退的领导人尽管

拥有在任所带来的优势，最终仍被选民赶下台（例如2021年的赞比亚、2022年的巴西以及2023年的波兰）。还有一些人则碍于任期限制而离任（例如2017年的厄瓜多尔与2024年的墨西哥）。另一些则被其所属政党所罢免（例如2018年的南非）。更少的情况是，一些推动民主倒退的总统被民众起义推翻（例如2014年的乌克兰）。因此，选民——无论是通过选举直接发挥作用，还是通过向政党施压而间接发挥作用——都扮演着关键角色。

潜在的独裁者希望自己看起来锐不可当，但事实上，他们存在一些可预测的弱点。他们的政治计划是要打破限制自身的制度结构，并颠覆“照常运作的政治”。因此，这类领导人往往会让忠诚度高于能力的人围绕在自己的身边。例如，在描述博索纳罗时，一组巴西政治学家团队指出，他“亲手挑选了那些从未担任政治职务或未曾当选过公职、完全没有公共行政或政策经验的人”，从而造就了“一个由右翼极端主义业余人士组成的政府”。²⁸ 缺乏从政经验的效忠者不太可能阻止总统的昏庸决策。但亲民主人士与团体——包括精英、公民社会以及普通公民——不能坐等倒退的领导人犯错。

精英政治战略家（elite political strategists）：这一群体包括亲民主政党的领导人、竞选战略家与传播专家，以及相关政策专家。无论是在全球南方国家还是富裕国家，收入不平等都会增加民主制度破裂的可能性。亲民主政党与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新与低收入和工人阶级选民建立联系，并采纳有利于贫困者与劳动者的政策立场，以回应他们的需求与愿望——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的可负担性，以及许多在当今经济模式下逐渐脱离普通人承受范围的基本需求。此外，那些希望重新赢回“被甩在后面”的选民的政党，也必须改变它们自身的组成

与形象，不应只把律师、医生与企业领袖送入议会，也应让工会成员、餐厅服务员以及教师进入其中。

在民主倒退由左翼民粹主义者主导的地方，亲民主力量则必须让选民相信，更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与更公平的机会，同样能够在民主制度中实现。民主与社会正义、包容性经济之间，并不存在彼长此消的必然取舍关系。事实上，民主国家通常拥有更快的经济增长，人民也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而且——几乎从定义上说——他们的基本权利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免受国家权力任意搜查、拘押与法外伤害的权利。²⁹

除了政策与战略层面的行动之外，亲民主的政治精英还可以怎样对抗或减缓民主倒退？一种选择是利用现有的制度渠道。例如，在 21 世纪初的哥伦比亚，反对派立法者利用议会程序阻碍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政府提出的反民主改革。尽管这些反民主改革措施最终仍获得通过，但反对派还是成功拖慢了总统推动民主倒退的议程。反对派的这种“刹车”行动，为法院与公民社会组织作出反应争取了时间。³⁰ 由反对派控制的地方政府，也能够对国家层面的民主倒退起到制衡作用，例如巴西博索纳罗政府时期，以及美国总统川普两届任内所发生的情况。

一旦亲民主力量自己掌权，它们就会面临一种策略上的困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模仿此前民主倒退者所采取的破坏规范与规则的行为。例如，如果潜在独裁者曾改变高等法院的组成，那么亲民主领导人在获得机会后，是否也应该这样做？即使严格来说并未违反规则，亲民主力量是否应该积极行动、重新夺回失去的权

力，以便追究民主倒退者的责任？

在这场争论中，“反对”的一方认为：如果每一方都利用自己执政时期不断升级冲突、进一步贬损制度，那么遵守规范的行为将永远无法重新确立。此外，如果民主倒退者之所以得势，是因为民众认为制度腐败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党派性，那么激进策略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看法。

而“支持”的一方则认为：如果不采取激进策略，民主本身可能会彻底丧失。法院可能会不可逆转地落入行政部门或执政党的掌控；选举制度也可能遭到破坏，以至于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再准确反映选民意愿。按照这种观点，亲民主力量不应放弃制度性的“硬球”（harball，这里指“强硬手段”），也不应单方面“解除武装”；相反，他们必须以毒攻毒。³¹

对于这一困境，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错误的答案。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伴随着必须谨慎权衡的代价。如果民主本身即将丧失，那么拒绝采取强硬策略几乎毫无意义。但如果民主并未真正面临生死存亡，那么使用强硬手段则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印证民主倒退者的说法：所谓“精英”制度与过时规则，不过是帮助一方压制另一方的工具。

公民社会：这一群体包括非政府组织、专业协会、私营企业、媒体机构以及大学等。尽管这些组织名义上属于“非政治性实体”，但由于它们可能阻碍潜在独裁者的目标，因此始终处于这类领导人的视线之中。例如，独立媒体会报道官方腐败、违法行为与无能表现；公民社会组织同样会监督政府行为，并组织示威活动；大学学者则会教导

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开展有时会反驳政府叙事的研究与分析。

因此，民主倒退的政府经常会采取严厉措施压制那些被视为威胁的群体：剥夺媒体机构的资源——从报纸、广播许可证，到接触政府官员的渠道——甚至以暴力对付记者；宣布公民社会组织非法并加以关闭；让政府内部人士控制大学领导层，削减大学预算，限制或拒绝学者获得研究资金。然而，即便面临这一系列惩罚，公民社会仍会进行抵抗。民主侵蚀从来不会在毫无挑战的情况下发生；它总会在公民社会中激起愤怒。记者会敦促媒体所有者抵制审查制度；教授与学生会要求大学管理层捍卫学术自由；公民社会会组织并教育民众，为民主挺身而出；律师则会谴责那些为了反民主议程而违反职业伦理的政府同行。

抵抗一个不断扩张权力的行政部门所施加的反民主干预，代价可能极其高昂；由于政府拥有强大的报复能力与资源，风险极大。媒体机构可能失去资源——从新闻报纸、广播许可证，到接触其必须监督报道的政府官员渠道。记者有时还会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公民社会组织可能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并遭关闭；大学领导层可能被政府内部人士接管，其预算与研究资金渠道也会被削减。但即便代价如此高昂，公民社会中的一些群体仍然会坚持抵抗。记者坚持准确报道事实；律师拒绝代表政府从事“法律战”（lawfare）；活动人士则设法继续组织行动。这种来自公民的压力，有时会迫使倒退者放慢脚步，甚至改变方向。

当民主遭到攻击时，法治总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因此，律师、法官以及律师协会往往会被卷入这场斗争——有时充当政府的“步兵”，

但更多时候则发挥关键作用减缓甚至阻止本国民主侵蚀。即便在民主已经严重退化的国家中，法院仍可能减缓权力扩张型行政领导人的掠夺行为。以土耳其为例。如今，它通常被视为“选举式威权政体”甚至完全威权政体。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及其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严重削弱了司法部门的独立性。总统曾借助法院之力监禁反对派政治领袖与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在一批学者签署公开信、呼吁和平解决库尔德冲突之后，埃尔多安发起了一场旨在将大学纳入其控制之下的行动。然而，土耳其法院拒绝赋予总统任命大学校长与解雇教授的权力，至少为学术界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³²

最后，一些专业协会——例如新闻俱乐部与律师协会——有时也会对违反职业伦理与专业规范帮行政部门攫取权力的成员进行纪律处分。这种措施能够有效激励专业人士避免从事破坏民主制度的行为。不过，在高度极化的环境下，就连律师协会本身也可能成为政府攻击的对象。例如，在2025年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便因两名记者死亡事件争议，下令撤换整个伊斯坦布尔律师协会理事会。³³

选民与抗议者：在什么条件下，一个倒退的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支持率会下降？当公民认为这些领导人过于腐败或过于自利，并且意识到失去法治、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的代价过于高昂时，他们就可能转而反对民主倒退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选民会开始把票投给反对派，并参加各种规模的示威活动，以表达对潜在独裁者的不满，从而鼓励政治精英更大胆地捍卫民主。

即使对许多选民而言，民主权利与制度的价值较为抽象，他们仍可

能因为一些常规原因而转而反对倒退的民主领导人，例如经济低迷、工资停滞与高通胀。这种政治行为被称为“回顾性经济投票”

(retrospective economic voting)，它既可能击败倒退型领导人，也可能击败坚定的民主派。但同样，威权主义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存在一些可预测的弱点，而这些弱点会导致他们犯错，从而削弱公众支持。

2022年，当巴西选民否决博索纳罗时，他发动了一系列有时带有暴力性质的行动，试图继续掌权。然而，国家的制度最终还是幸存了下来。巴西军方并未支持博索纳罗推翻败选结果的企图，而这位70岁的失势前总统后来还因策划政变未遂而被定罪。如今，他正在服刑27年。这样的结果，标志着民主的复兴。

民主倒退并非不可阻挡。精英、公民社会以及普通公民都拥有某些反制手段。反对派立法者、媒体、教授、律师与法官、选民与抗议者——所有这些人人都能够减缓或阻止国家滑向威权主义。要找到正确策略，并在民主权利空间不断收缩之际仍鼓起勇气挺身而出，确实并不容易。但我们必须行使这些权利——因为它们就像肌肉一样，如果长期不用，便终将萎缩。

注释

1 南希·贝尔梅奥，《论民主倒退》(Nancy Bermeo, "On Democratic Backsliding," *Journal of Democracy* 27, January 2016: 5–19)；史蒂文·列维茨基和丹尼尔·齐布拉特，《民主如何死亡》(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Crown Books, 2018)；斯特凡·哈格德和罗伯特·考夫曼，《倒退：当代世界的民主退步》(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 *Backsliding: Democratic Regres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 2 我最近的著作对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参见《倒退者：为什么领导人会破坏他们自己的民主》（*The Backsliders: Why Leaders Undermine Their Own Democrac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5）。
- 3 尼古拉斯·卡恩斯和诺姆·卢普，〈白人工人阶级与 2016 年选举〉（Nicholas Carnes and Noam Lupu,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and the 2016 Elect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9, no. 1, 2021: 55–72）。
- 4 罗纳德里根，〈总统新闻发布会〉（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News Conference*,”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986）。
- 5 拉塞尔·J·道尔顿和卡尔·C·伯宁，〈欧洲的意识形态极化与极右政党〉（Russell J. Dalton and Carl C. Berning,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and Far-Right Parties in Europe,” in *Rechtspopulismus in Deutschland*, ed. Heinz Ulrich Brinkmann and Karl-Heinz Reuband, Wiesbaden: Springer, 2022, 13–35）。
- 6 专家认为，在米莱（Milei）（2023 至今）和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Fernández de Kirchner）（2007–2015）政府时期，阿根廷曾接近民主侵蚀的边缘，但并未达到该状态。参见斯科特·梅因沃林和路易斯·斯基乌梅里尼，〈拉丁美洲公民自由保护与公民的民主承诺〉（Scott Mainwaring and Luis Schiumerini, *Protection of Civil Liberties and Citizens’ Democratic Commitment in Latin Americ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025）。
- 7 伊莱·G·劳欧和苏珊·斯托克斯，〈21 世纪的收入不平等与民主侵蚀〉（Eli G. Rau and Susan Stokes,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22, no. 1, 2025: e2422543121）。
- 8 达尼·罗德里克，〈民粹主义与全球化的经济学〉（Dani Rodrik,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1, nos. 1–2, 2018: 12–33）。
- 9 劳欧和斯托克斯，〈收入不平等与民主侵蚀〉（Rau and Stokes,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
- 10 博·罗斯坦，〈瑞典右翼的阴影〉（Bo Rothstein, “The Shadow of the Swedish Right,” *Journal of Democracy* 34, January 2023: 36–49）。
- 11 萨拉·雷普奇，〈扭转美国民主的衰退〉（Sarah Repucci, “Reversing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2: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Authoritarian Rule*, Washington, D.C.: Freedom House, 2023,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22/global-expansion-authoritarian-rule/reversing-decline-democracy-united-states>）。
- 12 亚当·普热沃斯基，〈民主的危机〉（Adam Przeworski, *Crise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丹尼尔·特雷

- 斯曼,《当前对民主的危险有多大? 基于历史数据的风险评估》(Daniel Treisman, “How Great Is the Current Danger to Democracy? Assessing the Risk with Historical Dat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6, no. 12, 2023: 1924-52)。
- 13 普热沃尔斯基和特雷斯曼的估计接近零; 劳和斯托克斯的估计显示, 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发生民主侵蚀的年度概率约为 9%。
- 14 梅利斯·G·拉埃本斯,《超越民主倒退: 现任领导人的篡权企图, 1989–2019》(Melis G. Laebens, “Beyond Democratic Backsliding: Incumbent Takeover Attempts, 1989–2019,” working paper,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2022)。
- 15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民主的若干社会前提: 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no. 1, 1959: 69–105)。
- 16 亨利·E·布雷迪和托马斯·B·肯特,《50 年来美国机构信任度的下降与极化的加剧》(Henry E. Brady and Thomas B. Kent, “Fifty Years of Declining Confidence and Increasing Polarization in Trust in American Institutions,” *Daedalus* 151, no. 4, 2022: 43–66)。
- 17 见上, 布雷迪和肯特,《50 年来美国机构信任度的下降与极化的加剧》, 57 页。
- 18 约翰·沃海斯、诺兰·麦卡蒂和鲍里斯·肖尔,《不平等的收入、意识形态与政治僵局: 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如何加剧政治极化》(John Voorheis, Nolan McCarty, and Boris Shor, “Unequal Incomes, Ideology and Gridlock: How Rising Inequality Increase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5, <https://dx.doi.org/10.2139/ssrn.2649215>)。
- 19 米兰·W·斯沃利克,《极化与民主》(Milan W. Svoblik, “Polarization versus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30, July 2019: 20–32)。
- 20 拉里·巴特尔斯,《民主侵蚀始于顶层: 欧洲的领导人、公民与民粹主义挑战》(Larry Bartels, *Democracy Erodes from the Top: Leaders, Citizens, and the Challenge of Populism i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 21 斯托克斯,《倒退者》, 129 页。
- 22 例如, 参见斯沃利克,《极化与民主》; 马修·H·格雷厄姆和米兰·W·斯沃利克,《美国的民主? 党派性、极化与对民主支持的稳健性》(Matthew H. Graham and Milan W. Svoblik, “Democracy in America? Partisanship, Polarization, and the Robustness of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4, no. 2, 2020: 392–409); 穆拉特·索默、詹妮弗·L·麦科伊和罗素·E·卢克,《有

- 害极化、威权化与反对派策略》(Murat Somer, Jennifer L. McCoy, and Russell E. Luke, “Pernicious Polarization, Autocratization and Opposition Strategies,” *Democratization* 28, no. 5, 2021: 929–48)。
- 23 博索纳罗 2018 年 1 月 10 日的演讲, 引自玛丽安娜·西蒙斯, 《巴西极化新总统贾伊尔·博索纳罗的自述》(Mariana Simões, “Brazil’s Polarizing New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 in His Own Words,” *New York Times*, 28 October 2018)。
- 24 劳塔罗·塞利亚、伊佩克·奇纳尔、苏珊·斯托克斯和安德烈斯·乌里韦, 《通过说民主坏话建立对倒退的容忍: 来自墨西哥的理论 with 证据》(Lautaro Cella, Ipek Çinar, Susan Stokes, and Andres Uribe, “Building Tolerance for Backsliding by Trash-Talking Democracy: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Mexico,”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First View, 2025, <https://doi.org/10.1177/00104140251328024>)。
- 25 莫迪在 2024 年全国选举竞选中发表了这些言论; 参见人权观察, 《印度: 仇恨言论助长了莫迪的选举竞选》(Human Rights Watch, “India: Hate Speech Fueled Modi’s Election Campaign,” 14 August 2024, <https://www.hrw.org/news/2024/08/14/india-hate-speech-fueled-modis-election-campaign>)。
- 26 鲁迪·朱利安尼在 2020 年 11 月 19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完整记录参见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s/rudy-giuliani-trump-campaign-press-conference-transcript-november-19-election-fraud-claims>。
- 27 泰德·布雷德和乔治·E·马库斯, 《情绪与政治心理学》(Ted Brader and George E. Marcus, “Emotion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Leonie Huddy, David O. Sears, and Jack S. Lev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65–204)。
- 28 费尔南多·利蒙吉等, 《政府与国会》(Fernando Limongi et al., “Government and Congress,” *Ibero-Online* 14, 2022)。
- 29 达龙·阿西莫格鲁等, 《民主确实促进增长》(Daron Acemoglu et al., “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 no. 1, 2019: 47–100); 达尼·罗德里克, 《民粹主义与全球化的经济学》(Dani Rodrik,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1, nos. 1–2, 2018: 12–33); 奥拉因卡·奥耶科拉, 《生活可能不公平, 但民主会让它少一些负担吗?》(Oláyínká Oyèkọ́lá, “Life May Be Unfair, but Do Democracies Make It Any Less Burdensom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2, no. 3, 2023: 577–602)。
- 30 劳拉·甘博亚, 《反对派如何反击》(Laura Gamboa, “How Oppositions Fight Back,” *Journal of Democracy* 34, July 2023: 90–104)。
- 31 马克·图什内特, 《宪法硬球》(Mark Tushnet, “Constitutional Hardball,”

John Marshall Law Review 37, no. 2, 2004: 523–554); 格雷琴·赫尔姆克、玛丽·克罗格和杰克·佩恩,《通过威慑实现民主:规范、宪法与选举倾斜》(Gretchen Helmke, Mary Kroeger, and Jack Paine, “Democracy by Deterrence: Norms, Constitutions, and Electoral Tilt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6, no. 2, 2022: 434–50)。

32 土耳其科学学院协会,《学术自由报告,2022–2024》(The Science Academy Society of Turkey, Academic Freedom Report, 2022–2024, Istanbul: The Science Academy Society of Turkey, 2024, <https://en.bilimakademisi.org/wp-content/uploads/2025/03/academic-freedoms-report-2023-2024.pdf>)。

33 对相关事件的描述参见英国律师协会,《正义面临风险:伊斯坦布尔律师协会领导层被解职引发担忧》(The Law Society, “Justice at Risk: Dismissal of Istanbul’s Bar Leadership Sparks Concern,” press release, 27 March 2025, <https://www.lawsociety.org.uk/contact-or-visi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dismissal-of-istanbuls-bar-leadership-sparks-concern>)。



当今民主

史蒂文·莱维茨基
卢坎·韦文

徐行健 译

史蒂文·莱维茨基 (Steven Levitsky) 是哈佛大学大卫·洛克菲勒拉丁美洲研究讲席教授兼政府学教授。卢坎·韦 (Lucan Way) 是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合著了《竞争性威权主义：冷战后的混合政体》(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2010 年)

译者徐行健系中国大陆专业人士

中国民主季刊

第 4 卷 第 3 期

2026 年 7 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新式竞争性 威权政体

编按：竞争性威权主义是这样一种政体，它具有实质性的民主制度，但同时存在当权者严重滥权；选举有竞争性，但并不公平。这种政体的产生与冷战后国际国内环境相关，目前仍然在不少国家顽强存在，并且发展到了一些有强大民主传统与制度的国家。史蒂文·莱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卢坎·韦（Lucan Way）曾最早提出了“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概念，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这一新的发展趋势。本文 2020 年首先发表于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1, Number 1, January 2020, pp. 51-65），它提到体现这一趋势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匈牙利。虽然欧尔班在 2026 年 4 月的选举中落败下台，但他曾如何扭曲、推翻民主制度仍然值得研究，以作为历史的镜鉴。

近 20 年前，我们在《民主季刊》发表了关于“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兴起”一文。¹ 文章介绍了一种政体类型：在这种政体中，具有实质性的民主制度与当权者的严重滥权并存；选举竞争是真实的，但并不公平。时至今日，竞争性威权主义仍然顽强存在。正如克里斯托弗·卡罗瑟斯（Christopher Carothers）所指出的，在冷战后时期，此类政体的国家相当不稳定。² 一些竞争性威权政体实现了民主化（包括秘鲁、斯洛伐克和台湾），而另一些则固化为完全的威权主义（如白俄罗斯、柬埔寨和俄罗斯）。还有一些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贝宁和乌克兰），则在民主和竞争性威权主义之间来回摇摆。³

我们在 2010 年出版的《竞争性威权主义：冷战后的混合政体》一书中所考察的 35 个竞争性威权政体，在 1990 年至 2019 年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其中 15 个实现了民主化；⁴ 6 个曾实现民主化，但后来又倒退回（通常是竞争性的）威权主义；⁵ 4 个滑向了全面威权主义；⁶

还有 10 个则一直是竞争性威权主义。⁷

尽管竞争性威权主义在一些国家瓦解，它又出现在另外一些国家。如几内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干达等国，其政权从霸权统治放松到竞争性威权主义。而玻利维亚、匈牙利、菲律宾、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则从民主制度退化为竞争性威权主义（委内瑞拉此后已沦为完全威权主义）。⁸ 总体而言，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竞争性威权主义国家的数量一直相对稳定。我们在 1990—1995 年期间统计到 35 个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而在 2019 年，这一数字为 32 个（见下表）。这个数字有些保守，因为我们排除了曾经属于竞争性威权主义而最近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实际上给了亚美尼亚、冈比亚、马来西亚和乌克兰等国家的新政府一个“疑罪从无”（benefit of the doubt）的机会。

表——竞争性威权主义国家，2019 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	
贝宁	莫桑比克
博茨瓦纳	尼日尔
布基纳法索	尼日利亚
科特迪瓦	塞内加尔
加蓬	塞拉利昂
几内亚	坦桑尼亚
几内亚比绍	多哥
肯尼亚	乌干达
马达加斯加	赞比亚
马拉维	津巴布韦
马里	

中东欧

匈牙利

塞尔维亚

黑山

北马其顿

前苏联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

亚洲 / 中东

孟加拉国

土耳其

菲律宾

拉丁美洲

玻利维亚

洪都拉斯

海地

西方自由主义主导地位的衰落

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持久存在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竞争性威权主义是冷战后才出现的现象——它是对全面独裁特别不利的国际环境的产物。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催生了大约 15 年的西方自由主义独领风骚时期，以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力量为标志。⁹ 在 1990 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西方大国几乎就等同于“国际社会”。这种优势地位，加上为促进民主所作的前所未有的国际努力，在世界上有力地推动了统治精英采纳西方式政治制度。除少数几个国家（通常是拥有核武器、石油或庞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外，维持完全独裁统治的代价变得极其高昂。在与西方联系最紧密、受西方影响最强（依赖西方）的地区，如中东欧和美洲，外部的民主化压力最为强烈。¹⁰

冷战后的国际环境曾有利于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兴起。随着多党制选举在全球扩展，国内条件相对有利的国家（包括墨西哥、波兰、南非和台湾），普遍实现了民主化。但多党制治理也扩散到了许多民主条件极为不利的国家：经济贫困、国家机器运转失灵、中产阶级规模小，且反对派和公民社会力量薄弱的国家（如贝宁、海地、马达加斯加和马里）；以及后共产主义国家，其政府规模过大，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规模过小（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或是具有上述所有特征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北马其顿和罗马尼亚）。根据几乎所有现行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些国家“本应”是威权主义政体，但外部压力迫使其精英阶层允许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和选举竞争。由此，在其他历史背景下极可能作为纯粹独裁统治的国家，在后冷战的时代却变成了混合政体。

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太久。21世纪初，国际环境发生了剧变。首先，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改变了全球力量平衡，终结了西方自由主义的优势地位。俄罗斯积极挑战自由主义的国际准则，不仅在邻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而且在叙利亚、委内瑞拉甚至西方民主国家都展现了其影响力。中国利用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推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替代性国际机构的建立。中国还启动了野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一规模达万亿美元的援助与投资项目，旨在“将各国在经济上与北京捆绑在一起”，并建立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政治共同体”。¹¹

与此同时，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却在衰落。美国主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欧盟日益加剧的内部困境，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

侵蚀了西方国家的实力、威望和自信。这种危机由于西方内部反自由主义势力的上升而进一步加剧，这在美国尤为显著。在这种新的背景下，西方大国推动民主的意愿和能力均有所减弱。欧盟曾在 1970 年代对南欧、1990 年代对中东欧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在 21 世纪初却几乎未采取行动遏制重新抬头的威权主义。同样，美国总统对海外民主的支持，在巴拉克·奥巴马任期内逐渐减弱，并在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期间实质上停止了。从洪都拉斯到匈牙利再到菲律宾，特朗普政府摒弃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方针，转而接纳独裁者。

因此，到 21 世纪初，西方的联系与影响已丧失了大部分力量。随着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的替代来源不断涌现，西方的影响力遭到削弱。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某些情况下来自伊朗或委内瑞拉的援助，降低了威权政府对西方的依赖。中国和俄罗斯在 1990 年代曾充当地区的“黑骑士”（black knights，在民主转型研究中，指那些为面临西方压力的专制政权提供资金或外交支持的大国，帮助它们抵御外部的民主化压力——译者注），到 21 世纪初则成为了全球性的“黑骑士”。¹² 而与西方的联系效用则被稀释，因为西方对推广民主的兴趣降低。当其他国家的政客、技术官僚和商界领袖认为政府的不民主行为不会危及他们与西方的关系时，他们就更没有动力去反抗这种不民主。

在中美洲和中东欧地区，与西方的联系及其影响力已显而易见地减弱。在这些地区，1990 年代与西方建立的广泛连结极大地提高了威权主义的代价，使得即使是温和的竞争性威权主义也难以维系。事实上，1990 年至 1995 年间存在于中东欧和美洲的几乎所有竞争性威权

主义政权，到2004年都已实现民主化。然而到今天，威权主义在这两个地区均已卷土重来。在2019年存在的32个竞争性威权主义案例中，有6个是与西方有着紧密联系的美洲和中东欧国家。¹³ 另外两个与西方联系紧密的国家——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如今已成为完全的威权政体。

欧盟影响力的削弱在匈牙利表现得尤为明显。1990年以后，匈牙利曾一直是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在21世纪初，很少有观察家认为其民主制度面临风险。然而，从2010年开始，由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领导的“青民盟”（Fidesz）政府利用其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席位，扭曲了政治竞争环境。欧尔班政府向宪法法院安插亲信，通过将国有媒体政治化，以及通过收编大部分私营媒体，限制反对派媒体的发声渠道，并操纵选区划分（gerrymander），以确保执政党对议会的控制。这与1990年代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欧洲施加的强大压力曾成功挫败了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萌芽中的威权主义企图，而2010至2018年间，分裂的欧盟对欧尔班政府几乎未采取任何惩罚性措施。

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案例凸显了美国在美洲地区推动民主的挫败。2009年，洪都拉斯军队推翻了民粹主义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Manuel Zelaya），导致民主进程脱轨。奥巴马政府谴责了那场政变，并暂停了非人道主义援助，但得到许多美国共和党人支持的洪都拉斯精英阶层却默许了政变，使得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收效甚微。尽管文职人员治理很快得以恢复，2010年也举行了公平的选举，但在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Juan Orlando Hernández）总统执政期间

（2014 年至今），政权逐渐滑向了竞争性威权主义。埃尔南德斯在 2012 年担任国民议会议长期间便已在最高法院安插亲信，他公然藐视宪法中关于总统不得连任的长期禁令，指使效忠于他的最高法院裁定该条款“不适用”。2018 年，埃尔南德斯在一场充满舞弊的选举中成功连任。尽管民众发起大规模抗议，美洲国家组织也呼吁重新计票，但特朗普政府始终保持沉默，这就为埃尔南德斯日益专制的政府提供了合法性。由于洪都拉斯与美国的关系被认为没有受到威胁，商界领袖、军方官员及其他有权势的精英阶层几乎未受到压力要与政府决裂（相反，1993 年危地马拉总统政变和 1994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选举舞弊事件发生后，却曾出现过这种情况）。

西方的联系和施压也未能阻止尼加拉瓜向威权主义的倒退。2006 年，左翼桑地诺运动（Sandinista movement）的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重返总统职位后不久，尼加拉瓜脆弱的民主便开始瓦解。2008 年，支持政府的机构剥夺了一个反对党（桑地诺复兴运动）的合法地位，并强行用奥尔特加的一名忠实追随者取代了另一个政党（尼加拉瓜自由联盟）的领导人。同年举行的市长选举因违规行为而遭到破坏。2009 年，由亲政府人士占据多数的最高法院推翻了尼加拉瓜宪法对连任的禁令；两年后，奥尔特加在一场存在缺陷的选举中连任，据可信的观察员称，选举结果“无法证实”。¹⁴ 2011 年后，这个国家向威权主义的转变加速。2014 年的宪法修改允许总统无限次连任。2016 年，主要的反对派力量被剥夺了在立法机构的席位。2018 年，一波反对派抗议活动遭到残酷镇压，造成数百人死亡。如今，政权已演变为全面的独裁统治。

尽管现在的奥尔特加政府比 1980 年代末桑地诺主义政权的统治更加专制，但其面临的外部民主化压力却小得多。除其他因素外，委内瑞拉以补贴石油和约 45 亿美元援助形式提供的“黑骑士”式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压力。此外，奥尔特加政府在贸易、毒品和边境安全等问题上与华盛顿的合作，冲淡了支持美国采取惩罚性行动的力度。¹⁵ 事实上，2017 年全年，尼加拉瓜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及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援助均保持稳定。

在洪都拉斯、匈牙利和尼加拉瓜等与西方联系紧密的国家中，威权主义的持续存在表明，与 1990 年代相比，西方的民主化压力已大为减弱。即使是在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小国，专制行为也不再会引发代价高昂的国际社会惩罚性反应。换言之，威权主义的外部成本已经降低了。

为什么竞争性政治依然存在

显然，当今世界对威权主义的拒斥，已不如冷战后初期那般强烈。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变化会促使许多政权抛弃其竞争性因素，彻底转向威权主义。既然压制带来的外部成本对独裁者而言已可承受，他们又何必容忍允许公开反对派和多党选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确实有少数政权遵循了这一逻辑。例如在柬埔寨，1990 年代，巨大的国际压力迫使洪森政府将反对派合法化，并允许举行竞争性的多党选举。然而在过去十年间，随着西方压力的减弱以及中国提供的支持，洪森得以取缔主要反对党，将主要反对派领导人监禁或流放，从而重新巩固了全面的专制统治。

但这类案例并不多见。在我们于1990至1995年间确认的35个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中，截至2019年，仅有五个——白俄罗斯、柬埔寨、喀麦隆、尼加拉瓜和俄罗斯——可被归类为霸权型或封闭型专制政权。其余的仍保持着竞争性特征：其中15个已转型为民主政体，另外15个仍维持着竞争性威权体制。

因此，在“后冷战后”（post post-Cold War）时代，竞争性政体依然出人意料地坚挺。即使是那些民主条件极为不利的国家——贝宁、冈比亚、海地、吉尔吉斯斯坦、利比里亚、马拉维、马里、蒙古、塞拉利昂——也依然保持着竞争性威权主义，甚至民主体制。鉴于国际环境日益不利，为何全面威权主义未能卷土重来？

竞争性选举制度的韧性既有国际根源，也有国内根源。在国际层面，自由主义的西方或许处于低谷，但绝非出局。西方民主国家依然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2017年，美国的军事开支是中国的三倍，且超过了排在其后的7个最大军事强国的总和。¹⁶ 全球10大经济体中，有9个是成熟的民主国家，美元依然是世界货币。¹⁷

同时，对自由民主的挑战依然微弱、收效甚微。冷战时期，中国和苏联曾大力在欧洲、亚洲及其他地区传播共产主义。相比之下，当今的中国和俄罗斯相对较少地在海外推广替代性政体模式。这两个国家主要致力于支持地缘政治盟友并削弱对手，而非单纯推广威权主义。在中国，尽管习近平对批评其政权的外国人士和机构——包括企业和大学——进行了强硬反击，但尚不明确其政府是否意图在海外推广专制主义。¹⁸ 同样，俄罗斯对威权主义的支持大多是机会主义的——且往

往收效甚微。在专制的吉尔吉斯斯坦和摩尔多瓦，普京政府曾支持（亲俄的）反对派势力。而在某些情况下，包括乌克兰在内，俄罗斯的干预手段如此笨拙，以致引发了反俄派反弹，反而增强了民主力量。

此外，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不同，21 世纪初尚未出现任何能够挑战自由民主的合法替代模式。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曾获得精英阶层和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组织严密的政党和运动将这些意识形态奉为优于自由民主的替代方案。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列宁主义的一党专政受到一批颇有威望的第三世界领导人拥护，包括阿尔及利亚的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越南的胡志明（Ho Chi Minh）、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以及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等等。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南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右翼军事独裁政权被广泛视为一种虽非理想但合法的手段，用于抵御共产主义。

而当今世界并不存在此类替代模式。相反，多党制选举仍被广泛视为执政的最合法途径。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公众舆论基本上仍与丘吉尔关于民主的名言一致：公民未必热爱民主，但除少数几个国家（包括中国和新加坡）外，他们没有发现其他更好的选择。¹⁹ 社会可能并不完全信奉自由民主的原则，但人们喜欢竞争性选举，特别是他们看重能够投票罢免坏政府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公民——最近在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香港、尼加拉瓜、俄罗斯、苏丹和委内瑞拉——继续走上街头，要求或捍卫竞争性选举。

因此，尽管西方自由主义面临各种挑战，但多党选举制度依然异常稳固。²⁰ 民粹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t）运动在许多国家威胁着自由权利，但这些挑战依然植根于选举政治。民粹主义削弱了自由制度，往往将民主国家推向竞争性威权主义，²¹ 但它极少彻底废除选举竞争。即便当代的军事政变，也很少导致独裁统治。正如尼古拉·马里诺夫（Nikolay Marinov）和海因·戈曼斯（Hein Goemans）所指出的，冷战后的大多数政变，之后都举行了竞争性选举。²² 在很大程度上，选举依然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竞争性政治之所以在世界许多地区持续存在，还有重要的国内原因。许多当代的独裁者，缺乏消除反对派、维持内部凝聚的制度能力，而维持内部凝聚是巩固霸权统治所需要的。²³ 首先，他们缺乏最低限度的有效国家机器。国家能力的薄弱——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前苏联、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非常普遍——损害了经济表现，限制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还滋生了普遍的腐败。因此，掌握弱势国家体制的政府往往面临广泛的公众不满，这很容易导致反对和抗议。正像民主国家在国家能力薄弱时，容易出现严重的治理和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问题一样，专制国家也是如此。

更关键的是，弱势国家的独裁者往往缺乏压制反对派挑战的强权能力。如果军队、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门装备落后、资金不足且纪律涣散，那么即便是规模不大的抗议，也无法指望它们去平息。国家官僚机构和强力部门的极度软弱，使独裁者面对“人民力量”起义时变得脆弱。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仅数千名轻装示威者便压倒了警察，占领了首都的政府大楼，独裁者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

(Kurmanbek Bakiyev) 随后下台。正如斯科特·拉德尼茨 (Scott Radnitz) 所指出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机器依然如此软弱，以至于一名抗议者只需驾驶卡车冲破‘白宫’正门，便为暴民涌入大楼打开了通道。”²⁴ 同样，在马达加斯加，2002年迪迪埃·拉齐拉卡 (Didier Ratsiraka) 在选举舞弊后因军队袖手旁观、拒绝镇压抗议者而下台。7年后，他的继任者马克·拉瓦卢马纳纳 (Marc Ravalomanana) 也以类似方式下台——军队在反政府骚乱中哗变，他随后放弃权力。

软弱的执政党也会阻碍在任统治者巩固权力，使其容易受到内部分裂和权力交接危机的冲击。例如，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 (Petro Poroshenko) 于2014年上台时，他的政党“不过是个传说” (no more than a myth)，甚至连网站、公开的地址或电话号码都没有。²⁵ 这限制了波罗申科维持权力的能力，更不用说巩固权力了。2018年底，在遭遇俄罗斯海军袭击后，波罗申科宣布实施戒严，推迟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然而，部分由于其盟友的反对，他被迫修改了戒严令，确保选举按原定计划进行。随后，他惨败于政治素人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在托马斯·博尼·亚伊 (Thomas Boni Yayi) 执政的贝宁 (2006–16)、拉斐尔·科雷亚 (Rafael Correa) 执政的厄瓜多尔 (2007–17)、埃杜阿尔德·谢瓦尔德纳泽 (Eduard Shevardnadze) 执政的格鲁吉亚 (1992–2003)，以及阿卜杜拉耶·瓦德 (Abdoulaye Wade) 执政的塞内加尔 (2000–12) 等案例中，处在早期阶段的竞争性威权主义同样因执政党力量薄弱而受到削弱。

国家和政党的弱势，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竞争性威权主义——而非完全的独裁统治——得以持续存在。事实上，全球三分之二的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32 个中的 21 个）位于非洲——这个地区具有全球最脆弱的国家体系。在贝宁、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等国家，低效的官僚机构、资金不足的安全部队以及软弱或不存在的执政党，都限制了政府巩固威权统治的努力。

因此，在许多国家，竞争性政治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其根源在于一种默认的多元主义（pluralism by default）：专制统治者根本缺乏巩固霸权所需的组织资源和强制能力。弱势国家和政党会动摇各类政体的稳定性。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民主政体（如贝宁、海地和马里）往往脆弱，但新的专制政体同样如此。换言之，在“后冷战后”（post-post-Cold War）时代，国家虚弱阻碍了威权统治的巩固。

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新面貌

我们曾指出，大多数的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出现在对民主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低收入国家，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民主传统，制度、法治薄弱，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发育不全，反对派力量弱小。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扭曲竞争环境相对容易。薄弱的国家机构更容易被安插亲信（packed）和被操纵；资金匮乏的媒体、企业和反对党也更容易被收编。一旦发生滥权行为，反对派的抗议往往规模有限、零星分散。因此，即便是能力平平、不得民心的领导人，也常常能够推翻民主制度（即使他们无法巩固独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性威权主义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产物，因为领导人无需动员大众支持，也无需建构庞大的选举多数盘。

然而，在少数几个与此截然不同的国家，近年来也出现了“竞争性威权主义”。在匈牙利、菲律宾、土耳其和委内瑞拉，其民主的传统和制度比上述国家更强大。它们拥有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或多或少地建立了法治。其经济更为发达，拥有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以及强大的反对党。此外，这些国家与西方有着广泛的联系，这意味着其政府面对的外部监督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前苏联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更为严格。因此，在这些新案例中，要扭曲竞争环境会困难得多。当权者要面对独立的法官、有声望的独立媒体，以及拥有资源、能够在街头和投票站有效动员支持者的反对派。

要在匈牙利、菲律宾、土耳其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扭曲政治竞争，相比贝宁、马达加斯加或摩尔多瓦来说，需要更大的技巧、更复杂的策略以及广泛得多的民众动员。潜在的独裁者必须先掌握相当规模的多数选民，然后诉诸全民公决（plebiscitarian）或利用超多数席位（hypermajoritarian）策略，来改变宪法和选举规则，从而削弱对手并锁定自己对权力的掌控。

这通常是通过采取激化对立的民粹主义或族裔民族主义策略来实现的。例如，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和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在严重经济危机中进行竞选，他们利用有效的民粹主义诉求，调动了民众长期以来对既有政治精英的愤怒情绪。在匈牙利，“青民盟”通过在

一场重大腐败丑闻后巧妙地煽动反精英情绪，于2010年取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从而执掌了政权。在菲律宾，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敏锐地利用了民众对犯罪率飙升和长期腐败的普遍不满情绪。最后，在印度——这个可能正处于竞争性威权主义边缘的成熟民主国家——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利用宗教民族主义，动员了占多数的印度教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娴熟的民粹主义或族裔民族主义诉求，都为潜在的独裁者提供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和议会多数席位，这些正是他们为了扭曲竞争环境而寻求宪法及其他方面的改变所需要的。此外，鉴于国内外监督力度相对较强，这些举措不得不比其他竞争性威权政权所采用的方式更为隐晦和精巧。

匈牙利的威权主义之路

这种新型“竞争性威权主义”模式的最典型案例当属匈牙利。就在2010年，匈牙利还被普遍视为一个制度健全、政党体系竞争充分、公民社会充满活力、媒体自由和多元的巩固民主国家。1990年至2010年间，匈牙利历经五次政权更迭，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通过选举轮流执政，那些选举“关乎政府的政治色彩，而非政权的性质”。²⁶ 2004年，匈牙利加入欧盟，因此带来了数十亿欧元的农业补贴，至今仍得到大多数匈牙利人的支持。²⁷

欧尔班和“青民盟”最初于1998年以自由主义中右路线上台执政。但从21世纪初开始，特别是在该党2002年选举失败后，欧尔班转变了路线，抛弃自由主义，转而拥抱宗教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并开

始耍手段激化匈牙利的政治对立。与其他地方的民粹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政党一样，欧尔班的反精英呼吁调动了沉寂已久的愤怒，特别是在农村选民中。他越来越转向非自由主义，纵容“蓄意破除禁忌”（calculated breaking of taboos）——即冲破那些约束反犹太、反罗姆人（anti-Roma）言论的社会禁忌——借此吸引极右翼支持。²⁸

2010 年，“青民盟”凭借议会绝对多数席位重掌政权后，便开始推翻民主体制，其手段极具破坏力，但又足够隐蔽以减少欧盟的反弹。关键在于，欧尔班政府并未以表面上公开侵犯基本公民自由的手段，比如逮捕反对者或查封独立媒体，就实际巩固了权力。2011 年，“青民盟”声称法院和其他国家监督机构已被共产主义者控制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所掌控，遂利用其在议会的多数席位通过了一部“基本法”，取消了对总理权力的关键制衡。最值得注意的是，宪法法院的规模被扩大，并安插了“青民盟”的忠实支持者，此后该法院便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性。政府还把忠于自己的党羽安插进“国家选举委员会”。结果，此后通过官方渠道提交的几乎所有与选举相关的投诉，均以形式上的理由被驳回。到 2012 年，“青民盟”的忠实支持者已“盘踞在国家的每个角落——从宪法法院、预算委员会和国家司法办公室，到国家审计署、检察院和国家银行。”²⁹

欧尔班政府还有效控制了大部分新闻媒体——并非通过关闭报社或逮捕记者，而是通过幕后运作，将国有媒体政治化，将国际媒体集团赶出匈牙利市场，并协助与其结盟的商人控制私营媒体。例如，2014 年，一家亲政府的媒体公司从两家与政府有联系的银行借款，用于收购 Origo.hu——这家领先的新闻网站此前一直对政府持强烈批评态

度。截至 2018 年底，“青民盟”的盟友控制着 500 多家媒体机构，这使得政府批评者越来越难以触及广大受众。³⁰

“青民盟”政府还通过有选择地投放政府广告，以及利用国家影响力来左右其他广告商，从而塑造了媒体环境。例如，2010 年后，许多公司因担心政治后果，停止在反对派的广播电台“Klubradio”投放广告。由于广告收入枯竭，许多独立新闻机构被迫关闭。³¹ 由于缺乏明显的胁迫手段，政府得以将这些关闭事件描绘成影响所有媒体的市场力量所致，而非专门针对反对派媒体的专制压力。

最终，“青民盟”通过一系列选举改革锁定了自己的优势。这些改革包括：恶劣、不公正的党派选区划分；取消议会第二轮决选，这减少了实力较弱的反对党胜选的机会；以及禁止在私营媒体上投放竞选广告，这实际上将电视竞选宣传限制在（有偏向的）国营媒体上。³² 这些优势使“青民盟”在 2014 年无需在投票日诉诸赤裸裸的舞弊手段，就保住了议会中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席位，尽管其得票率已从上届选举的 53% 下降到了 45%。

尽管匈牙利政府明显滑向了“竞争性威权主义”，但欧尔班政府通过巧妙利用“青民盟”在欧洲人民党（EPP）——这个主导欧洲议会的保守派阵营——中的成员身份来转移批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欧盟的谴责。直到 2019 年 3 月其政党被欧洲人民党暂停成员身份之前，欧尔班一直受到欧洲人民党成员（包括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庇护，因为青民盟“提供了有助于欧洲人民党维持其在欧盟政治中主导地位的选票”。³³ 因此，这种隐蔽的滥权手段与欧洲议会内部战

略联盟结合，使欧尔班政府在近 10 年的时间里得以避免欧盟的惩罚性行动。2019 年，欧洲地区各方对布达佩斯的压力有所增加，但鉴于匈牙利扭曲的政治环境，以及弱小且分裂的反对派，欧尔班对权力的掌控似乎依然稳固。

向西方扩散？

其他欧洲领导人也试图效仿欧尔班的策略。最接近的例子就在邻国波兰。自其领导的保守派“法律与公正党”（PiS）于 2015 年执政以来，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便试图（用他自己的话说）打造一个“华沙的布达佩斯”。³⁴ 与“青民盟”一样，“法律与公正党”也试图对法院进行清洗和安插亲信、破坏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性、夺取公共广播机构的控制权，并清除军队和情报部门中被认为对该党不够忠诚的人员。这些举措并非总是得逞。由于公民的强烈反对、“法律与公正党”未能在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加上欧盟的更严厉反制，波兰的民主在 2019 年得以存续。然而，滑向“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威胁依然非常现实，尤其是考虑到“法律与公正党”在 2019 年 10 月轻松连任的事实。

比匈牙利和波兰的民主制度遭到攻击更令人惊讶的是，有证据表明，这些策略可能正在向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扩散。在围绕国家认同问题的两极对立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西方的非自由主义或民粹主义右翼势力，已与欧尔班以及俄罗斯建立了密切联系，并采纳了他们的一些威权主义做法。例如，在 2017 年奥地利大选前，奥地利自由党的领导人被拍摄到寻求俄罗斯援助，并表示有意效仿欧尔班操纵媒体格局

的做法。在视频中，自由党领袖（未来的副总理）海因茨 - 克里斯蒂安·施特拉赫（Heinz-Christian Strache）宣称：“我们要像欧尔班那样构建媒体格局”，并支持俄罗斯接管奥地利主要小报《克朗报》（Krone）的构想。³⁵ 2017 至 2019 年间，作为奥地利政府的少数派执政伙伴，自由党致力于将国家电视台政治化，并利用内政部封杀批评性媒体，同时奖励亲政府媒体。意大利广受欢迎的极右翼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同样将欧尔班视为政治榜样。萨尔维尼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强硬的本土主义（nativist）和反少数族裔言论，以及利用诽谤诉讼压制批评者的做法，引发了人们的担忧：未来由他领导的政府可能会走向非自由主义甚至专制主义方向。

类似的趋势甚至已经蔓延到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借用了匈牙利和土耳其独裁者的“深层政府”叙事，他们以此为清洗行动以及在法院和其他关键国家机构中安插亲信提供正当理由。尽管特朗普在清洗执法、情报及其他公共机构方面的努力仅取得有限成效，但共和党已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试图将选举格局向自身有利的方向倾斜，包括通过 10 余项州级的“选民身份验证”（voter ID）法律，这些法律使得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公民更难进行选民登记和投票。³⁶

人们曾普遍认为，在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系统性地扭曲政治竞争环境以打压政治对手的做法早已成为历史。而公开的非自由主义、甚至独裁的领导人可能上台执政，或者执政党会试图复制欧尔班式的威权媒体策略，这些在仅仅十年前还是几乎无法想象的。西方国家拥有强大的民主“抗体”（antibodies），包括健全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高度发达的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以及组织良好的反对派。在成熟的西方

民主国家，反对派所拥有的雄厚资金和组织资源，使得在这些国家扭曲竞争环境的难度，要远高于肯尼亚、土耳其、乌克兰或委内瑞拉等国。尽管如此，更隐蔽、更复杂的威权主义策略的出现，以及能够为这些行径争取多数支持的、有效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叙事的发展，仍是令人担忧的主要原因。竞争性威权主义不仅蓬勃发展，而且正在一步步向西方逼近。没有任何民主制度是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作者感谢曼努埃尔·梅伦德斯（Manuel Meléndez）提供的出色研究协助）

注释

- 1 史蒂文·莱维茨基和卢坎·A·韦，《没有民主的选举：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兴起》，另参见莱维茨基和韦：《竞争性威权主义：冷战后混合政体》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April 2002): 52–65. See also Levitsky and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from which many of the points below are drawn.]
- 2 克里斯托弗·卡罗瑟斯：《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出人意料的不稳定》 [Christopher Carothers, “The Surprising Instability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29 (October 2018): 129–35.]
- 3 丹·斯莱特，《民主的摇摆》 [Dan Slater, “Democratic Careening,” *World Politics* 65 (October 2013): 729–63.]
- 4 截至2019年12月，我们将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克罗地亚、多米尼加共和国、格鲁吉亚、加纳、圭亚那、马来西亚、墨西哥、摩尔多瓦、秘鲁、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台湾和乌克兰归类为民主国家。
- 5 这些国家是贝宁、北马其顿、马里、尼加拉瓜、塞内加尔和塞尔维亚。
- 6 这些国家是白俄罗斯、柬埔寨、喀麦隆和俄罗斯。
- 7 这些国家是博茨瓦纳、加蓬、海地、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 8 截至本文撰写之时（2019年11月），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已因2019年总统选举涉嫌舞弊引发的广泛抗议而下台。鉴于事态尚

在发展，我们维持对玻利维亚“竞争性威权主义国家”的归类。

- 9 亚历山大·库利和丹尼尔·内克森：《霸权的终结：美国全球秩序的瓦解》[Alexander Cooley and Daniel Nexon, *Exit from Hegemony: The Unraveling of the American Global Order* (forthcoming fr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0 莱维茨基和韦：《竞争性威权主义》[Levitsky and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 11 库利和内克森：《霸权的终结》。关于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另见拉里·戴蒙德所著《妖风：从俄罗斯的愤怒、中国的野心和美国的自满中拯救民主》[Cooley and Nexon, *Exit from Hegemony*. On the effects of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ee also Larry Diamond, *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
- 12 莱维茨基和韦：《竞争性威权主义》[Levitsky and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41;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ner, and Christopher Walker, eds. *Authoritarianism Goes Global: The Challenge to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 13 这些国家是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北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另外两个新出现的竞争性威权主义案例——菲律宾和土耳其——也具有与西方联系紧密的特点。
- 14 凯·M·塔勒：《尼加拉瓜：重返强人政治》[Kai M. Thaler, “Nicaragua: A Return to Caudillismo,” *Journal of Democracy* 28 (April 2017):159.]
- 15 塔勒：《尼加拉瓜：重返强人政治》[Thaler, “Nicaragua: A Return to Caudillismo,” 165, 163.]
- 16 库利和内克森：《霸权的终结》[Cooley and Nexon, *Exit from Hegemony*, chapter 1.]
- 17 参见 www.focus-economics.com/blog/the-largest-economies-in-the-world.
- 18 事实上，政治学家杰西卡·陈·韦斯最近断言：“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蓄意推广专制主义或攻击民主。”[参见杰西卡·陈·韦斯：《美中关系中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国捍卫专制评估》Jessica Chen Weiss, “An Ideological Contest in U.S.-China Relations? Assessing China’s Defense of Autocracy,” forthcoming in *Security and US-China Relations: Differences, Dangers, and Dilemmas*, eds. Avery Goldstein and Jacques deLisle. See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427181.]
- 19 参见理查德·维克·劳拉·西尔弗和亚历山德拉·卡斯蒂略：《全球许多人对民主的运作方式感到不满》以及理查德·维科等：《全球范围内对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的广泛支持》[See Richard Wike, Laura Silver, and

- Alexandra Castillo, "Many Across the Globe Are Dissatisfied With How Democracy Is Working," *Pew Research Center*, 29 April 2019, 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9/04/29/many-across-the-globe-are-dissatisfied-with-how-democracy-is-working, and Richard Wike et al., "Globally, Broad Support for Representative and Direct Democracy," *Pew Research Center*, 16 October 2017, 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7/10/16/globally-broad-support-for-representative-and-direct-democracy.]
- 20 在过去十年中, V-Dem (民主多样性数据库) 在“选举竞争”维度上的评分有所提升的国家数量, 超过了评分有所下降的国家数量。事实上, V-Dem在2019年得出结论称, 当今世界“比上个世纪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民主”。参见安娜·吕尔曼 (Anna Lührmann) 等:《2018年世界状况: 民主面临全球挑战》See Anna Lührmann et al., "State of the World 2018: Democracy Facing Global Challenges," *Democratization* 26, no. 6 (2019): 895–915.]
- 21 史蒂文·莱维茨基和詹姆斯·洛克森:《安第斯地区的民粹主义和竞争性威权主义》[Steven Levitsky and James Loxton, "Populism and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Andes," *Democratization* 20, no. 1 (2013): 107–36.]
- 22 尼古拉·马里诺夫和海因·戈曼斯:《政变与民主》[Nikolay Marinov and Hein Goemans, "Coups and Democra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 (October 2014): 799–825.]
- 23 卢坎·韦:《默认的多元主义: 弱势独裁者与竞争性政治的兴起》[Lucan Way, *Pluralism by Default: Weak Autocrats and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 24 斯科特·拉德尼茨:《富人的武器: 中亚的掠夺性政权与精英主导的抗议》[Scott Radnitz, *Weapons of the Wealthy: Predatory Regimes and Elite-Led Protests in Central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7.]
- 25 谢尔希·列先科,《波罗申科与权力真空》[Serhii Leshchenko, "Poroshenko i porozhnecha" (*Poroshenko and the vacuum*), *Ukrainska Pravda*, 16 May 2014, www.pravda.com.ua/articles/2014/05/16/7025568.]
- 26 雅克·鲁普尼克:《匈牙利的非自由主义转向: 事态是如何走向错误的》[Jacques Rupnik, "Hungary's Illiberal Turn: How Things Went Wrong," *Journal of Democracy* 23 (July 2012): 132.]
- 27 亚历山德拉·贝尼,《欧洲晴雨表: 对欧盟的支持率创历史新高, 60%的匈牙利人支持欧盟成员国身份》[Alexandra Béni, "Eurobarometer : Support for EU at Record High, 60% of Hungarians Back Membership," *Daily News Hungary*, 17 October 2018, <https://dailynewshungary.com/eurobarometer-support-for-eu-at-record-high-60-of-hungarians-back-membership>.]
- 28 保罗·伦德瓦伊:《欧尔班: 欧洲的新强人》[Paul Lendvai, *Orbán: Europe's New Strong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48.]

- 29 米克洛什·班库蒂、加博尔·哈尔迈、金·莱恩·谢佩勒：《匈牙利的非自由主义转向：宪法失效》[Miklós Bánkuti, Gábor Halmai, Kim Lane Scheppele, “Hungary’s Illiberal Turn: Disabling the Constitu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3 (July 2012): 145.]
- 30 帕特里克·金斯利和本杰明·诺瓦克：《展示新闻自由如何消亡的网站》[Patrick Kingsley and Benjamin Novak, “The Website That Shows How a Free Press Can Die,” *New York Times*, 24 November 2018.]
- 31 《匈牙利独立媒体正与经济压力和恐吓作斗争》[“Hungary’s Independent Media Struggle Against Economic Pressure, Intimidation,”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7 July 2014, <https://cpj.org/blog/2014/07/hungarys-independent-media-struggle-against-econom.php#more>.]
- 32 参见 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hungarys_elections_free_but_not_fair; also Bánkuti, Halmai, and Scheppele, 145.
- 33 R·丹尼尔·凯莱门和洛朗·佩奇：《驱逐独裁者：欧洲人民党必须抛弃欧尔班，以挽救其残存的信誉》[R. Daniel Kelemen and Laurent Pech, “Ejecting the Autocrat: The EPP Must Ditch Orbán to Salvage What Remains of Its Credibility,” *Euronews*, 8 March 2019, www.euronews.com/2019/03/08/ejecting-the-autocrat-the-epp-must-ditch-orban-to-salvage-what-remains-of-its-credibility.]
- 34 《波兰新政府以欧尔班的匈牙利为榜样》[“Poland’s New Government Finds a Model in Orbán’s Hungary,” *Financial Times*, 16 January 2016, www.ft.com/content/0a3c7d44-b48e-11e5-8358-9a82b43f6b2f.]
- 35 《奥地利领导人呼吁提前举行大选，此前极右翼副总理辞职》[“Austrian Leader Calls for Snap Elections After Far-Right Vice-Chancellor Resigns,” *New York Times*, 18 May 2019, www.nytimes.com/2019/05/18/world/europe/aus-tria-strache-resigns-video.html.]
- 36 本杰明·海顿：《美国的选民身份验证法与投票率》[Benjamin Highton, “Voter Identification Laws and Turnou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 (2017): 151–53.]

读书

王天成

作者王天成系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
《中国民主季刊》主编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3期

2026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异议人士有门必修课：《革命蓝图》中文版序

题记：我们最好把反抗专制的非暴力抗争理解为一种战争，并且是比军事斗争更复杂的战争。那些有志于参与发动、领导反抗运动的人，应该学习、钻研这一抗争技术，正如军事指挥官需要上军事学院、需要学习“兵法”。

这的确是一本关于革命的书。但它所说的“革命”，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那种暴力革命——不是数百年前的英国、美国、法国革命，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一再重复的农民武装起义、晚近的辛亥革命和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所说的“革命”，是当代世界终结专制、开启民主最主要的斗争方式，也就是非暴力革命，或者说人民力量、公民反抗运动。



波波维奇、米勒 著
言晓义 译
2026年6月4日出版

作者斯尔佳·波波维奇（Srđja Popović），是原塞尔维亚学生非暴力反抗组织“抵抗”（Otpor）的共同创始人和1999-2000年推翻米洛舍维奇独裁统治的大规模民众抗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革命成功后，他曾短暂从政，但很快转而致力于传播非暴力抗争的原理、知识、战略和战术，帮助其他国家的反抗者。

翻译出版这本书的理由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还是让我回到1989年鲜为人知的一幕，因为有必要做进一步说明。那一年，当天安门民主

运动仍在高潮的时候，一个居住在美国波士顿、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的人带着其助手，飞越太平洋到北京实地考察学生运动。他是当代最重要的非暴力抗争专家、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Gene Sharp）。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夏普回美国后发表的、关于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考察报告：

这一民主运动，从发起到屠杀之夜，“严格的非暴力形式的抗议”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我们去北京想要了解，学生们为什么会选择非暴力的抗争形式，这些想法来自何处？他们掌握了多少非暴力斗争的技巧？如果有领导者的话，是谁在领导这一运动？活动是自发的，还是有计划的？活动有着怎样的战略构想？我们前去寻求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答案。¹

夏普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运动参与者们真正了解过非暴力抗争的本质。他写道：

没有一个我们访谈的学生接触过探究非暴力抗争的书籍、手册，或是任何语言的视听资料。一个加拿大外交官告诉我们，他听说有一些从美国买来的、关于非暴力抗争的书（未指名）在北京大学流传，但我们依然不能确认这一信息。许多学生说，他们的历史课本中提到了甘地和印度的不合作运动，有一个学生还很熟悉甘地对绝食斗争的运用。之后的一些报道指出，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人们能看到的也是很有限的相关资料。²

从那时到现在，数十载已然过去，我国民主活动人士是否接触了更多相关书籍、资料呢？知识是否显著增加了呢？情况不乐观。只有极少

数人表现出了追求这方面知识的激情，因为多数人没有认识到非暴力抗争也需要学习。但缺乏学习激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使有人想做一些钻研、探索，他们也不容易找到足够的中文作品。尽管陆续有一定数量的翻译作品，但作品的选择随机性强、缺乏系统考虑。

这就导致了一种足以令人吃惊的状况，即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关于非暴力抗争的知识，总体上并不比欠缺的过去有显著增长。这是一个重大的不幸，因为我们的对手自 1989 以来，一直在不断学习并采取措施防止大规模抗议的发生以稳固自己的统治；我们，希望改变中国的人们，却没有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有知识而提升能力。

不止如此，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相较于 1989 年，我们的认知还发生了退化、混乱。那时，投身于运动的广大学生始终坚持非暴力的理念，而今天主张暴力、贬斥非暴力的人却非常多。那场运动的惨遭镇压打击了不少人对非暴力反抗的信心，加之对非暴力反抗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和战略战术缺乏了解，导致这些人的思想停留在依靠暴力追求改朝换代或政治变化的过去时代中。

暴力革命的确曾改变过历史。它有过其时代，但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当代世界，非暴力革命已经取代暴力，成为反抗专制暴政、开启政治转型的主要斗争形式。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从世界范围看，在人类争取自由的事业中，非暴力反抗比武装斗争更成功。

为说明这一点，这里分享两组国际上重要的统计研究结果：

从1900到2019年，全世界有650场推翻政权或者寻求民族独立的运动。其中，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51%，暴力运动只有约26%取得了成功。换言之，在过去120多年中，非暴力行动的成功率是暴力的两倍。³

从1970年代至本世纪初，有67个人口100万以上的国家发生政治转型。非暴力抗争在其中的50个、也就是超过70%的国家，是关键性驱动力量。另外有14个国家的转型由掌权者自上至下改革所推动，还有3个是在外部干预下开启的。⁴

我还想分享一个重要的研究结论，它是关于战略战术之重要性的。我借用另一位非暴力行动研究专家——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am）——的话，来介绍这一结论：

研究强烈表明，运动的战略选择和参与者技巧是其成败的重要决定因素。简言之，好的战略、战术和行动技能，能够使运动克服不利条件而取得成功。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因为技能和战略选择的水平，是可以通过培训和其他能力建设计划而提高的。⁵

根据梅里曼的研究，非暴力抗争有三大决定要素，即规模、战略规划与非暴力纪律。⁶在这三大要素中，对我们而言，最容易理解的是规模，就是参与反抗的人数。非暴力纪律的意思也算明显，重要的是保持克制、不诉诸暴力。然而，战略规划却并非如此“通俗易懂”，也是中国活动分子们所长期忽略的。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战略是不同于策略的。根据吉恩·夏普的观察，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最终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战略规划。⁷

这是一个序言，注定不方便进而探讨什么是战略，特别是如何制定战略规划。这些最好留给读者自己通过足够的阅读去获得了解、领悟。当然，战略问题并不是唯一需要学习的。需要对非暴力行动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方法等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与把握，同时，这种了解和把握对于战略规划者也至关重要。非暴力行动作为一种改变国家与社会的斗争技术，是一门有丰富内容的功课，需要花时间潜心研读。

我在这里只强调了阅读这种学习方式，还没有提到另外一种学习来源，就是自身过去的抗争经历。自身的抗争经历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我们的经验总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正确解读。阅读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拓宽我们的眼界，并反过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总结过去的经验。规模空前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惨遭镇压，所留下的阴影一直延续至今，许多人从中得出结论认为非暴力在中国行不通、必须使用暴力，这就是对过去经验的一个错误总结。

相当长时间以来，我国异议人士中有许多对非暴力抗争的严重误解。其中最流行、也最著名的，莫过于“非暴力只适合统治者比较仁慈或者有一定民主的国家”这一论调。同时，还有“非暴力是怯懦软弱的表现”，“主张非暴力是配合中共维稳”，“非暴力追求的是渐进改良”，等等。假如我们重视阅读，对于非暴力行动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方法有足够了解，持这些论调的人会少很多。

当前需要克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许多人对非暴力抗争信心不足。这种状况发生的原因，除了过去失败所留下的阴影，也与缺乏非暴力作为反抗专制的主要方式的知识相关。传播这种知识将有助于建立信

心，从而在被压迫者自身方面减少开展非暴力行动的障碍。当然，顺序似乎只能是异议人士自身首先要坚定信心，然后去帮助更多人树立信心。目前，如果走进异议人士的家，你几乎看不到谁的案头有一本关于非暴力抗争的书，这种状况令人遗憾。

现在我回到《革命蓝图》这本书。刚才提到其作者波波维奇在成功推翻了本国独裁政权后，很快转而致力于帮助其他国家的反抗者。他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了非盈利机构“应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英文缩写 CANVAS），已有近 40 个国家的人参加这个中心的培训。他还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哈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讲授非暴力抗争。他与其他国家的反抗者有广泛联系，足迹遍布世界许多地方。

《革命蓝图》就出自一个有这样经历和背景的人之手。这不是一本很厚的书，但作者的经历、背景增添了其厚度。它讲述的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严肃话题，在写作手法上却像一部细腻、生动的小说。因而，本书在出版后备受欢迎，成为不可多得的、学习非暴力抗争技术的入门佳作。

说它是非暴力抗争技术的入门佳作，意味着还应该有更进阶读物。这方面，让我们回到吉恩·夏普，尽管他也有普及性的佳作。吉恩·夏普对非暴力反抗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战略、战术、方法有迄今最系统、透彻的阐述。波波维奇当年参与计划、领导塞尔维亚反抗运动时，曾也受益于吉恩·夏普的著作。

借此机会，我想特别推荐夏普去世前不久编辑的、多卷本的自我培训读物——《自我解放：终结专制或其他压迫的行动战略规划指南》。这套书 2009 年出版后不久，台湾就有了译本，可惜误译很多。据我所知，已经有大陆异议人士重新翻译、编辑，希望能早日出版。

最后要提到的是，如果你阅读非暴力反抗的书籍，是想从中找到一套现成的、适合自己的具体行动方案，你将会失望。没有任何一本书，无论出自谁之手，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它们的价值在于增进知识、加深理解、训练思维、启发灵感，从而有助于成功制定和实施适合自己的战略计划、行动方案。

我们最好把反抗专制的非暴力抗争理解为一种战争，并且是比军事斗争更复杂的战争。那些有志于参与发动、领导反抗运动的人，应该学习、钻研这一抗争技术，正如军事指挥官需要上军事学院、需要学习“兵法”。而且，请记住，有些“兵书”，是需要反复研读的。

注释

- 1 吉恩·夏普、布鲁斯·詹金斯著、欧阳楚荃译、王天成审校，“非暴力抗争在中国：一个目击者的记录”，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https://chinademocrats.org/?p=2917>。
- 2 同上。
- 3 艾瑞卡·切诺维斯 (Erica Chenoweth) 著、言晓义译、王天成审校，“非暴力抗争的未来”，《中国民主季刊》2024 年第一期。切诺维斯现任哈佛大学教授。
- 4 阿德里安·卡拉特尼茨基 (Adrian Karatnycky) 与彼得·阿克曼 (Peter Ackerman)：《自由是如何赢得的：从公民抗争到持久民主》（“自由之家”特别报告，2005 年），<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How%20Freedom%20is%20Won.pdf>。

- 5 《中国民主季刊》2024 年第二期笔谈“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兴起”，参与讨论的有哈迪·梅里曼 (Hardy Merriam)、许田波 (Victoria Hui)、王天成等。这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暴力冲突研究中心” (CNCR) 总裁哈迪·梅里曼的发言片段。
- 6 哈迪·梅里曼 (Hardy Merriam) 著、袁飞译、王天成审校，“公民抗争的三大成功要素：一致、计划和纪律”，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https://chinademocrats.org/?p=69>。
- 7 吉恩·夏普、布鲁斯·詹金斯著、欧阳楚荃译、王天成审校，“非暴力抗争在中国：一个目击者的记录”，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https://chinademocrats.org/?p=2917>。



简记

弥正平 | 作者称正平为中国留美学生、青年社会运动活动者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3期

2026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全球民主 人权事件

1、以色列推动死刑法案，遭质疑区别对待巴勒斯坦人

3月30日，以色列议会通过《恐怖分子死刑法》（Death Penalty for Terrorists Law），规定杀害以色列公民的巴勒斯坦人可被处以死刑。该法律打破了以色列自1962年处决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以来，60余年不执行死刑的司法惯例。

该法案争议之处在于其设立了双重司法标准。在约旦河西岸这一非以色列主权领土内，法律将巴勒斯坦人置于军事法庭管辖之下。若巴勒斯坦裔被告被控民族主义谋杀，军事法庭对其默认刑罚为绞刑，即使检方并未主动求刑。该法案还规定，死刑必须在宣判后90天内执行；只有在“特殊理由”情况下，法官才可将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且禁止减刑。不仅如此，法案还严格限制了被告会见律师和家属的权利，并为行刑人员免除一切法律责任。以色列人权组织“贝采莱姆”（B' Tselem）强调，在现有的军事审判体系下，巴勒斯坦人的定罪率已高达约96%，而这些判决往往严重依赖审讯中的严刑逼供。

与此形成对比，在同一地理区域（约旦河西岸）内生活的以色列定居者及以色列本国公民，则受普通法院管辖。法官仅在案件判定为伤害本国公民或“否定以色列国存在”时，拥有在死刑与终身监禁之间的自由裁量权。

法律通过后，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ACRI）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指出以色列议会对不具主权的约旦河西岸领土缺乏立法权。以色列民主研究所（IDI）高级研究员阿米海·科恩（Amichai Cohen）表示，这

种司法管辖上的刻意划分，意味着“几乎不可能有以色列人触犯这部法律”。人权观察组织（HRW）中东区副主任亚当·库格尔（Adam Coogler）指出，该体系固化了双重司法体制，通过缩短周期与限制上诉，加快了针对巴勒斯坦裔被拘留者的行刑速度并减少了外部审查。

2、蒂萨党赢得匈牙利大选，议会通过法案限制总理任期

4月12日，匈牙利公布议会选举结果，彼得·马加尔（Péter Magyar）领导的反对党“蒂萨党”（Tisza）在选举中胜出，取代了现任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蒂萨党获取了议会三分之二的席位，达到了单独启动修宪程序的门槛。

这次选举结束了欧尔班16年的任职。一些国际组织此前将其政治模式定义为“选举型威权主义”。欧尔班及相关人员在过去十余年间建立了“国家合作体制”（NER），进行利益分配与资金转移，并将国营M1电视台等媒体转变为执政党宣传平台。在外交路线上，欧尔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亲密关系。

马加尔曾在政府体制内工作，但于2年前脱离原阵营。他在全国各地进行每日7场次的竞选演讲，将对政府资金分配及人员任用机制抱有异议的群体组织起来，完成了其“推翻旧政权”的竞选目标。

6月15日，新一届匈牙利国会利用多数席位优势，通过了宪法第16条修正案。新增条款规定，自1990年5月2日匈牙利民主化起，总理的累计任职时间上限为8年，折合两个法定任期。这一条款使得累

计执政时间达 20 年、共计 5 届的欧尔班失去了重新参选总理的资格。

同时，该法案为撤销“主权保护办公室”（Sovereignty Protection Office）移除了法律限制。该机构成立于欧尔班执政时期，曾用于调查和限制反对派人士及独立记者的活动。此外，欧尔班执政期间划拨给亲信管理的“公益资产管理基金会”（KEKVA）以及数千亿福林（匈牙利货币单位——编者注）的原国有资产，将进入资产追溯程序，重新收归国有。

3、“进步保加利亚”党赢得议会选举，终结五年僵局

4 月 19 日，保加利亚举行议会选举。前总统鲁门·拉德夫（Rumen Radev）领导的“进步保加利亚”党（Progressive Bulgaria，简称 PB）胜选，由拉德夫出任总理。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 4 月 20 日宣布，在近 100% 的计票进度下，成立 4 个月的 PB 党获得 44.6% 至 44.7% 的选票，在国民议会 240 个席位中取得 131 席。这是保加利亚自 1997 年以来首次出现单一政党单独执政的情况，并终结了该国 5 年来政府频繁更迭的政治局面。

拉德夫发表演讲，称选举结果是“希望战胜不信任，自由战胜恐惧”，并承诺保加利亚将继续走“欧洲道路”。此前，拉德夫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但分析人士指出，他上台后阻挠欧盟援助乌克兰的可能性较低，还会在获取能源等利益问题上寻求中间立场。国内政策方面，拉德夫承诺清除寡头治理模式。其主张包括解除前总理鲍里索夫（Boyko Borisov）及受美英制裁的德利亚·佩夫斯基（Delyan

Peevski) 对国家机构的控制, 后者是该国“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党 (Movement for Rights and Freedoms, 简称 DPS) 领导人。

这次提前举行的大选源自于 2025 年 12 月的抗议行动。当时政府推行预算案, 引发数十万人上街抗议, 反对腐败及黑手党。时任保加利亚总统的拉德夫因支持抗议而获得民众支持。为参选总理, 曾任保加利亚空军总司令的拉德夫于 2026 年 1 月辞去已担任 9 年的总统职务。

4、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创纪录低点, 美国排名跌至第 64 位

无国界记者组织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简称 RSF) 4 月 30 日发布 2026 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报告。数据指标显示, 全球新闻自由评级降至 25 年来的最低点。

在报告的评估中, 超过半数的受评估国家首次被划入新闻自由“困难”或“非常严重”层级。2002 年, 处于“良好”评级国家的覆盖人口比例为 20%, 现阶段该比例降至 1% 以下。仅有以挪威为代表的 7 个国家维持“良好”评级, 其中挪威连续 10 年位列数据榜首。

美国排名降至第 64 位。报告记录了导致排名下降的相关事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媒体实施的管理政策、萨尔瓦多籍记者马里奥·格瓦拉 (Mario Guevara) 在报道抓捕移民行动后遭美国拘押并驱逐出境、美国缩减国际媒体署 (预算导致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及自由亚洲电台裁减人员或部分终止运营)。

政府立法是限制新闻人员报道的主要机制。报告指出，超过 60% 的国家（如埃及、格鲁吉亚、印度与以色列）在过度应用国家安全法规与紧急状态法令，限制媒体从业者的采访活动。

区域武装冲突也推高了记者的伤亡数据。自 2023 年 10 月加沙战事发生以来，该地区记录了超 220 名记者的死亡事件。《卫报》、BBC、CNN 与《纽约时报》发布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政府撤销禁止外籍记者进入加沙地带的命令。

5、英国、马来西亚禁止 16 岁以下公民使用社交媒体

马来西亚于 6 月 1 日实施规定，禁止 16 岁以下公民开设社交媒体账户。英国政府于 6 月 15 日公布了限制少年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预计于 2027 年春季执行。

两国的政策将 Facebook、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 等平台纳入管理范围。平台需部署年龄验证系统，拦截 16 岁以下用户创建账户的操作。对于未能执行规定的公司，马来西亚政府设定了上限为 1000 万林吉特（约合 250 万美元）的罚款。但是，家长帮助未达到年龄的孩子开设账户的行为不在处罚之列。

在马来西亚，新规适用范围限定在本土拥有 800 万以上用户的社交平台。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宣布，现有用户的年龄验证程序将在 6 个月内分批推行。政府声明，该机制旨在切断儿童接触有害信息及遭受网络霸凌的途径。该政策在马来西亚国内引发了争议。

英国的限制政策基于 2026 年 3 月至 5 月开展的全国性民意调查。调查数据显示，90% 的受访家长和约 66% 的年轻人支持年龄限制。除 16 岁以下公民社交媒体限制条款外，英国还将限制 18 岁以下人群使用直播及与陌生人通讯功能，并在游戏等网络服务中默认关闭此类选项。WhatsApp 与 Signal 等即时通讯软件及专属教育类平台不受该政策限制。

6、极右翼赢得哥伦比亚总统选举

6 月 21 日，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中，无公职履历的商人阿贝拉多·德·拉·埃斯普列拉（Abelardo de la Espriella）击败左翼参议员伊万·塞佩达（Iván Cepeda），结束了现任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4 年的左翼执政，使哥伦比亚政权转向右翼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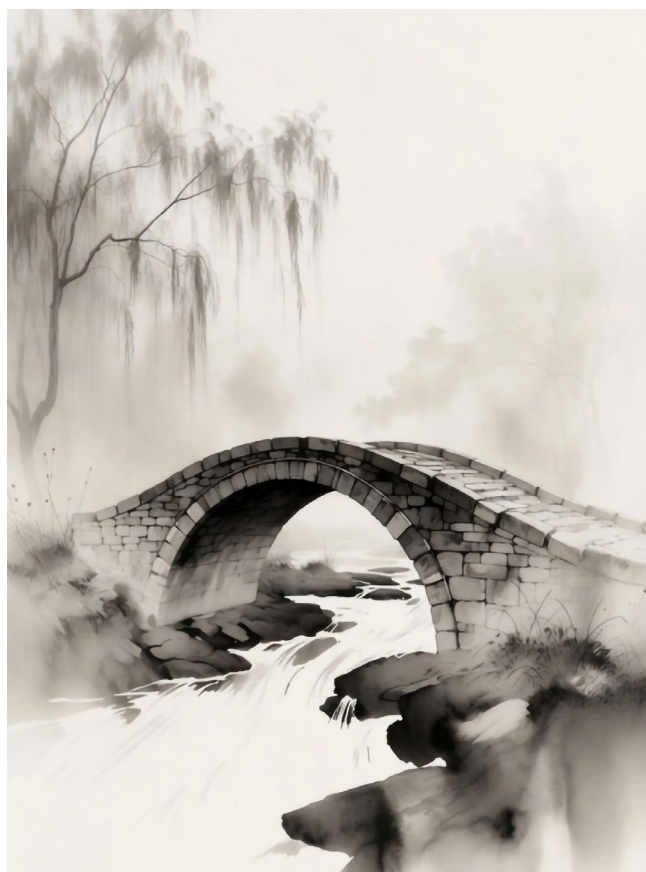
计票数据显示，在完成 99.99% 选票清点的情况下，德·拉·埃斯普列拉得票率为 49.66%，塞佩达得票率为 48.7%。双方选票差值为 250,830 张。

佩特罗与塞佩达目前拒绝接受初步计票数据。在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Cali），塞佩达的支持者焚烧美国国旗并与警方发生对抗。在巴兰基亚（Barranquilla），德·拉·埃斯普列拉在防弹玻璃后发表演讲，呼吁各方停止对抗以维持社会秩序，并声明其将会做全体国民的总统。

德·拉·埃斯普列拉绰号“老虎”。他在竞选期间提出了打击犯罪组织

的方案。他承诺建造 10 座最高安全级别的“超级监狱”，像消灭“老鼠和蟑螂”一样杀死犯罪分子。

德·拉·埃斯普列拉在首轮胜出后获得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内阁的支持。2026 年 6 月初，哥伦比亚司法机构裁定德·拉·埃斯普列拉针对女性选民及媒体记者的言语表述构成“基于性别的政治暴力”，命令其公开致歉。许多女性组织担忧他的执政将威胁女性权利并破坏 2016 年和平协议中的性别条款。



ABSTRACTS IN ENGLISH

INTERVIEWS

China's Change and Continuity: Can a Prosperous Middle Class and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Coexist in the Long Run?

Daron Acemoglu / Weifeng Zhong

“There is no law in human history that says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cannot survive for centuries. But it is very hard fo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o coexist over the long run with a strong and prosperous middle class. That, I believe, is precisely where the fundamental dilemma of the China model lies,” says Daron Acemoglu,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and winner of the 2024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On June 4, 2026—a date of special significance—Dr. Weifeng Zhong conducted this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cemoglu. Zhong is an affiliated scholar at the Mercatus Center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and an advisory editor of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The interview explores a range of important questions: China’s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 model, growth and freedom, innov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status quo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what has changed—and what has not—since 1989.

U.S.–China Competition,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Evolving Military Balance in the Indo-Pacific

Zack Cooper / Jianda Ni

“The Taiwan Strait is becoming, in a sense, a ‘no-man’s-land.’ Neither side can transit the Strait with confidence without exposing itself to serious risk,” says Zack Cooper. Cooper formerly served as a foreign affairs specialist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worked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at the White House. He is currently a lecturer in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with additional affiliation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the Alliance for Securing Democracy, among other institutions. In his recently published book *Tides of Fortune*, Cooper examines the trajectories of six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cing how their leaders adjusted defense objectives, military strategies, and resource commitments in response to their assessments of shifts in relative power, and from this perspective projects the future course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military development. Commissioned by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Mr. Jianda Ni, who studie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and is now a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Law School, conducted this interview with Dr. Cooper. Beginning with the recent US-Iran conflict, the conversation focuses on Beijing’s intentions, Washington’s strategy,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the new Asia-Pacific military balance emerging from Japan’s remilitarization.

The 2024 July Revolution in Bangladesh: Student Protests, Military Neutrality,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Mohammad Moynul Haque / Lili Su

The success of Bangladesh's 2024 popular protests and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that followed stand out as a rare bright spo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lobal democratic recession of recent years. Our previous issue published two translated articles analyzing this historic event; to offer Chinese readers more detailed and richer information, we commissioned Ms. Lili Su, a researcher of social movements, to conduct this interview with Mohammad Moynul Haque. Born in Bangladesh, Haque received his doctorate from Bielefeld University in Germany and is currently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Jagannath University in Dhak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onviolent action, civil resistance, democracy, and regime transition.

The interview trace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outcome of the 2024 movement in Bangladesh, discusses the role that older, pre-interne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played under conditions of internet shutdown and the importance of nonviolent strategy, and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Bangladesh's military elites—including their refusal to carry out large-scale repression, their support for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the military's relations with the old regime and the interim government. The conversation also explores post-revolutionary party politics, the election resul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udent leaders into politicians, and the prospects for Bangladeshi democracy.

CONVERSATION



The Road to Democracy: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Weifeng Zhong, Lun Zhang, Chaohua Wang, Lili Su, Ping Hu,
Tiancheng Wang

The military is a vitally important pillar of power for any dictatorship. Strategic planners of popular nonviolent struggle must consider how to win the sympathy of the armed forces and induce them to withdraw or withhold their support from the dictatorship. Viewed in worldwid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any large-scale nonviolent campaigns have succeeded because the military refused to take part in repression and ceased to remain loyal to the dictatorship, thereby opening a path of transition from autocracy to democracy. Yet many other nonviolent movements have failed painfully—owing to brutal crackdowns in which the military participated, compounded by the lack of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countering repression—failures that in turn weakened confidence in persisting with nonviolence.

Activists and public intellectuals in today's China are deeply divided over the question of violence versus nonviolence. Many of those who advocate or support violence place their hopes in a military coup and invoke this expectation to rebut the case for nonviolence. The issues involved deserve careful examination: clarifying them can aid th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ultimate success of resistance movements.

When mass popular protests break out, what message should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send to soldiers? Should it call on them to defend their honor and refuse to suppress the people, or should it go a step further and call on

them to stage a coup to overthrow the dictator?

If a military coup were to succeed, what configuration of power might it produce, and what effects might it have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Are there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 or statistical analyses on which we can draw? Would it be best for the military to remain “politically neutral,” allow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dictatorship to be resolved by political rather than military means?

Do China’s soldiers, along with its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s, share a responsibility to learn the lessons of the bloody tragedy of 1989 and to avoid large-scale bloodshed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 And how can it be avoided?

At the invitation of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six participants—Weifeng Zhong, Lun Zhang, Chaohua Wang, Lili Su, Ping Hu, and Tiancheng Wang—held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of these questions.

POLITICS AND SOCIETY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Grand External Propaganda” (Part I)

Yiran Pei

“Propaganda” has been the very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ince its founding and the vanguard that clears its way. “Grand

external propaganda” (da wai xuan)—the “grand layout of external propaganda”—has attracted broad attention only relatively recently, but its history is in fact quite long. Since 1949, external propaganda has been an important wing of the CCP regime, seeping steadily overseas: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effectively shaped Western public opinion,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quietly shifted the stance of some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media.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CCP has continuously injected funding into its “grand external propaganda,” broadcasting its communist worldview, values and moral outlook abroad at full strength in an attempt to contest the ideological high ground with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car on the Forehead: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Famine-Mentality Society

Zhenguang Jian

Taking the embodied experience of a childhood forehead injury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d defines an original sociological concept: the “famine-mentality society.” Its formation rests on two conditions. Objectively, prolonged experience of scarcity and repeated threats to survival constitute the structural background; subjectively, the absence of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transcendent belief causes uncertainty to be systematically internalized as scarcity anxiety. Under the sustained operation of these conditions, society develops a stable behavioral structure of mutual guardedness, mutual struggle, dependence,

and zero-sum thinking, while institutions come to operate on a core logic of controlling and exploiting scarcity. This is the conceptual content of the famine-mentality society, which is distinct from a merely impoverished society, a scarcity society, or an anxiety society. Focusing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origins and harms,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logic by which scarcity anxiety is generated and the mechanism of its progressive erosion from the individual and the group up to the level of civilization, offer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material condition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for understanding both China's historical sediment and its contemporary social predicament.

From the Limitations of AI to New Approaches in the Study of Democracy

Ben Xu

Crises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do not always arise from violent overthrow or open repudiation; more often they occur amid institutional disturbances that are lawful and procedurally compliant yet continuously accumulating.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concepts fro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such as “adversarial examples” and “overfitting”—as analytical tools rather than rhetorical metaphors, in order to reconceive the structural fragility that modern democracy exhibits under conditions of high procedural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Just as an algorithm that performs superbly on its training data may commit grave misjudgments in the face of tiny perturbations of nois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may gradually lose

their capacity for judgment and their substantive functions even while the rules remain intact and procedures remain lawful: the rules are not broken, yet they are exploited with precision; the institutions continue to operate, yet their functions have drifted. The article seeks to show that the key challenge facing democracy may lie not only in designing more perfect rules, but also in enhancing institutional robustness—the capacity to sustain judgment, self-correction, and continued operation in the face of malicious manipulation.

DEMOCRACY TODAY

Why Elected Leaders Subvert Democracy

Susan C. Stokes Translated by Xiaoyi Yan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more have shown that the principal threat facing contemporary democracy is no longer the military coup, but democratic erosion driven by elected officials. In this article, Susan Stokes analyzes why elected leaders are able to erode democracy and what actions can be taken to halt and reverse this trend. Her research shows tha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realignment of party systems, and, above all, deepening inequality have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rise of right-wing nationalists in developed democracies and left-wing populists in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She argues that resisting democratic backsliding requires coordinated action and joint effort among opposition political elites,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the judiciary, and voters. The article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7, Number 2,

April 2026, pp. 49–64).

The New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Translated by Xingjian Xu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is a type of regime in which substantiv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exist alongside serious abuses of power by incumbents; elections are competitive but not fair. The emergence of this regime type was bound u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after the Cold War. It persists stubbornly in many countries today and has even spread to some countries with strong democratic traditions and institutions.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who first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analyze this new trend in the present article. I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1, Number 1, January 2020, pp. 51–65). The article cites Hungary as a typical case embodying this trend. Although Viktor Orbán was defeated and left office in the elections of April 2026, how he distorted and subverte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still merits study, as a mirror for history.

BOOK REVIEW

An Essential Lesson for Dissidents: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 of *Blueprint for Revolution*

Tiancheng Wang

We would do best to understand nonviolent resistance against autocracy as a form of warfare—indeed, a warfare more complex than military struggle. Those who aspire to take part in launching and leading resistance movements should study and master the technique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just as military commanders must attend military academies and study the “art of war.”

NOTES

Global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Zhengping Mi

《中国民主季刊》征稿启事

由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民主季刊》(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旨在为中文读者提供关于中国与世界的最新观点、新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国政治、社会、民主转型的深入探讨。它注重现实性、学术性与可读性。敬请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美欧、澳洲等广泛地域范围以及比较政治、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学、历史等专业背景不同的专家学者不吝赐稿。

欢迎就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赐稿——

1. 关于中国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外交问题；
2. 关于中国民主转型可能前景、路径、风险、战略等问题；
3. 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转型过程、经验、教训；
4. 关于民主理论、宪法设计与民主建构；
5. 关于民族与国家性问题；
6. 新书与重要著作的推荐、评论。

投稿要求如下：

1. 稿件应为汉语。也欢迎用藏语、维吾尔语投稿，我们将协助译成汉语发表。来稿请标明篇名、关键词、摘要（不超过 200 字）、作者姓名及简介、联系方式。
2. 国内作者：由于是学术刊物，鼓励国内作者用实名，但出于安全考虑，国内作者基于自己的判断选择用笔名。
3. 稿件字数：论文，以 5000-8000 字为最适宜，建议不超过 10000 字；更长的文章可以考虑分期发表。书评，建议在 2000-3000 字之间。译作，建议在 4000—10000 字之间。
4. 来稿须符合写作规范要求，详细注释体例在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上：<https://chinademocrats.org/?p=24>。
5. 投稿邮箱：cjd@chinademocrats.org。您也可以通过此邮箱向我们提出选题策划、建议意见、咨询或者合作方案。
6. 《中国民主季刊》拟每年 1 月、4 月、7 月、10 月中出版，截稿日期分别为每年 3 月 1 日，6 月 1 日，9 月 1 日与 12 月 1 日。
7. 稿件刊发后将按字数支付稿酬。

《中国民主季刊》订阅方式

How to Subscribe to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中国民主季刊》是电子出版物，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免费下载，也可以提供您的电子邮箱地址，我们免费通过电子邮件定期发送给您。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is an electronic publication that can be downloaded for free from our website, or you can provide your email address and we will send it to you periodically by email free of charge.

我们也印刷少量纸质版，以满足个人、机构、图书馆收藏需要。纸质版每期价格为 38 美元。

In addition, we print a small number of paper copies to meet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institutional, and library collections. Paper copies are available for \$38 per issue.

下载电子版：请登录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 <https://chinademocrats.org/>。

To download an electronic copy: Please visit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Democratic Transition website at <https://chinademocrats.org/>.

订阅电子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https://chinademocrats.org/?p=821> 或将您的电子邮箱发送至 cjd@chinademocrats.org。

To subscribe to the electronic edit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s://chinademocrats.org/?p=821> or send your email address to cjd@chinademocrats.org.

订购纸质版：请电邮 cclassics1994@gmail.com 联系代理商 China Classics Inc.。

To order paper copies: Please contact our agent China Classics Inc. by email atcclassics1994@gmail.com , or by phone at 858 229 9677.

中国民主季刊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回顾历史，从晚清到当代，中国发生的、争取自由民主的每一次重要努力，知识分子都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务莫过于实现民主宪政，为此而探索、写作，以及传播相关的知识和思想，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责任。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ISBN 979-8-9875925-0-2



9 798987 592502